

99/8
总第89期

■ 邓小平说：

『党要领导好，就要受监督』

■ 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

■ 余秋里与大庆油田

■ 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

■ 赵健民冤案的教训

■ 关心群众疾苦的杨勇司令员

炎黄春秋



1988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

包拯诞辰千年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



199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清官的典型代表人物——包拯诞辰一千周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安徽大学、安徽省法学会、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包拯诞辰千年学术研讨会，于6月22日至24日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市举行。来自北京、山东、江苏、上海、吉林、广东和安徽等地的专家学者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重点发言的十余人，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

1



2

3

4

1 研讨会会场

2 安徽省陈瑞鼎、苏平凡、郑锐等领导同志在大会会场上

3 小组讨论在进行中

4 马康盛(上左)、杜导正(上中)、包遵亮(上右)、王曾瑜(下左)、欧远方(下中)、冯征(下右)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先后致词、讲话、发言

杨家信 摄影



炎黄春秋

春秋笔

- 2 邓小平说：“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应克复
6 旧政协会议历程……高建中

殒星篇

- 10 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王 璐
18 余秋里与大庆油田……晓 棠
22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武怀让命丧苏联
……薛德安 张起华
25 朱德怀念第二故乡……倪良端
28 同温济泽最后的两次交往……杨兆麟

沉思录

- 32 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余广人
39 赵健民冤案的教训……廖盖隆

英杰谱

- 43 飞行将军曾克林……李忠效
46 李时雨卧底敌营十八年……姜 国

时代风

- 52 “叔莘奖学金”风雨六十年……刘作忠
58 关心群众生活疾苦的司令员杨勇……舒 云

古今谈

- 61 焚书、八股愚天下……官伟勋
66 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的曲折与艰辛……熊先觉

遗闻录

- 68 利玛窦和他的墓地……肖 佳
73 韬奋先生拒贿……小艺兵

古镜台

- 70 清宫严重……王光远

九洲景

- 72 在霍元甲故里……冬 枫

人海浪

- 74 我在动乱中的阿尔及利亚当记者……王敬诚
76 访悉尼华人市长曾筱龙……杜明明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凌 云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邓小平说：“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

● 应克复

“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

邓小平在谈到监督问题时指出：“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他还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这就是结论。针对有些领导不愿受监督，独断专行，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邓小平关于“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关于共产党不受监督是危险的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何个人、党派和集团，当他（他们）成为领导者、统治者之后，人性中消极软弱的一面就会滋长起来。个人说了算、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几乎是一切官场上的通病，对共产党来说也不例外。有鉴于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后一再敲起警钟。中共八大甚至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强调。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向全党严肃地提出警告，但实际的情况是，党和国家机关中虽然已有一批腐败分子受党纪国法的惩治，但由于缺乏健全的

监督制约机制，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现象仍在不断地膨胀而难以遏制。虽然党内不断出现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优秀干部，但我们更要看到党政机关中腐败成风的严峻现实。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一批干部腐化堕落，受到法律的惩处，不论对个人对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近几年来，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更证明强化对执政党监督的紧迫性，又一次说明邓小平关于“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党应受到四方面的监督

邓小平提出，共产党应受到三方面的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后来，邓小平提出党还应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督。

在较长的时期中直至现阶段，共产党内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战争条件下壮大起来的，适应这种环境的党的活动方式要求全党集中统一。成为执政党后，要管理这样大的国家，担负着复杂繁重的任务，客观上仍然需要集中统一。但是，随着执政的持续，对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者的监督显得愈来愈重要了。适应这种情况，“文革”后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它对于严肃党纪、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组织的功能仍然是上级党纪委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的监督，由于同级党

的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因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者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往往是纪委发现了同级党委中某些领导的问题,但无法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处理,直待上级纪委等部门参与之后,问题才得以搞清和处理(在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中,同样存在这种监督体制不顺的问题)。(从地方直到中央)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如何受到纪委的直接有效的监督,这个问题列宁曾提出一个重要设想,但以后未能得到实施。

党的自我监督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健全党内的民主制。这一问题,与贯彻民主集中制有密切关系。贯彻这一制度,要强调集中,也要强调民主。以往的情况是强调集中多于强调民主。诚如毛泽东在1942年所说:“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即使是民主,也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结果是上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不能受到来自党员的监督。三中全会之后开始重视民主这一侧面,注意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但是,对于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列宁首次提出这一制度时,在认识上就与卢森堡发生争论。以后多次讨论与解释过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结果这种解释总是难以使人们获得一种清晰的认识。症结在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涵了集中。有哪一种民主最后没有集中呢?除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的有预定目标的民主最后都必然产生集中。如作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选举,最后必然产生集中;从候选人中产生正式当选人。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最后也必然产生集中:通过或否定该项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包涵着集中,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加进一个“集中”的概念;如果再把集中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侧面,就必然与民主规则相悖。由于民主集中制理论上的这一缺陷,往



往被那些家长式的领导所利用,成为推行家长制的制度依据,严重扼杀党内的民主精神。其后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文革”后虽清算了个人专断的家长制作风,但至今还流传着:“第一把手是绝对真理,第二把手是相对真理,第三把手只能服从真理。”这种现象应从制度上来加以清除。实际上,民主集中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实践就可以搞清楚的。当时列宁的用意是要在党内建立极严格的集中制,不久,他又在集中制前面加上“民主”一词。由此一直延续至今。有人认为,只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能监督最高领导者,防止最高领导者重大失误的发生。实践证明,在国际共运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党都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结果并没有防止最高领导的重大错误,且这类事例屡见不鲜。因此,对民主集中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待重新加以认识。

关于群众对党的监督,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方面。一是开好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在会议中听取各种意见(严格地说,人代

会是对政府和检察院、法院的监督)。二是健全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也主要是对本单位行政领导的监督),使之“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的群众监督制”。邓小平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落实邓小平提出的“群众监督制”,是有待实现的一项大工程。直至目前,群众有组织地参与监督尚未起步。新闻舆论是很有威慑力的,是监督的有效手段。正如邓小平所说:“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但这种手段未被充分利用。一些党员干部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一般总是待检察院审理、法院结案之后新闻媒体方可向社会公布。这种事事后通报的做法,只能吸取教训,引以为鉴,却不能防微杜渐,在事情未发展到严重地步时提出正告。总之,邓小平关于群众对党的监督的思想,有待在制度上加以保障。

民主党派是对共产党进行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它“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个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可惜自1956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方针一度被搁弃。在这段时期里,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是自我改造。组织发展也停顿了。“文革”后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特别是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后,民主党派才开始恢复了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由于民主党派在经济上缺乏来源,在组织上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对共产党的监督还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加强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力度,帮助共产党提高执政水平,避免共产党领导工作中的失误,多党合作制应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除上述三方面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国家及其法律对共产党的监督与制约。他多次强调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

强调指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强调法制监督是邓小平重要的政治思想,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有鉴于此,他希望,“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1992年他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执政党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如何严格地遵守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不凌驾于法制和国家机构之上,使掌握或大或小一部分权力的党员干部时刻不脱离国家及其法律的监督与制约,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人们向党提出“是法大还是党大”?说明这个问题还未能与实践上得到解决。

共产党要“三怕”

这三怕就是“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

这“三怕”邓小平1956年就提出来了。可是几十年来的情况是,除了“一怕党”尚有效验以外,后两怕还谈不上,特别是第三个怕,哪有共产党怕民主党派的?事实是,只有民主党派怕共产党。

邓小平的“三怕”思想堪称深邃远见。可想而知,如果共产党的干部心中有了这三怕,许多错误和损失就可以避免了。囿于中国的历史特点,要使三怕成为现实,还需要有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政党史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一个思路。

西方近代出现的政党是议会制度的产物。议会中的议员是具有不同政治倾向和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在面对国家重大问题时就分解为不同的政党。这是政党雏型。这些



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

不同的政派不仅在制定法律时要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每逢大选时总是竭力争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从而获得入朝执政的资格，一旦如此，该派就成为执政党，另一派即成为在野党（上述情况系议会制和势均力敌的两大党国家）。由此，议会不仅是政党的摇篮，更重要的是政党方面争权夺利的舞台。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之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重要方面是有了议会的政治组织形式，有了不同政派可以通过议会内的和平斗争（有时也不排除议会外的武力斗争）来解决包括政府权力交替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议会制促使近代政党产生，而近代政党因议会制的巩固使政党的政治功能、活动方式以及各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原则得以确立起来。

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中国没有议会制。在近一个世纪中也模仿西方搞了一些议会，但同西方的议会不能同日而语，根本的差别在于它既不是政党的摇篮，亦不是各政党争权夺利的主要场所。国家权力的争得不是通过议会内的和平合法斗争，而是通过议会外的武力斗争解决的。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点明了中国政治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初期不懂得这个道理，不组织武装，结果站不住。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政府、议会皆为国民党一党之所属，

其他政党概不能共享之，而且连合法存在的资格也没有。这样，其他政党欲要取得自己的合理权利和地位便只能凭借议会外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中国缺乏议会民主所导致的一个政治后果，便是不可能有多党平等共存、互相制约的政治制度。一旦某党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胜利由非法政党成为执政党，另一党也因此由

执政党转变为非法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斗争史就是如此。80年代以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谋求国共之间的和解与合作，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一战略构想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重大创新。

建国之后的实践也表明，执政党无对立面，无有力的监督制约力量，无与之竞争的对手，包括建国之后的各民主党派，也不能成为监督与制约共产党的重要力量，这是政党制度的一个缺陷，对执政党亦无裨益。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共产党要“三怕”的思想，使民主党派能切切实实地监督与制约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共倡导并得到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的多党合作制，将在制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并使中国的政党制跳出传统的窠臼，创建中国特色的体现民主精神的政党制度。

（作者应克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著有《论民主的权威》、《民主集中制的回顾与思考》、《民主的权力制约》等）

（责任编辑：刘家驹）

旧政协会议历程

● 高建中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50 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讲到：“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么，1946 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给人们留下了那些印象，提供了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呢？

抗战初期的 政治舞台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众多的民主党派和民众团体。这些民主党派，一般来说，是指国共分裂以后，成立的介乎于国共两大党之间的政治势力。他们形成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的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他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少数的共产党人。

由于各民主党派形成时期的政纲，主旋律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是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朋友。

1938 年上半年，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党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各党派、人民团体的意见，成立了反映民意和提供咨询性质的机构——国民参政会。

其中，共产党的参政员有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中间党派的参政员有沈钧儒、梁漱溟、陈嘉庚、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晏阳初等；无党派人士代表有张澜等。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一向不许其它党派和广大人民过问国事的国民党来说，毕竟是一种民主进步的表现，它也是国共两党以及同中间党派合作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为严重的任务”。

共同的目标： 反对“独裁统治”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作战，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结束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

当时，由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强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的加强，破坏了抗战初期全国团结一致夺取抗战胜利的大好局面，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极端不满，纷纷要求迅速结束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实施民主宪政。在国民党被迫作出实施宪政决议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1943 年在“九·一八”事变 12 周年纪念日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分析了近代民主政

治的消长,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独裁统治,断定中国现行的“党治”和“民主政治”是背道而驰的。“党治行,民治亡,殆为必然结果”。1944年1月3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等16人,再次发起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

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允许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拖延时间,稳定国民党的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并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在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周恩来的演讲,指明了宪政运动的方向,推动了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四五月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短短的时间内,大片国土沦丧,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或陷入日本人的铁蹄之下,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却生机勃勃,在团结抗战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于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越来越强烈的普遍要求。

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8月中旬提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电文明确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政局,由国民政府召集各民主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召开国

事会议,组织抗日党派成立联合政府。《新华日报》和重庆各大报纸都全文登载了林伯渠的报告。

“联合政府”的口号一提出来,立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9月24日,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经过串联,联合在迁川一家工厂隆重举行了民主宪政促进大会。会议并争取到了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参加。大会集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于一堂,“大家只有一颗热心——爱国家民族的热心;一个期望——立即实现民主的期望。”

10月,民主同盟在发表的《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废除现行一切妨害上列权力之法令与条例等。

除民主同盟外,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于1945年元旦发表元旦献词,希望中国成为真正民主而又统一的国家,一切抗日部队能真正联合作战,并提出召集紧急时局会议,成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的各党派民主统一的政府。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也发表了《新年的希望》一文,要求国民政府改良成为一个各党派参加的举国一致的统一政府。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对于各阶层人民的正义呼声,极力进行抵制。在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大讲什么“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等,企图抵制人民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实际上,不先消灭寡头政治,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就没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虽然国民党极力反对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中共中央仍以最大的耐心与努力来争取实现之。1945年1月,中共派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商讨召开党派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正式提出“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用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而,将争取民主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双十协定》的签订 和旧政协会议的召开

1945年8月，毛泽东亲临重庆谈判，在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力量及国际形势的影响下，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签定了《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中共及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位的主张。共产党方面也主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协定中还规定了“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曾说，1945年他去重庆，主张开政治会议，陈立夫、陈果夫说，政治会议太大，应该加协商二字。

1946年1月10日，在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的同一天，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国民党（名为政府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社会贤达等五个方面的代表。

会议分设五个小组，包括：改组政府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周恩来在会上致词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

旧政协会议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问题上。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战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1936年5月5日

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目的就是要人民军队“化”掉，从而消灭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实行军队国家化，首先必须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必须实行军队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交给它，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1月10日到31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并通过了五项决议：（一）政府组织案；（二）国民大会案；（三）和平建国纲领；（四）军事问题案；（五）宪法草案。这五项，统称为政协决议。

31日晚上，举行大会闭幕式。周恩来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决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

政协决议的命运

《双十协定》和政协各项决议公布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纷纷以种种形式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但是，国民党对此却进行了蓄意的破坏和镇压，连续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2月20日，国民党又在北平策动所谓还乡请愿团捣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肆意殴打、侮辱中共办事人员。22日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捣毁了重庆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报》营业部。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决议，说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其他国民党内反动分子也说政协各项决议的通过就是“党国自杀”，“不能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3月16日，会议通过了反政协协议的5项决议，推翻政协会议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

则,维系个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制。会议还破坏政协关于过渡期间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常会选任”。

为使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3月20日至4月2日,国民党又召开了一党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参议员拒绝出席这个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宣称政协议案不能代替国民党的“训政时期约法”,政协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政协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决不能承认的”。会议通过了《拥护蒋主席报告案》以及内容包括取消解放区,整编中国军队等两项决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实际是蒋介石国民党推翻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预谋发动全面内战的讯号。

国民党在撕毁践踏政协决议的同时,加紧全面部署内战。1946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军事会议,策划破坏停战令。其后,国民党军队首先在东北大打,然后在华北、华东和华中进攻解放区,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为了阻止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中共政协代表团于6月21日向国民党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4项建议,但遭国民党顽固拒绝。

6月23日,上海5万多人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送由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费廷芳、雷洁琼、吴耀宗等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在昆明相继暗杀了著名爱国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7月17日,中共代表团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

7月25日,周恩来前往上海,在马斯南路的“周公馆”,举行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周恩来义愤填膺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这一连串事件

都是有计划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说到激愤之处,周恩来凛然大声疾呼:

“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要控诉,希望记者用笔和口来控诉,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9月底,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共产党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进犯。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的当天,蒋介石又悍然下令于11月召开“国大”,和平谈判实际上已濒于完全破裂。

11月15日,国民党悍然召开“国大”,终于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这就使第三方面许多民主人士放弃了和谈的幻想,最终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

11月16日,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愤怒地指出: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大”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愿与全国人民为真正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11月17日,民主同盟也公开宣布拒绝参加“国大”。

11月18日,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夕,特地致函郭沫若夫妇。信中说:“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会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

有意思的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仅仅过了半年多的时间,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宣言,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的提出,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展开了新政协运动……

(责任编辑:吴思)

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 李克农

● 王 璐

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勋的一代英豪，特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璐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

风起云飞，波浪阔，滔滔黄浦。挺身而出，赴汤蹈火，深潜魔窟。料敌锄奸高胆略，舍家保党无所顾。更千钧一发挫凶谋，奇勋著。

察敌势，贵神速。陈平策，孙武术。赞隐形战线，英雄无数。荷出污泥无沾染，梅历雨雪香如故，照汗青，千古写丹心，丰碑树。

——王璐：悼念李克农词《满江红》

敢于得罪康生

1967年1月，李克农辞世五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大火烧到中央调查部大院，“革命群众”用斗大的字贴出一幅大标语：“李克农是什么人？”一看就知道这张大字报是颇有来头的。经了解，果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康生向毛主席诬告李克农串通刘少奇等人要害他。康生当时权倾朝野，总以为伟大领袖对他言听计从，他

没有料到却告出一条“最高指示”来。毛泽东主席找他谈话说：“康生啊，你不是告几个人要害你吗，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已经有了定论，可是李克农不同，李克农派到徐恩曾那里是有大功劳的，1931年顾顺章叛变，如果没有他，上海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他们都不存在了。这些历史，青年人不知道，你要告诉他们。”

尽管这是“最高指示”，但康生却拖了半年多，在当年八月一日，他为了追查“沙韬事件”，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中央调查部几位有关同志和造反派的代表时，才不得不如实传达。

康生为什么要告李克农，李克农怎么得罪了康生呢？这要从延安“抢救运动”说起。

1941年李克农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1943年延安整风，康生以胡宗南要进攻边区，需要整肃内部为由，于1943年7月在



延安时期的李克农

杨家岭作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了“抢救运动”，大搞肃反扩大化，一反党的保卫工作中不许肉刑，不许轻信口供的原则，普遍使用了“逼供信”的做法，小会逼、大会斗、车轮战，进行精神折磨，许多受审查的同志被迫编造情况，假坦白，承认是“特务”，然后又根据假口供大搞株连。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西北公学本来是中央社会部培养干部的学校，这时成了康生亲自掌握的“抢救运动”的试点单位，校长是李克农兼任，实际负责人是吴德，监委是李士英。李克农为形势所迫，不能不展开“抢救运动”，但他对康生的做法是有保留的。当时学校的骨干，为迎合康生，出现了用皮带打人，搞车轮战，把人斗得昏死过去等极“左”的现象。李克农在全校大会上狠批了这种行为，说：“要警惕有人自己屁股上有屎，故作积极，企图混水摸鱼。”由于李克农掌握政策较稳，防止了过火行为的恶性发展。

这时西北公学有一个同学张克勤，本来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他和他父亲原来都是甘肃兰州的地下党员。张受逼不过便附和康生，假供了甘肃共产党是“红旗党”，“打着红旗陷害青年，为国民党作特务工作”。因为他编得有声有色，康生便如获至宝，要他到处作报告以便典型引路，起了很坏的作用。许多单位也如法炮制，培养典型，形成连锁反应，以致把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一些地下党打成了“红旗党”，冤枉了许多好同志。李克农曾找张克勤谈话，了解实际情况，警告他要实事求是，不能胡说，但已无济于事。

一次，李克农随毛泽东从枣园到杨家岭，沿路是一条大川，看不到行人，一片阴森、肃杀的景象，只听到北侧山坡窑洞里此起彼伏的开批斗会的喊叫，和“坦白就宽大，抗拒就镇压”的口号声，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这真是青年的灾难啊，克农同志，你说特务能有多少呢？”李克农回答说：“有也没有这么多。”明确地表示了对当时做法的不以为然。

八月初，延安总学委中心汇报会上有些单位反映碰到一些“硬钉子”，运动无法进展。以康生为副主任的总学委放出风来，准备抓一批送保安处，再杀一两个，以儆效尤，使运动有进一步突破。当时整风刚过，党内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有些人有意见，敢怒而不敢言。但还是有位在枣园养病的老情报干部王世英，向毛泽东寄了个《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现象的报告》。不久便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在抢救运动中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这个方针和总学委的精神完全是针锋相对的。而且毛泽东还补充说：“留得尊头在，不愁说不清”。其后中央接连发生了多次关于纠正审干中左倾错误的指示。李克农在西北公学组织得力干部很快认真地展开了鉴别工作。对每个被审查人员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可能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有的还发电报到其他解放区和大后方去调查，作出有理有据的结论。关于“红旗党”的问题，李克农要吴德、李士英召集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等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并与中组部共



1945年8月，李克农（左）在延安机场为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行

同提出否定意见。对被冤枉的同志逐一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为各单位开了先例，使问题都陆续得到解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看了各单位的鉴别结论，曾表示西北公学作的结论有材料有观点有分析，写得好。

由于康生知道李克农在“抢救运动”中与他的观点不一致，对李和毛泽东的谈话也有所闻，他在西北公学搞“逼供信”的错误也是由李克农彻底纠正过来的，自然对李心怀不满。“抢救运动”使康生在党内的威信一落千丈。1945年4月党的七大选中央委员，虽然没有落选，但名次在李克农之后，给他刺激很大。

1948年中央正式任命李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由此种下康生对李克农的忌恨。“文革”中，他认为时机已到，借“沙韬事件”向毛泽东状告李克农，本来是想把李和“黑帮”捆在一起打倒，没有想到反而告出了上述的“最高指示”。

龙潭建奇勋

1931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

形势十万火急。

党中央在上海。地下党的纪律非常严格，组织也很严密，都是单线联系，连中央领导同志的地址，相互间都不知道。只有顾顺章例外，因为他主管特殊工作，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中央各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地址，他都了如指掌。

当时中央同志在上海的有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秦邦宪、陈绍禹、邓中夏、李维汉、陈云、任弼时等，整个党中央的安全都处于非常严重的危险之中。

幸而中央获得了打入敌人心脏的李克农情报小组关于顾顺章叛变及时报警的情况，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才得以脱险。

1928年到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先后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打入国民党CC徐恩曾特务系统，建立了一个深入敌内的情报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李克农施计帮助钱壮飞取得了徐和蒋介石、陈立夫直接联系的电报密码，通过徐的来往电报，得到了许多机密的军事、政治情报，对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很有帮助。

顾顺章，工人出身，能双手打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起义担任纠察队长，表现勇敢，1930年积极执行立三路线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生活腐化，曾受到组织批评。中央批判立三路线后，萌生伺机叛变的念头。1931年4月，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滞留武汉，以他在上海时的旧艺名“化广奇”为招牌，大演魔术。被认识他的叛徒尤崇新发现，遭到武汉行营侦缉处逮捕。他被捕后，立即叛变。主动向侦缉处长蔡孟坚要求马上去南京面见蒋介石、陈立夫，可供出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中央的全部机密。

4月25日，正是星期六，徐恩曾照例要去上海玩乐。南京特务总部徐的办公室只有钱壮飞一人在翻阅处理文件，从傍晚到深夜，报务员连续送来武汉发给徐恩曾的六封加急电报。钱壮飞深知国民党官僚机构在周末历来是无人办公的。这时连续发来绝密亲译的急电，一定是有特别紧要大事，他连忙把办公室的大门反锁，轻轻拆开电报，用密码将电报译出，看后大惊失色，原来是报告顾顺章叛变的详细情况。内称如能即刻解到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电报最后还告诉徐恩曾，说他手下有共产党，消息勿泄露。钱壮飞知道顾顺章对中央的地址及一切情况都清楚，情况极端危险。因事关重大，钱壮飞沉着地先把电报封好，按原来样子搁在写字台上。他知道徐恩曾星期一上午才能回来，便马上打电话把女婿刘杞夫叫来，要他立即动身连夜乘火车到上海，把这一特别紧急的情报亲自交给李克农。4月26日晨，刘到上海找到李克农，李听说顾顺章叛变，知道中央的处境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上报中央。因为不是接头的日子，找不到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经他冷静分析陈赓的行踪规律，找了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了陈赓，并一同找到周恩来。李克农详细汇报了钱壮飞送来的情报，周恩来认为情况属实，立刻与中央商议，当机立断，决定紧急通知所有中央负责同

志、各中央机关及共产国际驻沪机关马上搬家。焚毁和妥善处理有关文件，片纸只字不留。

钱壮飞送走刘杞夫后，从容返回办公室，将徐恩曾的文件清理好，把替徐保管的钱财、珍玩及账目整理清楚，挂印封金，锁门而去。他连夜通知南京几个重要情报关系，迅速转移，自己也随后潜赴上海隐蔽起来。

蔡孟坚于4月26日乘军舰将顾顺章押送南京面见了陈立夫和蒋介石，供出了所有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及各中央机关的地址和情况。蒋、陈立即在上海动员军警宪特全面出动，会同租界当局，准备按图索骥，满指望将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搜到几架破油印机、旧报纸，捉了几个嫌疑犯。后来才知道是从内部走漏了消息。徐恩曾为此受到撤职处分，顾顺章以后在特务内讷中也被枪毙了。

单刀赴会劝少帅

1931年秋，李克农奉命撤到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等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成立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任务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蒋介石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又命他率领东北军去西北前线剿共。结果先后在劳山战役、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的精锐一一〇师、一〇七师大部，一〇六师全部被歼，代蒋受过的张学良陷于极端矛盾和痛苦之中。

当时李克农很关心优待东北军俘虏的工作，亲自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他特别注意了原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高是张作霖的老部下，对少帅忠心耿耿，而且与张学良有较深的个人情谊。他为人豪爽仗义，是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李克农（前排右二）和张闻天（前排左一）在一起

个有强烈爱国抗日情绪的、有思想有头脑的热血汉子。他被俘后抱定任杀任刚绝不低头的态度。没有想到红军对他优礼有加，经过参观、学习、听了多次首长报告后，知道了共产党的历史和政策，特别经过李克农和他推心置腹多次深谈，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他认清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保卫祖国恢复东北失地的唯一的正确政策，团结抗战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认为东北军和红军应当是共同抗日的好兄弟，而不应当兵戎相见。经过多次的启发教育，李克农知道对高的工作已经成熟，便向中央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考虑通过高去作张学良的工作。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批准。李克农根据中央指示，与高谈话，高欣然同意。并商定了去东北军的任务是：与张学良本人直接接触，转达共产党的主张，试探有无可能同意由红军派代表去共商团结、抗日的救国大计。并一同分析了张学良的性情态度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不同的对策。经过充分准备，高福源便由红军护送经边沿地带，回到东北军驻地甘泉城。经过旧识师参谋长张文清与六十

七军军长王以哲取得联系，王将高接到洛川，王并很快密电报告张学良。第二天张便亲自到洛川接见了高福源。

刚一见面，张大发雷霆说：“你高福源，身为东北军的指挥官，胜不能克敌略地，败不能杀身成仁，还有何面目前来见我。给我拉出去枪毙！”高对张学良故意给他来个下马威，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冷笑一声，很平静地回答：“我宁愿去死。”说罢转身就走。张感到意外，制止他说：“慢着，你为什么宁愿去死？说清楚再去不迟。”高便乘此机会慷慨陈辞：“自从东北沦陷，撤退到关内，虽然背着千古骂名，我们一直忠心追随少帅，总还是盼着有一天能打回老家去。你难道不想念东北的大好河山和家乡父老吗？大帅是怎么被害的，你很清楚，你难道不想念大帅的坟茔吗？国难家仇如果都忘掉，昧着良心去打内战，我们真是生而无颜见东北父老，死而愧对祖先。你这样的东北军忍辱偷生，不是生不如死吗，少帅一世英名也将付之东流。所以我宁愿去死。”张学良见高福源声泪俱下，句句刺痛自己心肺，也禁不住流下眼泪，赶紧要他坐下：“你

回来很好，刚才不过是吓吓你，我很想听听红军方面的情况和他们有些什么主张和意见，你快点谈谈。”高详细谈了在红军的所见所闻，共产党的主张和愿意派代表来与东北军谈判的建议。张学良情绪振奋，经与王以哲密商表示同意红军建议，要高休息两天后快去陕北，请红军正式派代表来。

高福源返回瓦窑堡，李克农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高去洛川的情况。经中央研究及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与张学良谈判。并制定了谈判的方针和策略。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率秘书钱之光与报务员戴镜元，由高福源带路出发，顺利到达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王以哲密电报告张学良，张有事要去南京，回电要王热情接待，并代表他先就局部问题进行商谈。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同李克农经两天谈判，首先就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达成初步协议：一、为共同抗日确定各守防地，互不侵犯。二、恢复两方面交通运输及经商往来。三、六十七军所需要的粮食蔬菜可向附近苏区农村购买。苏区政府可组织群众给予支援。四、恢复苏区白区的通商。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第二天即亲自驾飞机到洛川，一下飞机便赶来看望李克农，当天下午三点便在李克农的住处开始正式谈判。房子中间摆一张方桌，二人对面坐，王以哲和戴镜元（钱之光因去西安）在旁作陪。张学良一身阔商打扮，长袍马褂，李克农身着干净的中山装，雍容雅度，庄严中透着刚毅和机智，是一派外交家的风度。

张简单寒暄之后，开门见山，劈头提出：“你既是红军代表，那就请回答几个问题：一、你们红军是否真的抗日？二、红军内部是否团结？三、既然要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不慌不忙地说：“共产党最近发布了《八一宣言》，郑重宣告红军愿与一切抗日部队亲密携手共同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是堂堂正正、言行一致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冲破蒋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堵，目的便是北上抗日，

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我相信张将军不会也不应当不知道，否则就不会邀请红军代表来谈判。红军是非常团结的。至于个别人员甚至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是革命发展中难免的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经过批评和正确的党内斗争，问题解决了会更加团结。第三个问题关于蒋介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赴国难，蒋介石不抗日坚持打内战，我们当然要反对他。”

张学良表示很赞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对“反蒋抗日”的口号不能同意，他说：“现在蒋介石手握重兵，而且他也是有可能抗日的，反蒋便不能实现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克农向他详细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合日寇在华北的步步进逼，而蒋介石节节退让，签定了《何梅协定》，丧权辱国，说明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也答应把张学良的意见报告党中央，如果蒋介石能改弦更张，自当别论了。张学良聪明过人，李克农的回答，无懈可击，张学良将话锋一转又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马上脸色一沉，断然回答：“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您请来的谈判代表，而不是投降代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我们应当记忆犹新，贵军参战的精锐部队，都是中华民族的有生力量，不能在抗日前线报效祖国，反而在内战中遭到歼灭，我们不能不深感惋惜，如果张将军不知道痛定思痛，反而提出要红军接受政府的改编，这不是令人难解吗？”接着便站起来，准备结束谈判，张学良不过要试试这位30岁的红军代表的深浅，结果知道了李克农不可轻侮，也随机应变，转换话题：“请坐下，请坐下，继续谈。刚才这不过是国民政府某些人的不切实际之谈，我也不以为然。”张学良见李克农不卑不亢，对答如流，纵论天下大事头头是道，不由得暗暗佩服，认为共产党真有人才。张学良将军本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思想是很强烈的。经一天多的谈判，正式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议。张学良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在劳山见面，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时间

由红军方面安排。

李克农连夜将会谈经过、初步协议，电告中央，并经中央复电原则同意后，第三天便启程到山西石楼向当时正在山西率军东征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和张学良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慰勉有嘉，并赞扬说“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随后中央开会，结合整个形势研究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谈判，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继续谈判。张学良对周恩来一向深怀敬仰，经这次谈判大大促进张学良的思想转变。顺利结束谈判后，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研究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看法和态度及具体建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迫蒋抗日”。指定刘鼎经常驻张学良处进行联络，经常与张保持接触。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

事前中共中央并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电告中共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乘张学良的专机去西安。派李克农为代表团秘书长，与伍修权等随后前往。经过这次事变，蒋介石被迫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对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推动历史转变的重大作用。周总理生前多次讲“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李克农参与了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联系的全部过程。而且通过高福源搭桥铺路到单刀赴会劝说少帅起了先锋和前导作用，表现了他能根据形势深刻理解和掌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因而具有见微知著的政治敏感性。

坚持原则浩然正气

李克农为人正直，关心爱护干部，在原则问题上非常清楚、非常明确、毫不含糊，是他思想作风上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密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事后他要一、三室的同志作了许多调查，寻找有些同志的下落，弄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李克农对该情报组织逃回来的同志，关怀备至，一一听取他们的汇报，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全国解放后，此案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此外还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亲自参加他们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该案中有叛变行为的人员，曾专门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说：中央最近开会研究，鉴于当前总的形势，认为一些叛变分子留在党内影响很坏，所以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应当从严，应按照中央现行的处理自首叛变的文件执行。因此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李克农亲自主持了审查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对在敌人法庭上坚持斗争、英勇不屈的同志进行表扬。对慷慨就义的五位同志定为烈士，进行了隆重追悼。对叛徒的罪行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此情报组织的原来领导人王石坚，被叛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

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相比之下，更加表现了李克农政治锐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在原则问题上确实是毫不含糊的。

1948年，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时，曾发电报给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给他选个秘书。此事由我经手，选派沙韬去了。1950年康生把沙韬送来说他有政治问题，要李克农处理。李克农很难办，虽知沙没有政治问题，只好让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回来后安排在部里三局工作。后来康生知道了非常生气，便通过一位同志向部里表示他很有意见，这当然是有压力的。李克农便要主管干部的副部长毛诚指定干部局对沙进行审查。审查结果没有政治问题，结论写出后，李克农为慎重起见找杨尚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等一起商议，都同意这个结论，便报刘少奇核批。刘少奇在结论上加了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当时康生、曹轶欧在病中，他们讲沙韬有政治问题，我不相信。原件要退回中央，所以由我亲笔连批语照抄了一份，送邹大鹏、刘少文、毛诚阅后存入我的保险包，放在干部局的保险柜里。

那时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深得毛主席信任，又是中央社会部的老部长，李克农对他是很尊重的，而沙韬只是个一般干部。当时李克农面临两种抉择，一是为保护干部宁可得罪康生，二是为迁就康生而牺牲沙韬。他毅然采取了有原则的立场，决心主持正义保护干部，并得到杨尚昆及其他几位领导的支持，而且他把与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讨论沙韬结论这件事郑重地记在日记中，实际是表示他甘愿为此事承担历史责任。

“文革”开始，李克农已辞世五年了，康生对他还是衔恨不已，并向毛泽东主席告了他。1967年5月，“革命群众”夺权，从我保密包里查出上述结论抄件，送给康生，他看了气得暴跳如雷。8月31日在人大会议福建厅召见有关的几位老同志和“革命群众”代表，这时他位高权重，和曹

轶欧一唱一和气势汹汹，想用高压和逼供信的手段，追查出一个李克农陷害康生的“阴谋”来，这当然是徒劳的。一面追逼，一面破口大骂李克农和与此事有关的同志，整整骂了六个钟头。后来又成立了以曹轶欧为组长的专案组，查出了李克农的上述日记，便借题发挥，大张挞伐。因为没有查出什么阴谋，又有了上述的“最高指示”，李克农是打不倒了，但康生的怨气未出，几位有关同志就遭殃了。沙韬在甘肃，被投进监牢达七年之久，负责审查沙韬的毛诚和参加研究结论并在抄件上划了圈的刘少文也都先后被加以种种罪名遭受冤狱多年。我没有坐牢，算是最幸运的，也被加上“陷害康老的大特务”的罪名挨了长期的审查和批斗。

但康生仍然不肯罢休，于1968年2月4日，中央调查部业务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业务和运动情况。个别省紧跟康生的人，根据他的一些片断的意见炮制了一个所谓《康老“二·四”指示》，再次把李克农和中央调查部骂的狗血喷头：“没有阶级观念，没有敌情观念，丧失警惕，内外不分，鱼龙混杂，眉目不清，落后得很，坏人混进了机要部门”，等等，加了不少罪名，并点名诬陷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的老干部马次春、单殿元、何长谦、徐淡庐、崔继瑗等为坏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197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时，邓小平谈到李克农，李先念再次插话说：“如果他还在，‘文革’中也得被打成大特务。”这确是知情之言，正因为他不顾个人得失，为人正派，能坚持原则，有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高贵品质，所以康生之流恨之入骨，一再对他进行攻击。昔人有诗讲得好：“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歪曲历史，搞诬陷的人总不免变成历史垃圾，而李克农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的刚毅气概和高尚品德，必然将和他的英雄业绩一同垂之于后世。

(责任编辑：申 非)

余秋里与大庆油田

● 晓 棠

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问余秋里：“四川的情况怎么样啊？”余秋里有些沉重地说：“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油层薄，产量低，没有找到大的油田。”毛泽东说：“那里没有找到，就到别处找，‘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总会找到油的。”毛泽东的一番话，给了这位到任才一年的石油部长以巨大的信心。邓小平当时也指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

1958年，石油部根据小平指示，果断地把松辽盆地列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要战场之一，展开了马拉松似的艰苦勘探。经过大量工作，首先在地质浅层钻中发现了油砂，确证松辽盆地肯定含油。随后在肇州县大同镇的钻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这一喜讯迅速地传到了北京。石油工作者为建国10周年大庆献了一份厚礼！正是这一缘故，喜喷原油的大同镇更名为大庆。

1958年岁末，余秋里顶风冒雪赶到了大庆，一落身，就把松辽局的领导和部里的专家组成员以及有关地质人员召进一间屋子，开始了两天两夜的封闭式讨论。面对满屋的热气腾腾，余秋里陡然盯着大家问：“这个油田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差油田？”竟无人应声。鉴于川中找油的教训，余秋里心里一直还没

有踏实下来，他将了大家一军。

怎么才能尽快地搞清含油面积和油层情况呢？大庆的油气富集区在哪里？最有利的构造高点又在何处？余秋里脑子里出现这一连串的问题，令他寝食不安。

就在此时，地质部长长春物理勘探大队送来了最新完成的地震细测成果——大庆长垣地震构造图。在这个图上，清晰地勾画出吉树岗、萨尔图、喇嘛甸子三个面积各为100至300平方公里的地质构造。可以明显看到三个高点，这令余秋里兴奋不已。他大胆作出决定：“在这三个构造高点各定一口预探井，测试油气情况。随即他调运钻机设备开钻。就是这三口预探井，测试出了大庆一带的富油区。悬在石油部长心上的那块巨石终于落了地。

在大庆过了元旦，余秋里马不停蹄地飞往上海，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余秋里同志，你那里有没有一点好消息啊？”余秋里说：“主席，从目前勘探情况来看松辽有大油田！”毛泽东感到惊奇：“啊，有大油田？”余秋里肯定地回答：“我们正在加紧勘探，半年左右就有眉目了。”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上海开会回来，已是大年扫尾的日子。余秋里找党组成员逐一交换意见。他明确地提出了搞会战。2月13日，石油部党组将《关于东北松

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呈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周总理又作出了具体指示和部署，批准在计划外拨给大会战2亿元投资和几万吨钢材和设备。

如此大规模的会战，单靠石油系统的有限人马远远不够，余秋里急中生智，写信给军委领导，要求分给3万名转业官兵以解燃眉之急。此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余秋里来到广州，焦急地找到了罗瑞卿总参谋长。罗总长风趣地说：“余秋里哟，一下子就要改编我们3万部队呀。你真会找窍门啊！”恰巧，会议散了，毛泽东把余秋里叫到自己跟前，他一边专心地听余秋里汇报，还不时点头，说：“好嘛……好嘛……听说你们有个报告，要搞会战，好哇！准备上阵喽！”听得出来，主席不仅同意会战计划，而且是寄予厚望。

3月初，雨雪正酣。1万2千名转业官兵、四千余专家技术人员、七千多名石油工人和247个车皮的器材物资，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地奔赴大庆，打开了一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

仅有区区几个小牧场、几百户人家的萨尔图地区，一下子涌入几万人的庞大队伍。从安达到萨尔图仅50公里的铁道线上，每一个站台都人满为患，拥塞不堪。铁道两旁满堆着刚卸下的设备、器材、行李，像似开露天展销会。

3、4月份的萨尔图，还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职工们挤在自己掏出的地窝子、马架子里。少粮缺菜，炊具不够，只得用铝盆盛饭，脸盆熬汤。生产上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严重不足，工业用水奇缺，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供应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畅，电灯不亮，电话不灵……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的毛病就骨碌碌地冒了出来。

1960年4月26日，在会战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余秋里发自肺腑地讲了这样一番话：“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我一不讲大话，二不讲假话，不信，大家都去试试看，等到起作用了，再来向我报

告。”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两论”、用“两论”的活动在会战工作上掀起了热潮。书本不够，余秋里派人到哈尔滨、长春等地购买，并要石油部派飞机送来几万册《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

这一招果然灵验。几万名石油职工通过学“两论”，学会了用辩证法去分析矛盾和困难。大家一致认为，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国家没有油才是最大的困难。大家多流些汗，多吃些苦，其实算不了啥！如此下来，几万职工的思想统一了，队伍稳定了，干劲也出来了。

回京后，余秋里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到，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一听，问：“是哪‘两论’啊？”余秋里答道：“就是你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听后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谁也算不清，大会战这座大熔炉，到底锻炼出了多少英模人物！一次，一名京城来的客人戏言：“余部长，你这儿不单是产石油，还盛产劳模



余秋里



周恩来视察大庆

啊？”在竖井一样鳞次栉比的群英行列中，“铁人”王进喜的大名可谓最是响当当的。

1960年3月中旬，王进喜受命从玉门来到大庆。下了火车，他一不问住，二不问吃，找到调度室先问了三句话：“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记录是多少？”当他得知萨55井井位在马家窑附近的杨树林子以后，领着全体职工步行20里来到井场。当晚就住在一栋废弃的马厩里。王进喜没地方住，裹一张老羊皮，露宿在井台旁。

3天后，钻机到了。但吊车没派过来，卸车有困难。王进喜二话不说，走到钻机旁，吆喝大伙动手卸车。他们拿来撬杠、粗麻绳、木板和钢管，总之能派上用场的都找来了，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大卸八块，经过7天7夜的“人拉肩扛”，终于搬进了井场。调试钻机时，附近又缺水，王进喜只得领人从水泡子中砸冰取水，萨55井开钻了，王进喜和大家连续苦干，仅用5天零4个小时就打完了一口井，创了当时的最高记录。有个老大娘见他们累得连轴转，心痛极了，提了一篮子鸡蛋赶去1205钻井队，逢人便说：“你们的王队长，真是铁人！快劝他回来，休息休息呀！”

上述细节，是从一位负责人汇报中得知。余秋里听完，连称：“好！好典型！”当即表示：

“我们就用老百姓形象生动的语言，叫他‘王铁人’吧！要发挥好活典型的作用，在全战区宣传‘铁人’的事迹，号召大家向‘铁人’学习。”

这位负责人一走，余秋里又派《战报》几名记者去实地采访。在一次表彰大会上，余秋里亲自为王进喜挂上大红花，然后走到扩音器前，带头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做‘铁人’！”霎时，辽阔的大草原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感人。王“铁人”被大伙拥上主席台，却怎么也讲不出话来，沉默良久，突然呼出一句口号：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国庆节前夕，下起了大雪，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给参加会战的几万职工一个措手不及，偌大一支队伍，总不能一拨拨撤到哈尔滨、长春、沈阳过冬吧！

余秋里听说东北老乡有一种叫“干打垒”的房子能解决问题，立即派人去实地考察。结果发现，这类房子用木材少，用土坯多，取料方便；冬暖夏凉，实用性好；结构简单，可以人人动手，认为搞“干打垒”切实可行，遂指示专门成立“干打垒”建筑指挥部。

数月之后，渺无人烟的荒原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座座“干打垒”筑成的崭新村落。数万职工安然度过了一冬。

解决了住房问题,粮食问题又接踵而来。三年困难时期,连素有“北方粮仓”之称的黑龙江也开始了喊穷。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一次次减少,副食品奇缺,肉食几乎没有。职工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苦干,消耗大补充少,体质开始明显地下降。没有办法,有的职工只得用微薄的工资买高价饼干和糖果吃;有的饿急了,跑到冰地里捡冻成了砣的白菜帮子、甜菜叶弄回来充饥;有的变卖手表、衣服等物品,到自由市场换点土豆、甜菜。得浮肿病的职工,起始是几百,很快上升到2000人,最后攀至5000人。余秋里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1. 各级主要领导要抓生活;2. 抽出10%的职工搞生活;3. 轮流把20%的队伍拉下来休整。

冬去春来,黑土地上又恢复了往昔的繁忙、热闹,一场垦荒竞赛在这里开展得红红火火,颇似当年南泥湾的景象。没有犁,大家就挥动锄头、铁锹、十字镐。有些地方向当地老乡借来几张犁,但没有牛和马,就全凭人力拉。在东油库的一片生活基地上,余秋里和职工们一道垦地,干得汗流浹背,见大家情绪高涨,不时地鼓劲道:“多好的地哟,就是懒汉也能打出粮食!”油田职工在地里撒下谷子、豆子,种下萝卜、土豆及甜菜,还因地制宜办起了牧场,饲养乳牛、菜牛、猪羊等。

1962年春天,大庆石油会战已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

5月8日这天,刚投产的中一注水站失火,厂房、设备全部焚毁,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万元。余秋里得知这一消息极为震惊,他急忙赶到火灾现场,采油指挥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火灾经过。据报告,这个注水站从1961年10月投产到失火前1个月,半年之内发生过大小火警23次,机械事故5起,说明隐患和苗头早就严重存在,发生这次重大火灾事故绝非偶然。

余秋里回到指挥部宣布:此事不急于处理,搁一旁。先在全油区开展一场“一把火烧出的问题”的大讨论,发动群众广泛揭短处,查隐患,堵漏洞。把岗位职责不清、生产秩序混乱等问题归拢一块再来解决。

中一站的事故及大讨论中群众揭发出的情

况,使余秋里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5月份,余秋里一声令下,160余名抽调来的生产管理干部下到基层站所,铺开了油区管理工作试点,延续至今的大庆油田岗位责任制由此诞生了。

那些日子,余秋里板起脸孔,甩着一只空袖子出现在油区的角角落落,大庆人才真正感到了这位“独臂将军”的“铁腕”作风。余秋里又把目光移到了干部身上。针对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余秋里一口气提出了“三老”、“四严”的标准和要求,把它写入《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上,严令上下执行。这个“三老”、“四严”即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余秋里燃起的几把火,在大庆烧得辟啪作响,蓬蓬勃勃。

1964年1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发布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工业学大庆!

4月19日,《人民日报》头条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热情赞扬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到了大庆,好似又回到了延安,看到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中央和各地报刊、电台连续宣传报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事迹和经验。

随着萨尔图中部、北部油田相继投入开发,历时一千多个日子的大庆石油大会战终于告捷。三年多来,大庆人为国家贡献出原油1166万吨。到了1964年底,大庆油田共动用241平方公里面积,投产采油井700多口,注水井400多口,建成原油生产能力800万吨。

这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不亚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责任编辑:刘文)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武怀让命丧苏联

● 薛德安 张起华



武怀让烈士

武胡景，1932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部长），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1936年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于苏联，时年37岁。

武胡景原名武怀让，1899年11月24日，生于孟州市南街村。他五岁举神童，十岁能读诗书。因他第一个剪辫子，人称“武家小和尚”。

1913年，他考入开封一中。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来，他在班会上痛斥袁贼复辟罪行，在他发动下，反袁怒潮迅速风卷开封

一中，校内墙上贴满了“打倒民贼袁世凯”、“坚决废除不平等二十一条”等标语，校方怕学潮闹大，惶然提前放了寒假。

武怀让1916年考入焦作矿专（英国人开办的煤矿的附校）。煤矿为牟暴利，借实习之名强迫学生挖煤，他目睹了劳工所受的非人待遇后，大为震惊，他发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要求煤矿增加月薪、改善劳动条件。英国人想收买他，以高薪聘他当翻译，被他毅然拒绝。罢工胜利了，但焦作矿专却在放寒假时将开除学籍。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已是唐山交大学生的武怀让，在学生联合会上疾呼同学们声援“五四”运动，6月，邓培发动罢工，他率交大同学们罢课呼应，他感到中国有希望了。

1920年，共产主义的种子在华夏大地悄悄萌芽。得益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的指导，8月、10月，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别建起共产主义小组。受过“五四”风暴洗礼的武怀让，1921年成为中共首批党员。

1921年8月，中共在上海成立邓中夏负责的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第一次工运。1922年1月，苏兆征率香港海员罢工；9月，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率安源工人大罢工。此时，唐山的邓培亦约武怀让策划开滦煤矿大罢工。他向校长提出“停课上街募捐支援工人罢工”的要求，遭拒绝后，他带5名学生代表赴京请愿。黎元洪见他颇有才学，心生留用之念，便由内阁王正廷出头相邀，被武怀让断然拒绝。

返唐后，开滦煤矿大罢工于10月爆发了，

武怀让率唐山交大 1000 多名学生上街募捐支援罢工。唐山出动 3000 名军警对 3 万多名罢工者进行血腥镇压，死伤 50 余名工人，武怀让遭到通缉，在一位俄籍教师的掩护下，他有幸脱险。

革命熔炉的冶炼，使武怀让茁壮成长，1923 年尾，他出任唐山共青团地委书记。

1924 年 7 月，武怀让受党派遣，带曾涌泉等 13 人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与刘伯坚等人负责中共旅莫党、团支部工作。

次年 7 月，武怀让和同校的侯玉兰喜结伉俪。此时，朱德乘轮船经波罗的海，于 7 月进入莫斯科。武怀让将朱德的食宿安排妥贴后，陪朱德参观劳动大学、瞻仰列宁墓，并游览了莫斯科的街景。因中央令朱德暂时留俄，朱德便向武怀让提出“趁机会进修军事”的请求，他欣然将朱德安排在劳动大学军训班。军训班设在距莫斯科近两个小时路程的农庄里，他常去看望朱德，当他从俄籍教员嘴里了解到朱德的各科成绩都很好时，他非常满意。次年 7 月，朱德奉命归国参加北伐战争，他将朱德送上火车，俩人挥泪握别。

武怀让任中共旅莫党、团支部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数职，他和曾涌泉等人办起了《前时报》，他是社长，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言词幽默、文采激扬，往往成为报纸的“亮点”，推动了报纸的发行量一路飙升。

注重党组织建设的武怀让，适时将党的活动延伸到中山大学。在旅莫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组织活动，此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也很快成长为中山大学青年团的组长。

1928 年 6 月，“六大”召开后，瞿秋白接任他的共产国际代表职务，武怀让奉命回山东工作。

8 月 4 日，天阴沉沉地让人透不过气来。武怀让手拎着皮箱，玉兰搂着儿子南昌，步履沉重地走进莫斯科孤儿院。

南昌生于去年 8 月 1 日，这天正好南昌起义爆发，他就给儿子取名南昌，现在刚 1 岁。

1929 年 1 月，因“二王”出卖，山东省委遭敌破坏，邓恩铭等 10 人被捕。危难之中，中央调

武怀让赴济南主持省委工作。他到济南以后，不顾旅途劳累马上投身到恢复省委、整顿组织的工作中，谁料厄运还是降临了。

4 月 2 日，他路过麟祥门时，被叛徒王天生的行动队逮捕。闻讯抓住山东省委要员，济南“清共委员会”审讯组长黄僖棠如获至宝，当晚开始突审。

狱中，邓恩铭、何自声、武怀让等 5 人领导小组正在加紧越狱准备，他们将党员按身体强弱搭配成三个小组，并对越狱时间、举事信号、疏散方向做了具体部署。

下午 5 时，乘看守开门放风之际，王永庆一拳将其击毙，遂击钟为号，听见号令，难友们有序地向外涌去，分三路直扑警察。警察们慌了，连忙蜂拥追堵，但为时已晚，第一道门已被一组火速控制，二、三组在武怀让、何自声指挥下突破了第二道门。警察正要开枪，难友们纷纷掷出了石灰，接着和揉眼惨叫的警察们展开了肉搏，高大有力的刘昭章两拳打翻了守卫三道门的警察，10 名难友似水一样冲出了大门。

担负断后的武怀让见两个警察要追出第三道门，就急忙进门，对其猛打，他飞脚踹倒一个干瘦的大烟鬼，但他因体力不支被另一个胖警察抓住了。谁料，地上的警棍将胖警察滑倒，武怀让忙把石灰向两警察脸上掷去，在两警察揉眼痛叫之时，他拔腿奔向客棧……

1930 年，武怀让先后任唐山和天津市委书记。在唐山，建立了 7 个党支部、一个区委，吸收 120 名党员，顺直省委称赞：“唐山的工作比任何一处都好。”

1931 年 1 月，武怀让出席了六届四中全会后，赴满洲任省委成员。不久，中央调他任北满特委（亦称北满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北满，他任人唯贤，斗智斗勇。在他领导下，罢工罢课罢市活动风起云涌，并建起 20 多个反帝同盟分会，会员突破 1000 人。面对日寇加紧侵略的严峻现实，他提出尽快建立反帝统一阵营的主张，但王明中央不予理睬。在困境中，他顶住压力，忍辱负重地艰苦工作，建立了 5 个县委一个区委，形成了 400 余人的党员队伍。“九·一八”事变后，武怀让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成

立“哈尔滨反日总会”，率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开展兵运斗争。哈尔滨失守以后，他带领抗日联军，转战吉林乡村，开辟根据地。

1932年1月，当他准备逐步扩大根据地之时，中央来电调他出任中央军委书记。

1932年1月中旬，杨靖宇接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武怀让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拥送下，告别哈尔滨，临危赴任中央军委书记之职。

1932年，我党建成鄂豫皖、湘鄂边、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闽浙赣、赣南闽西、海陆丰八个根据地，红军扩为30万人。

上海危机四伏。1932年4月，中央被迫迁移江西。博古怕武怀让回去继续抵制自己，便让武怀让仍留上海。

8月，中央来电改任武怀让为中央保卫部（亦称中央特委或特科）部长。

1935年春，中央命武怀让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胜利召开。怀让夫妇出席了大会，他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

11月以后，武怀让突然被派到远离市区最艰苦的地方做基础工作，遇到问题找王明、康生研究时，王、康两人躲着不见。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向武怀让扑来，人们都对他疏远了。

早在1934年12月1日，苏共（布）著名领袖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人枪杀。1936年8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判死刑后，苏联掀起了“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苏联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

这时，我党高级干部武怀让亦神秘失踪。

武怀让失踪，侯玉兰找到王明、康生时，他们说：“不知道，你去问苏联人。”她找到苏联内务部，人家说：“不清楚，这事归中国代表团管。”从此，侯玉兰踏上了艰辛的寻夫路。在苏联外语出版部当翻译，她寻找；在大学当教师，她仍寻找，然而她得到的只有失望。一个个失望摧不垮她寻夫的信念。就这样9个春秋过去了。1945年初，18岁的南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后在兵工厂上班，听到有关父亲的传言后，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失去丈夫和儿子的侯玉兰更加憔悴了。1945年8月，她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她猜想丈夫也许早就回东北工作了。她在东北苦找两年，依然没有丈夫的踪影。再次失望的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王明、康生在苏的害人罪行，恳请中央寻找武怀让的下落。然而没有回音，她从此改名侯志。

全国解放后，已是沈阳市妇联主任的侯志重上寻夫路。1950年，她到北京找到安子文、帅孟奇，请求查找丈夫的死活。1954年，她到中南海福祿居找刘少奇，反映了丈夫的失踪情况，刘少奇说：“怀让是党的好同志，原则性很强”，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全力寻找。

1954年底，侯志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听了她的陈述后，马上让秘书通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周恩来分析说：“怀让同志的身体一直较弱，如果当时流放西伯利亚的话，环境那么恶劣，我想他是无法存活的；估计已经不在人世了。”

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说：“怀让和胡志明关系最好，可能在越南工作。”

山西省副省长王世英说：“怀让可能在当年出国途中被捕了。”

为找武怀让，杨之华、帅孟奇、安子文、冯仲云曾当面质问过康生。

1957年，经济学家孙冶方上书中央说，“武怀让于1936年已经死于莫斯科”。

经中央结论：武怀让是好党员、好干部。1957年6月15日，武怀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文革”开始后，侯志被捕入狱，其亲属数十人受到株连。1978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听说侯志关在北京的消息后，马上将其解救出来，并亲自将侯志搀上发往沈阳的专车。

1982年1月27日，侯志去世。在省青年宫，辽宁省委书记李涛亲自主持追悼会，沈阳市委书记吴铁鸣在悼词中盛赞了侯志战斗的一生，李铁映、徐少甫等省市领导到会为老大姐送行。

后据《中华英烈大辞典》载：武怀让1936年死于王明、康生的“莫须有”罪名。

（责任编辑：仲文）

朱德怀念第二故乡

● 倪良端

朱德出生于川北仪陇县，可他对川南这片热土有着深厚的感情。

本世纪初，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的朱德，深感旧势力的顽固和社会的黑暗，于是毅然决定“奋身军界”。1909年春，他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新编陆军蔡锷部任副班长。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人民掀起的反清保路运动，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激起全川人民广泛地开展抗击清廷的武装斗争。蔡锷领导的云南军政府从革命大局出发，派出两个旅八个营的兵力援助四川起义军。风华正茂的朱德，1911年11月15日随援川军踏上征程。

时任排长的朱德，严令士兵坚定地执行蔡锷“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练、敦友爱”的训令；他还规定在行军途中“不准打骂百姓，吃粮要给钱”等纪律。由于他模范地执行“训令”、遵守纪律，为士兵们做出了表率，以革命的民主的思想和作风带兵，博得官长的好评和士兵的衷心拥戴，受到沿途群众的真诚慰劳和热情迎送。12月中旬，朱德排所在的援川军第二梯团顺利地抵达宜宾。

援川军渡过岷江，越涧登山，强占制高点俯视宜宾全城——催科山。朱德排占据这有利的地形，监视着城内及江北的动态。当总攻击的号令一下达，朱德指挥士兵，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严密封锁城北岷江河段，有力地配合东西南各路援川军与城内清军的战斗。从城内逃窜到城

北江岸的清兵，亦遭到朱德等部的伏击和截击。就是这场战斗，这座山，成为元帅的起点，由一个排长到一代名将的起点。

1912年6月，朱德随援川军返回云南，云南军政府在昆明召开援川胜利庆功大会。蔡锷在会上热情地赞扬朱德在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代表军政府授予朱德“援川”勋章，晋升为少校。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25日，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决定组成护国军讨袁。29岁的朱德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支队长。次年2月，朱德随蔡锷进军川南至叙永，正值护国军董鸿勋部与吴佩孚、张敬尧的北洋军在纳溪、泸州一带激战，蔡锷命朱德率支队增援。朱德“以少胜多设伏机，出我精兵连合璧”，痛击北洋军“横尸遍野幻魂飞”，一举夺取了棉花坡战斗的重大胜利。进而攻占了泸州，立下卓著的战功，升任少将旅长。

时局动荡，风雨飘摇。朱德的思想和行动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烦恼、苦闷、徘徊……恰在这时，经李贞白的介绍，朱德结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重要人物——孙炳文。孙炳文，1885年出生于宜宾南溪县城郊魏家山，曾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读书时参加革命，后被孙中山以同盟会天津分会文牍部长身分推为《民国日报》总编辑。因为预谋刺杀原摄政王一事败露遭袁世凯通缉，只得潜回老家以教书为业。1917年春，朱德与孙炳文相见，孙见朱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倾心相慕；朱见孙炳文豪

爽、侠义、正直无私，深感相识太晚。

数日后，孙炳文拜会朱德，他向朱德剖析时局，严辞抨击军阀混战，介绍新思想、新潮流……一席颇有见地的谈话，照亮了朱德苦闷的心扉。由于他们年龄、知识、政见、性格、经历、情趣等都具有共同点，终于结成挚友。此刻，孙炳文坦诚而鲜明地告诉朱德：为振兴国政，决定投笔从戎，愿协助朱成就一番事业。朱德喜出望外，即聘孙炳文为旅部谘议。

自此，朱德与孙炳文朝夕相处，运筹帷幄，砥砺相勉。

此时，朱德的部属陈平辉将堂妹、南溪县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生陈玉珍介绍给丧偶的朱德，并引领朱德与陈玉珍会面。朱德与陈玉珍于1917年6月结婚，从此，“南溪成了朱德的第二故乡。”

在此期间，朱德阅读了孙炳文介绍的《新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由此，铸成了朱德“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干一番伟大事业的远大抱负。

1922年春，朱德从宜宾这块土地上出发，千辛万苦赶到上海，会合孙炳文，“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土地上”——到马克思的故乡去——系统学习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

到了1937年，抗战开始，已是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于9月5日去前线途中寄信给分别近20年的妻子陈玉珍。

玉珍：

别久念甚。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竟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等在何处？我俩母亲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败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自别后关系我的行动量你们是知道的，不再说。此问近好。

刘 钟
九月五号

（来信交山西河北八路军总指挥部转）



1924年朱德和孙炳文在德国

信中提到的理书，是朱德的二哥的儿子；尚书是朱德的侄儿，养子；宝书又名云生，是朱德的儿子朱琦，因遭国民党迫害流亡在外，当时尚未找到。信的末尾署名“刘钟”，为朱德化名，取其养母生母的姓氏。

1937年9月23日，朱德抵达山西省五台县南菇村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电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进攻之敌。25日，取得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在欢庆胜利的时刻，朱德收到陈玉珍自四川南溪寄来的信，十分高兴，即日复信。全文是：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二十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转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朱德的弟弟朱代庄——笔者注）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朱德的姐姐之子——笔者注）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



1961年朱
德在宜宾县视察
酱园

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已十几年，愉快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好。昨二十四、五两日，我们的八路军打了几个小胜仗，夺得大炮一门，弹两千多发，战车七十四辆，打死敌人千多个，俘二百多，得军用品很多，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平南飞陕，尚未见面，是否来山西还不知道。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已不过问。手此致复，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廿七日

这是目前发现的朱德于抗战初期寄回南溪两封家书，如今读来，仍感奋不已。

……

1961年4月13日下午2时许，一列绿色的专列在宜宾县境内安边火车站徐徐停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微笑着健步走下车厢。朱老总谈

笑风生地和陪同人员步出车站，踏上临金沙江岸的小土岗，举目眺望：奔腾的金沙江水流汹涌，熟悉而亲切的关河（横江）在阳光下泛起金光，欢快地注入金沙江；那火焰山、安富山矗立在大江边。朱德用手杖指着对岸与身边的同志说：“关河是从云南流入四川的，50年前，为推翻清王朝，我们援川军就是沿关河进入宜宾的。”朱德凝视着火焰山、关河，那“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的情景好似在他眼前展现。

朱德兴致很高地登上千佛岩顶俯瞰，目睹长江，朱德遥想到有万里长江第一县之称的南溪，这里有曾引荐自己与孙炳文相识的老友李贞白、有很长一段时间跟随自己的老部属谭友佛，还有许多故人、朋友……还有南溪城内故居的花圃中与陈玉珍共同亲手植下的山茶树，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当宜宾统战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朱德汇报李贞白、谭友佛已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南溪故居中的山茶花仍年年开放时，朱德说：这次见不到他们，我很歉然。我走后，你们一定要向他们讲清楚，要代我向他们问好。

夕阳洒满大地，朱德乘坐的专列沐浴着金色的晚霞，向成都方向驶去。

（责任编辑：刘文）

同温济泽最后的两次交往

●
杨兆麟

1999年4月19日(星期一),我正在南宁探亲,上午八点多钟,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广西记者站同志的电话,他通知我,赵玉明(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请他转告,我们的老领导、老战友温济泽已经在4月16日凌晨不幸病故(17日、18日是双休日,他无法找到我)。放下电话,我默默地站在窗前,缕缕哀思袭上心头,千头万绪理不清,一时难以对人诉说。窗外一片绿树、鲜花,我遥望北国,好像依稀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听到他侃侃而谈之声。就在不久以前的一两个月之内,我曾经在北京两次去看望温济泽、钱家楣夫妇,印像是那么清晰、生动,他的“天年”还没有“享尽”,怎么会如此匆匆地就与世长辞了呢,真是难以置信。

今年春节期间,按照往常的惯例,我和赵玉明相约,去给温、钱二位拜年。近年来,由于交通不便,或者住处相距很远,京城流行“电话拜年”。而温、钱二位,总是在我们登门拜访的少数人之中的。如果对他们也“电话拜年”,会有一种不敬之感。门虚掩着,我们走进客厅,家楣迎了过来,我们看到老温坐在他的住宿兼办公的房间里,正在伏案写作。我向他们抱拳致意:“恭喜不发财。”老温答道:“同喜,同喜。说得对,咱们都不是发财之人。”四个人会心地笑了,那欢快的笑声中,充满了相互之间的多年情谊和深的理解。他两手按着桌子站起来,扶着助行器,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会客室,坐到沙发上,我们也在他的对面落座。他和我都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的顾问,他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顾问,我是名誉理事,除了春节以外,我有时候还为了史学研究或者学术方面的问题前去向他请教和探讨,无拘无束,海阔天空,聊上一阵,总是有所收获。记得在1994年11月间,当时我还在担任广播电视史学会会长,定于12月中旬在福州召开理事会,为了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我去征求他的意见,本不敢请他出席会议的,不料他却说,有些想法要到会上去发个言。我不便谢绝,特地采取了“安全措施”,邀请家楣同行,还请一位中年同志和他们同机前往,途中好好照顾。老温在会上

就当代广播电视史研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地的史志工作者们都受到很大启发。当时，他拄一根拐杖就能自己慢慢行走。会后，我又同机“护送”他们回京。在飞机上，我对他说：“你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只有把你们安全送到家门口，确保无虞，我才算完成任务。”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我是很认真的。第二年夏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文集出版了，我渴望及早读到它，第二天就到他们家去了。他递给我一个精装本，银灰色封面，烫金字写着《征鸿片羽集》，上面绘着一只展翅飞翔的白色鸿雁，格调高雅、清新。他翻开扉页，亲切地对我说：“只有送给你的这一本，‘作者的话’是我自己手写的，朋友太多，不可能一本本地写，有些本都是复印了贴上去的，有些本是我签了个名。”我当即轻声读道：“我是一只鸿雁，在漫长的征途上，苦苦地飞奔了这么多年，经受烈日晒，狂风吹，暴雨淋，雷电轰，剩下这稀疏的片片羽毛。现在我把它作为自己人生旅程记录中留下的断简残篇，献给已牺牲、已病故和尚幸存的战友，以及年轻的同志和朋友们。”我作为“尚幸存的战友”之一，深知这本著作绝非“轻如鸿毛”，虽然他自谦为“断简残篇”，而从1940年到1994年撰写的一百多篇文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分量是沉甸甸的。我当时怎么会想得到他手写的那一段“作者的话”，竟成为留给我的绝笔呢！从那次见面到现在，三年多的时光，这位耄耋之人虽然显得苍老，但脸色不错，精神还好，思路有条不紊，谈吐也很流畅。他告诉我们，他的回忆录书稿已经完成，交给出版社了。我知道他的一生经历坎坷，青年时期吃过国民党的牢狱之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60年代又难逃“文革”的浩劫。获得“平反”以后，他身体里似乎储存着使用不完的精力，从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新闻教育等方面的工作。离休以后，主编了10卷本《革命烈士传》，筹办和主编《中华英烈》杂志，着手主编《瞿秋白文集》。和他一同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们，大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既没有办公地点，没有经费，也没有任何报酬，其困难的程度可以想见。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重要历史题材的文章，包括为王实味惨死于“自己

人”枪口之下的冤案平反（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等，观点鲜明，材料翔实，消除了我头脑中多年来的疑团。我认真阅读他写的文章，常常钦佩和感慨地想：“他哪里像一位八十老翁啊。”他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和精力，14卷本的《瞿秋白文集》终于编完了，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他告诉我，今年是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瞿秋白的故乡常州的纪念馆将要举行铜像揭幕典礼，他准备去参加。我有些担心地说：“你怎么还能出远门呢。”他说：“我16岁那年读了瞿秋白的书，有了革命觉悟，决心参加共青团，多年来一直非常尊敬他。常州市的瞿秋白纪念馆从开始筹建，就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次，江苏省的瞿秋白研究会和常州市瞿秋白纪念馆都派人到北京来，邀请我参加揭幕典礼，我怎么能不去呢。”我们谈兴正浓，又有别的朋友来拜年，我们起身告辞。出门下楼，我对老赵说：“他今年已经85岁了，还这样不辞辛劳，努力工作，而且每项工作都分量不轻啊。”老赵也有同感。老温比我大10岁，从来没有“垂垂老矣”之感，从他身上我汲取了很大的精神力量，鼓舞自己笔耕不辍，尽可能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三月五日，我又去看望他，一来是想听听他对广播电视史研究工作的意见，为我们定于四月中旬召开的会议做准备；二来是我的一本文集已经编完，书名为《一个记者的足迹——半世纪作品选》，打算请他作序。我原本想，他既然可以远去常州，又能编书著文，序言的内容如何并不在长短，有千把字就可以了，对他来说，大概不算困难吧。我并不想追求“名人效应”，以“抬高身价”，而是由于我1947年3月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他当时担任编辑部主任，是我从事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一位顶头上司，应该是作序的最合适的人选，也是为了以此来纪念我们之间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注意到他的脸色有些发黄，精神也不如半个多月以前，说话有些吃力。家楣对我说：“他从常州回到北京，又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瞿秋白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恰好，《瞿秋白文集》的第一卷印了出来，出版社送到了会场上。他在会上的发言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有的人感动得流

泪。有些人在会上发言，对于他如此高龄，还不辞辛劳，不计名利，十几年勤恳工作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生动体现。会后有不少人要求和他合影留念。他多年来含辛茹苦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兴奋的心情很多天都不能平息，连生活规律也改变了。以前他看完《新闻联播》，八点多就上床了。这些天，他看完新闻以后，躺在床上还要看报、看杂志，往往到十一点才熄灯。第二天就是伏案工作，我看他太疲倦了，可是我怎么劝也不听。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办法。”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昨天是三月四号，正在吃早饭，他忽然大咳不止，好不容易才吐出几口痰来。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到医院去检查过，总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平复。这次吐出痰来，喉咙里老是咯咯地响，吐一口痰很吃力。”我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把请他作序的愿望深深埋在了心中，以后也没有请别人作序，只是把我原来写的“后记”改为“前言”了。我问，他是不是患了咽炎？家楣说：可能是咽炎，我多年来患咽炎，症状也是这样。我告诉他们，我认识大连的一位中医，根据祖传秘方，自己配制了一种药面，治疗咽炎的效果很好，我可以写信去，请他把药面寄来。老温提到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正准备写一篇论文。我劝他少说话，只听我说就行了。我告诉他，我最近看到《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欧远方，大意是说：“五四”运动的宗旨，随着时代的进步，要不断充实和完善，当前政治改革的实质是民主，民主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他认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公式值得商榷，因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就存在着制度方面的问题，对领导人缺少严格而有效的监督，以致把“集中指导”变成了个人专断的独裁，违反了“五四”运动的宗旨，几乎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欧远方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不可分的，既然可以是民主化，为什么一提自由化就被当作一个贬义词呢；民主、自由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下个世纪还要继续努力。老温说：“我最近忙着完成回忆录的书稿，顾不上别的，你说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以后有

空要找来看看。”我见他精神不大好，说上两句就气喘，觉得不便久留，就向他们告别了。他说：“谢谢你来看我们，家楣送送你，我就不送了。”我赶忙双手示意：“你可别动，好好休息。”他还是那样和蔼可亲，向我招招手说：“再见。”我也回过头来向他招手致意。在回家的路上，我记起他在1987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心情·疾病·健康》，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楚。”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认为“美好的心情”就是“一种乐观、豁达、向上的心情”。我在延安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患有肺病，以后养好了，50年代曾经复发，一年多就痊愈了。十年灾难期间，他患心肌梗塞，两个多月以后，很快就见到他了。80年代患脑血栓，半身偏瘫，三个多月以后又重新走动了。这一方面靠的是及时、有效的治疗，一方面靠的是他那种“乐观、豁达、向上的心情”。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中，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忧伤的表现，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哪怕是半句哀叹，而常说“笑一笑，十年少”。在他70多岁、我60多岁的那些年，我们通电话的时候，还像延安、太行、平山乃至解放初期那样，经常互称：“小温”、“小杨”，接着是一阵开怀大笑，似乎童心未泯，又回到了青春年代。到他过了80岁，我就不好意思叫他“小温”了，改用“老”字，而也不叫“温老”，那似乎有些生份，他对我则“直呼其名”。只是在起草这篇悼念文章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写下“温老”二字，以表敬意，可是九泉之下的他已经看不到了。几十年来，我们互相从来没有用过“官称”，后来，在人与人之间树起一种无形的隔阂，显得疏远起来。我对他说过：“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年，很多人都在叫这个‘长’那个‘长’的，你不叫他什么‘长’，他还不高兴呢。官气一多，必定脱离群众。”他很赞成我的观点。

过了两天，我给家楣打电话，说已经给大连的朋友去信，并询问药面的事，她告诉我，老温在3月9日住院了，经检查是患肺炎，目前医院不让朋友探视。我相信，疾病难以征服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对她说：“请你放宽心，我四月下旬回北京，再去看望你们。”

4月1日,我先到河南采访,准备写一篇有关农村题材的通讯;4月10日到达长沙,转往常德开会,前来主持会议的赵玉明告诉我,临行之前得知,老温的病情不见好转,医院还是不让探视,我仍然没有感到情况多么严重,直到在南宁听到噩耗,实在出乎意外。我耳畔又响起了他最后一次向我说“再见”的那亲切的声音,可是,竟然“再”也“见”不到他了。如今,我的文集中,除了悼念老战友高而公、齐越的文章以外,又要收入悼念老温的文章,再增加一分沉重,不免感慨万端。

回北京以后,一天上午,我和老伴杜婉华(北平解放之初,她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播音员,和他们也是老相识,他们一直称她为“小杜”)去看望家楣。客厅里摆着老温的遗像,镜框上挂着黑纱,他身着西装,笑容可掬,好像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遗像前摆满了一些单位、老战友和晚辈们送的花圈。我们肃立默哀,恭敬地向遗像三鞠躬。我两眼满含热泪,强忍着没有流下来,偷偷地用手指擦了擦眼角,以免引得家楣伤心。我注视着他以前习惯坐的那个沙发,今天却空不见人了。我对家楣说:“他已经走了,真是没有想到啊。”她说:“我们家里的人也是没有想到。以前三次病重住院,都出来了,这次却再也回不来了。他自己也一样,认为治一治,住些日子就会出来的,丝毫没有一去不归的精神准备。”我默然无语,静听她的叙述:“入院之前,他看完了回忆录的一校清样,大约30多万字,在3月8日交给了帮助他整理书稿的出版社的编辑。住院以后,他要我把没有定稿的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和钢笔、眼镜等带去,还要在病中坚持工作。可是,住院以后,病情越来越重,只好把回忆录二校以后的事都拜托给出版社了。他常常发烧、昏睡。可是,只要清醒过来,就谈他计划要做的事,出院以后还要编两本书,一本是《瞿秋白和鲁迅》,一本是《怀念集》,除了已经发表的怀念老战友的文章以外,还要写关于刘少奇、田家英、邓拓、丁一岚等十个人的文章。他虽然说话很吃力,不断气喘,还是给田家英的女儿打电话,一说就是半个小时,商量文章的内容。他特地把《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中的《名

流写真》一书带到病房,因为其中有曾自、曹应旺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一文,准备看一看,作为参考。4月15日上午,他的精神好转,又谈起回忆录的事,说还要加上两小段,一定让我打电话请出版社的编辑到医院来。可是,由于插着鼻饲管,总是张着嘴呼吸,说话非常吃力,我劝他好好休息,要增加什么,等出院以后再说吧。”我非常理解她说的这些情景,从我走进延安清凉山的那孔窑洞开始,不但向他学习了编写广播稿的基本原则,而且从他身上学习了严肃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几十年如一日,从未稍有懈怠,直到临终之前,正如他经常所自勉的,还是尽力做一头“老黄牛”,根本没有想到不久就要永远告别人世。家楣说:“他生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从来没有想过身后的事,只想着要做的一件接一件的工作。我们的外孙女在德国留学,就要在4月18日他的生日那天,打长途电话到病房来,向他表示祝贺;他甚至还说在外孙女将来回国的时候,要到飞机场去接她回家;可惜只差了三天,他就撒手人寰了。而回忆录的出版只差一个月,他也没有看到。他的那种乐观、进取的精神状态,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也忘了他的年纪,忘了他的疾病,总以为他还会活很多年,从来没有很快要离我们而去的思想准备。”我们三人一同唏嘘不已。我心中感叹:“这位可敬的‘老黄牛’,真正是勤奋耕作,埋头苦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往事如烟,绵绵长久,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我对家楣说:“半个多世纪的交往,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我是先认识老温的,你那时候在播音组,咱们在延安没有见面。撤退到瓦窑堡以后,老温和我们几个编辑在史家畔工作,你们几个机务员和播音员在好坪沟工作,咱们还没有见面。一直行军到太行山,咱们才见面,只比老温晚几个月,也交往50多年了。”她说:“是啊,所有这些情景,都难以忘怀呀。”

时近中午,我们和家楣握手告别,一再对这位老友说:“多多保重。”(责任编辑:方实)
(作者系高级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

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

● 余广人

1959年7-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至今整整40年了；在庐山会议挨整的彭德怀元帅到今年，也逝世25周年了。庐山会议犹如一口长鸣的警钟，只要稍有撞击，就会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并从中获取对未来影响深远的警示。

从批“左”到反右、从“神仙会”到急风骤雨的路线斗争的庐山会议，到底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彭总事后曾私下对他的侄女彭钢透露：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现在这么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办？只要能维护党的威信，只要人民能够得到幸福，有饭吃、有衣穿，就是说我错一千次、一万次都无所谓。我一个彭德怀算不了什么。”（1998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

30年后，曾出席庐山会议并著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李锐，在该书《前言》中说：“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对于这次庐山会议，研究党史的人们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7月2日至22日，后期23日至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期转为大反右倾，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并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彭总的“意见书”何以能导致会议发生这样

大的转折？很多人作过思考。

李锐的看法是：尽管在庐山会议以前的两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有过纠“左”措施，但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即使“神仙会”期间（指7月2日至16日）对提出的问题，也还存在分歧，并不是上下看法都一致了。“所以，庐山这场风波，从发生大争论来说，是必然的；但是后来出现如此‘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可怕局面，则有一定的偶然性。”

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薄一波认为，会议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当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866页）

亲历者的看法和观点，无疑使人们对这次会议转向的思考有重要启示。因此，我在立意要写这篇纪念文章时，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还是这个问题。

“大跃进”是 “成绩伟大”吗？

7月2日会议，毛泽东首先作了发言，他用三句话估计1958年的形势：“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后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总结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十二个字，为毛所采纳，并希望以此为会议定调。

毛泽东讲的“问题不少”包括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根本问题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一窝蜂搞起来的人民公社、全民炼钢，产生的恶果，无论如何是需要深刻反省的。毛对此并不讳言。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9个月，已经得到认真的纠正，盲目性、共产风、浮夸、主观主义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而“问题不少”主要是指过去。现在呢，对于平衡问题有了一套解决办法了，“形势又好转了”，也就是说已步入“前途光明”的境地了。因为有如此的认识，毛并没有提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根本问题是指导思想的“左”的问题。

在上庐山的诸位要员中，有多少人同意毛的看法，毛心中是有数的。但是，他为自己开脱的逻辑：“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着，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可见，他也明白自己八个月前在徐水曾为粮食吃不完、需寻找出路而发的议论已成了空话，而只得寄希望于“前途光明”了。至于明年无数农民默默饿死这一惨剧，则是他在庐山时万万料想不到的。为安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特地将曾受到他贬斥的、对经济问题确实比较内行的陈云表扬了一番：“过去陈云同志说，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既然有“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着”的心态，毛显然对来自“促退派”的意见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而且他坚信，这次会议会按照他的意图，将高层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下山后继续沿着他指示的航向“大跃进”。

但是，就在毛寄希望于明年的此刻，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1959年1月，按照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指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关门下去“参加大跃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来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全国第一个“千斤省”（平均亩产）的大跃进实况。刚到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过的，

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她和张闻天于1959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回忆张闻天》）。4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谢春涛《大跃进狂澜》）。

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领导干部，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交的副总理薄一波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这年夏天彭德怀在湖南时与薄相遇，两人对“浮夸要害死人的”情况深有同感；关于工交方面，在会前，薄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薄未参加，会议转向后，这份材料也只好成为废纸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上海会议结束后返京途中曾对同车的张闻天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分了”。经济情况的紧张程度，时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当然也知道，他后来回忆说：“1959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陈国栋：《怀念周恩来》）。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这些后来成为“反党集团”的人，他们了解的情况就更多了。即使是“大跃进”积极推波助澜的柯庆施，也曾“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

毛泽东对此也了然于胸。在7月23日毛泽东批彭总后，会议作为反面材料印发的《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等材料，以及会上议论很多的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的事件。李锐说：“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尤其是技术人员，以他们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乃至总路线，提出了根本怀疑和否定性的看法。”但是，即使面对这个现实，毛泽东仍然认为：形势虽然坏，“但坏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这样，党内的不同意见在会上发生冲突便

很难避免了。

为什么是彭总上书？

毛泽东定下调子以后，虽然与会者对于“成绩伟大”一词，没有人公开否定，但有所发挥的还是在“问题不少”这一点上；而对于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的说法，多数人也只对后半句感兴趣。即使刘本人在7月4日的小组会上也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这无异于在说“大跃进”的成绩是零。与会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外，对“成绩”毫无兴趣。

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会上比别人更敢说话。他发言说：“大炼钢铁，全民上阵，土高炉、小高炉，炼出来一大堆废物，劳民伤财啊！”他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不如八百万吨”。等于直接批评了毛泽东，因为1958年将钢产计划由八百万吨增至一千零七十万吨正是毛的主意，而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炼钢”，正是从“1070”这四个字引发出来的。

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每天都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吃饭不要钱”、“全民办钢铁”、“砸锅”办食堂等陆续加以抨击，对毛泽东本人也有

所批评，譬如：“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这无疑是对毛品质的非议。更为尖锐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毛的“左”倾：“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可能是由于直觉，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会议上说的“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的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如此直言批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还是头一遭。

一直关注会议的毛泽东，面对这些“促退派”的发言的感受如何呢？在7月10日要讲话之前的9日夜，“拂晓前，疲惫不堪的卫士发现，本已睡觉的毛泽东又斜靠在床栏上吸烟了”（见《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在“这个难眠之夜”，毛泽东想必是思绪万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不让会议失控。

7月10日，毛作了个“要党内团结，首先要将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的讲话。一方面，他进一步退让，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不再说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型，却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

社，或者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总路线“根本不会错”，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既要稳住阵脚，又要平息与会者的不满，毛只得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

虽然在不长的讲话中，毛泽东承认错误缺点的话有12次，告诫“促进派”对提意见者不戴“什



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湘潭地区乌石公社调查时同群众在一起

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的帽子达4次,但毛“付学费”的结论显然不能服众。尤其是彭德怀,他骨鲠在喉,该同毛泽东谈的还没好好谈呢。

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毛与彭裂痕历史悠久使之然。此说的偏颇,是把毛、彭两位革命家历史上的恩怨看得过重了。

以笔者之见,彭总为什么在此非说话不可?简言之,在彭总看来,当时中国政坛已没有人敢于再讲话了。人们不敢讲话的原因有很多,重要的一条是“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数十万右派分子被批倒、斗臭,凡划了右派的一律被取消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人们除了可以重复“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一类口号之外,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好,党外知识界人士也好,已不再有资格、不再有胆量为民请命了。

1960年,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被撵出中南海的彭德怀,向他的侄女彭钢讲述了关于这次上书的过程后,彭钢忍不住问伯伯:“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彭德怀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萦耳不绝。

一生军旅,当了元帅的彭德怀,出生贫苦农家,始终不忘人民的疾苦。1958年10月自甘肃回京途中,他曾去了一趟延安,虽然当时延安开始出现大饥饿的情况他还不了解,但人民生活困苦却是一目了然的。他激动地对几百名延安地区的干部说:“延安这里的情况,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么多年了,延安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我们每个人都得问问自己。”

“大跃进”刚开始,彭德怀也是抱着支持态度的,曾经几次讲过“大跃进”的好处。但当其浮夸、共产风的恶果出现时,他慢慢冷静下来,开始以审视的目光对待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此后,他每到一处就要说一番。在一个军区,他说:“炼钢得不偿失。用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账不算是不行的。”

6月底,彭德怀在赴庐山开会途中见铁路两旁中州古道上走着三五成群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逃荒者,郑州车站广场上到处可见伸手乞讨的农民。这情景,让他吃不下饭,自然而然地想起他湖南之行。1958年年底,彭总回到湖南湘潭县的故乡。刚到家,就被公社敬老院的老人拉走了。老人们掀开食堂的大锅盖让他看:一锅青菜,菜里夹着几粒米星星,老人吃的就是这些。也许最刺痛彭总的心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他老家乌石村的一棵大树底下,一位老人要给他下跪,请他“上天言好事”,彭当即哭了,热泪滚滚地说:“你是我的父老,日子过得这么糟,该我给你下跪!”

他答应了老乡要向毛主席报告,那就一定要报告的。因此,在毛宣布会要结束的时候,他告诉周小舟想找毛谈谈。周的观点与彭大致相同。彭回湖南时,周曾陪了他三天,两人一起看到为搞“居民点”将村庄拆迁一空的情形,看到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景,听过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因此,周见彭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谈一次,便怂恿道:“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周把7月11日夜与毛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并建议彭将自己的几次发言整理成文。这便有彭德怀在7月14日会议将结束的前一天的上书之举,从而引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个人崇拜与 庐山会议的转向

彭德怀的信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分的主旨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部分中,刻意迎合毛泽东的地方有好几处,譬如“农村公社化,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等等。即使在讲到全民大炼钢铁时,还说了“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调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等好话,并指明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得也有失”。乙部分主要谈的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问题。在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经的地方,从后来的批判



这是1958年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在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字样，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看，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以及认为大跃进的失误是“政治性的”。

这些话尽管很刺激，但庐山会议的转向是否就是因此而起，还颇有思量的余地。据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毛最初看到彭的信时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敢讲真话的，容易得罪人。傍晚，毛泽东散步时，一位负责人已经知道彭德怀写信的事，对毛泽东说：彭总解散中南海军乐团时，说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议从各个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总也反对，也说特殊化……对此毛泽东只“唔”了一声，笑笑，没表态。但此前他听到告状的话总是要表态的。比如形势座谈会开始不久，几位“促进派”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的发言有问题”，毛泽东都是漫不经意地将手一拂：“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见《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195页）。可见，毛当时对彭的信及其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过多的想法。

从彭总的信来看，谁也不能否认是讲了真话的。信中所说的“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虽然后来受攻击比较厉害，但并不比小组会上那些“促退派”们讲“得不偿失”、“有损

无益”更严重。而且即使是毛，在23日的讲话中也承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一点”。可见，后来毛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已是“项庄舞剑”了。可是，毛心目中的“沛公”——彭的信到底那一点引起了他的不满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先应该看一下张闻天的发言。

张闻天是个留美也留过俄的知识分子，书卷气十足。遵义会议前后，他服膺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支持毛的正确路线，并在党内甘居毛的副手地位。为此曾受过党内同事的讥讽，他的回答却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毛曾称赞他说：“你是一个开明之君。”（见《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李锐的文章）1942年延安整风，张闻天主动将权交给毛，自己下乡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从此脱离了中共的决策圈。

张闻天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一样，一贯服膺毛泽东。但是毛在1958年的行为使他改变了看法。在庐山会议初期，他对秘书不点名地批评过毛泽东：“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了头脑。”7月19日，他决心介入论战，支持彭德怀，并自己动手写提纲，准备在会上发言。正是这个时候，毛的秘书田家英打电

话给他，说毛刚说过不能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议他回避供给制、食堂问题，不要谈。张却决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惜与毛正面冲突。

21日，他在柯庆施主持的小组会上讲了3个小时。其间以柯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时打断他，反驳他，而同情他的却无一人敢吱声，连黄克诚也没敢挺身而出。黄事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觉为闻天同志捏了一把汗。”尽管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说了“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很坚强”，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等等。但通读张闻天的发言，正如批判他时，某些有心人让秘书所作的统计那样：8000多字的发言记录稿中，讲成绩只有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前虚晃一枪，后面便大做‘缺点’的文章”，用了108个“损失”或“最大损失”。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失误的原因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张闻天在发言中说：“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等于是批评毛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此外，张闻天还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弦外之音，也是对毛言行不一的批评。这一批评虽然措词不很激烈，却也是共产党执政10年来毛泽东从未听过的。

张闻天的话，使人很容易想起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促使毛泽东在23日会上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这就是说，促使毛泽东拿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

信条进行反击并迫使庐山会议转向的正是这一点。

很多人在论及对毛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时，总是说由于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中的英明决策，奠定了他无可置疑的历史地位，以至发展到神化他的地步。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即由于党内存在的封建意识的影响，甚至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也有意无意地把毛视作真理的化身，自觉不自觉地把毛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君臣之道取代无产阶级政党中党员与领袖的正常关系，从而加剧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公然声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李锐将柯的讲话告诉毛泽东，本以为毛会斥之为无稽，不料毛却不以为然。3月10日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有这样意味深长的讲话：“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是感兴趣的。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对此讲得并不多，也只有两句牢骚而已：“在西楼讲过，不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什么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但即使如此，与会者还是看到了这一点。敏感地感受到了毛的讲话的非同寻常。据李锐回忆：听完毛的讲话，“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

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她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真正触及这个问题,是在揭发“军事俱乐部”并给彭、黄、张、周定性后8月11日和8月16日的两次谈话中。在前一次谈话中,毛在第九个问题中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而且数次冷嘲热讽地说:“不是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吗?”、“不是讲要‘民主’吗?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在后一次谈话中,就更加无所顾忌了,毛说:“我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

这是毛泽东在具体地阐发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在8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书记处送来的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毛泽东和列宁的语录上,作了长达800字的批语,其愤怒之情一览无余:“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坚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说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

呢?”

这才是毛反击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关键所在。因此,这次会议所留下的《决议》中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

彭德怀的问题有了“定论”,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成了不可置疑的“真理”,8月17日,全会闭幕的第二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发言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赞扬毛泽东,消除因彭德怀而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的影响。他说“在苏共20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

刘少奇绝不会想到悲剧会来得这样早,7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当刘少奇想起拿出《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个人崇拜所引发的那场浩劫,早已将《宪法》践踏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70年底访问中国,会见毛之后写的《漫长的革命》中写道:

“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从1966年到现在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

“文革”中,毛泽东利用业已如火如荼的对他的个人崇拜,煽动无知的青年“誓死保卫毛主席”,轻而易举地将刘少奇打倒,这一定是曾认为搞一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刘少奇从未料到的。论及至此,李锐以杜牧的《过秦论》中的两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但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局面在中国大地绝迹。
(责任编辑:文 贤)

赵健民冤案的教训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序

● 廖盖隆

丁龙嘉和听雨合著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本书，是很有可读性和教育意义的。它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是名副其实的真实纪录，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信史。

正如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张铨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赵健民“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革”十年浩劫中许多冤案中的一个实例。正如张铨秀所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亿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而且也对后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每一位严肃的共产党人，都应正视‘文革’，重视‘文革’史的研究。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让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史，从中汲取教训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过去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

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思想政治影响远未肃清。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光荣伟大的民族，又是在国内长期遭受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和摧残，一百多年来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反抗，就会被这些内外压迫者、奴役者施以酷刑拷打或像割草一样杀死。反过来说，被压迫者、被奴役者，在对压迫者、奴役者的斗争中，甚至在人民内部的斗争中，也常常使用非人性的手段，即采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手段，这就成为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沉重的负担。我们个别的或者少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幸也背上了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

因此，卓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曾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采用肉刑。”他在1948年1月12日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说：“乱打人乱杀人和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

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任弼时在这个讲话中还指出:“应该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对地主原则上只应该是在经济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扫地出门,以致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对人数达到三千万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仅不应该乱打乱杀,而且在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以后,还应该分给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使他们改造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毛泽东对任弼时上述这篇理论结合实际、很有说服力的讲话非常赞许,将它稍加修改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从而使当时全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以前,任弼时在1944年11月4日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到要记取党的历史教训,不要乱打人乱杀人。他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老百姓对于我们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上述任弼时这篇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全党贯彻执行的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使用肉刑的,是坚决保障人权的。凡是乱打人乱杀人和使用肉刑,都是不能容许的,都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纪党法的。凡是这样做的,都不是真的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和形象。对这种行为,任何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都有权批评、检举、揭发、监督,以维护党的信誉和形象。这就是说,我们要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行为,要坚决保障人权、废除肉刑,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如果以为对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和敌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而他们又再不反抗、不捣乱、不破坏的条件下,也要使



1989年,赵健民来到关押过他的云南省第三监狱

用肉刑和乱打乱杀,而不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对待战争中的俘虏,我们历来都实行宽待政策,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搜他们的腰包,不没收他们的财物一样。

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部纪录、分析这一特大冤案的书中,制造冤案的奸徒是恶名昭著的康生。康生(1898-1975),是山东诸城人,原名张宗可,又名赵容。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900页记载,他的为人是“一贯以极‘左’的面目搞阴谋诡计,‘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勾结,直接参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5年12月16日病死”。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康生的罪行被揭露。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武装叛乱、反革命诬告陷害等罪行，因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历史的事实证明，康生是一个钻进党内猎取重大权势地位的阴谋家，他曾取得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显赫权势地位，自以为人莫予毒。他绝对想不到，他的严重罪行，即使在死后也还被揭露出来，并被开除党籍，落了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与康生勾结起来制造“赵健民冤案”的是当时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当康生宣布他凭四十多年革命的“敏感”断定赵健民是一个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的叛徒时，谢富治就立即宣布拘留审查赵健民，让他预先召来的武装人员即刻将赵健民抓走。谢富治（1906-1972），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在历史上曾有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同康生一样，是一个钻进党内谋取权势地位的阴谋家。据前述《中国人名大辞典》第2064页记载，他除取得了上将军衔外，1965年还取得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权势地位。他的政治真面目，在“文革”中才暴露。他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死后的1980年，罪行被揭露，并被开除党籍。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也是因为已死，才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在康生伙同谢富治所制造的“赵健民冤案”中，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死逼死。这是多么惊人、多么严重的罪行！

至于受到康生迫害的赵健民，却同康生相反，是一位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不惜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且胸怀天下，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人。据上述《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512页记载，赵健民（1912-），是山东冠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

记，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9年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营长，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军长兼政委。参加了陇海、淮海、渡江、解放西南等多次大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正部级顾问组组长。他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健民所以从主持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全面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职位上辞退下来，改任顾问组长，是他自己出于全局考虑而主动要求这样做的。当时，党中央决定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号召老同志主动退居二线，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担任一线主要职务，并帮助年轻同志做好工作。赵健民是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作出辞退决定的。

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91年11月27日，赵健民在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就“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东欧、苏联都变了，出乎意料，我想不到”。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能够成功？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联系我们党的情况指出，“胡耀邦同志曾讲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没实现，赵紫阳同志搞的廉政建设座谈纪要，没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到不出大的失误，下力量解决好党风好转、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认识到当前党和国家的腐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问题是我党和国家的心腹之患，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也免不了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道路，在反‘和平演变’上打败仗”。

赵健民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反腐败必须抓落实。他提出了落实反腐败的四点具体措施：第一，中央要认识到当前腐败问题的严



“文革”前夕的赵健民

重性，要紧紧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支持有关部门碰硬；第二，要发动群众，以整风精神解决腐败问题；第三，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体制中的某些问题，要进一步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而不是陷入具体事务中；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克服腐败现象。

赵健民的这个讲话，当时就得到了刘澜涛等老同志的称赞，认为讲得好。

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赵健民应邀参加了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并作了发言。会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在发言中，赵健民强调指出，中共八大有三条经验教训特别值得借鉴，这就是，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第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建设。

在讲到最后一条时，赵健民说：“党的建设

是各项工作的核心。党的建设搞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应当看到，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极大地危害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八大反复强调党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那就要丧失民心，导致亡党。腐败不除掉，说代表人民是自欺欺人。反腐倡廉，是一项综合工程，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加强群众监督，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

在发言的结尾，赵健民说：“在纪念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依靠工人、农民、广大人民，清除一切大小上下的贪污腐败分子，做到一切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综观赵健民自1981年退出第一线以来的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注的主要是三个问题：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而这三个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张铨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还告诉我们，赵健民在50年代担任山东省省长时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坦率直言的好党员，他曾表示不同意将向明、王少庸定为反党集团；在“大跃进”中他不相信聊城等地区能亩产万斤粮，因而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销省长的职务。赵健民不但不同意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强加给他的这些罪名，而且还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省党代表会上据理进行了反驳。在“文革”中，当康生依仗权势，无理地说他根据革命四十多年的“敏感”断定赵健民是个叛徒，对党有刻骨的仇恨时，赵健民同样地敢于蔑视和否认。尽管康生事先就同谢富治勾结好，当康生诬蔑赵时，谢富治即将赵拘捕审查，但赵在监狱中始终没有屈服，勇敢地进行抗争。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赵健民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坚持真理者必将胜利；践踏真理的恶人，如康生、谢富治之流，一定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飞行将军曾克林

● 李忠效

1949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我们不仅应该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10月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

这时，曾克林接到上级通知赶到北京。在中南海，朱德接见了。朱老总慈祥地与他交谈，还剥水果糖给他吃。

朱老总对曾克林是熟悉的。早在1945年9月，曾克林曾在延安当面向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对中央及时调整战略方针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曾克林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司令员。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曾克林率部挺进东北，解放山海关、



锦州等重镇，从苏军手中接收沈阳，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缴械和收编了日伪军警和国民党地下“先遣军”两万多人，这都给朱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老总告诉他：“现在空军刚组建，需要大批干部，准备调你到空军工作怎么样？”

曾克林心里有些打鼓。他觉得飞机驾驶舱里的各种仪表很多，文化低的人根本没法驾驶。朱老总为何选他来干空军？可能是他与航空有点“机缘”吧。因他过去在东北南满剿匪期间，曾收编过日本一支飞行队。

当时沈阳附近的辽阳有个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和99高级教练机，任务是训练从日本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个飞行大队的官兵既不愿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我军投降。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多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

跑。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企图占山为匪。这时被曾克林的部队发现，迅速将其包围。曾克林接到报告后，决定收编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他命令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很快，日本航空队被顺利解除武装。几天以后，曾克林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设宴招待林弥一郎等十几名军官，要求他们回到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调用，在工作中将功赎罪。林弥一郎等人在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心悦诚服地回到了辽阳奉集堡机场。这次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还有各种器件和配件；收编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

10月上旬，曾克林将收编日本航空队的情况向彭真和伍修权作了报告，彭真和伍修权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召见了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彭真提出让他们参加筹建航空学校的工作。10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成立。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后迁移到牡丹江），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我军收编的日本空、地勤人员成了学校的教员。

这次从朱老总那里领受任务以后，曾克林便和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及王首道等一起到达

南京，得到陈毅的大力支持。首先在南京成立了旅部，任命聂凤智为旅长，刘善本为副旅长，曾克林任军代表。然后着手组建飞行团。先后在南京大校场、上海江湾和徐州组建了3个飞行团，南京为轰炸机团，上海和徐州为歼击机团。3个团的飞机一部分由东北飞来，一部分是华东野战军缴获的国民党飞机。

1950年10月，为了参加抗美援朝，航空混成旅的3个团扩建为3个师，其中一个歼击机师立即飞赴东北安东（今丹东）。曾克林也奉命赶到安东浪头机场。不久，上级来了命令，调曾克林去空军第一航校学习。

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后，空军司令部决定组建6所新的航校。其中以东北牡丹江老航校的一大队为基础，在哈尔滨组建了空军第一所轰炸机航校。曾克林在这里的同期学员共有400多人，大部分来自陆军，其中有20多名师、团领导干部，只有曾克林和段苏权是军职干部、老红军。

从陆军到空军，从握枪杆到握驾驶杆，这是曾克林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摆在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

航校初创时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学员们都住在航校刚买来的几栋旧楼房里，房间不够，就睡上下铺。曾克林和段苏权是高级干部，学校

为了照顾他俩，给他们安排在马家沟机场修理厂旁边的一栋平房里，每人一间，并让他俩的警卫员同住。

最难过的是学习关。曾克林小时候只上过两年私塾，参加革命后虽然学了一点文化，但是就凭这点文化来学习航空飞行知识，显然是很不够的。当时他已经37岁了，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

轰炸机分驾驶、领航、通信三个兵科，学



1958年曾克林下连“当兵”

校分配曾克林到驾驶兵科学习。理论课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发动机、无线电、领航、战术、射击、气象等近 20 门课程。担任教学的教员大多是苏联专家。为了尽快掌握航空理论技术，曾克林几乎不外出，白天在课堂上认真学，晚上躺在床上也看教材，背数据，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把复杂的飞行原理、力学公式一个个弄懂弄通了。经过两个月的理论学习，通过苏联专家、学校领导和教员的“三堂会审”，他以理论课平均良好的成绩，获得了结业证书。

理论课结束后，开始进行座舱实习和带飞。当时，航校的飞机有初级、中级、高级三种教练机，均是苏联制造。他们开始飞的初级教练机为“雅克-18”。1951 年元旦一过，苏联教员带他们上飞机实习，进行感觉飞行。原来以为在蓝天白云间飞行一定非常浪漫，富有诗意，没想到一上天，心里就紧张，呕吐不止。为了加强平衡机能的锻炼，他们在地面加紧练习转梯和滚轮。大家很快就闯过难关，战胜了晕机。

曾克林的苏联教员带飞时非常认真，对曾克林的帮助很大。曾克林仔细体会教员的每一个示范动作，反复背诵每一个飞行数据，经过勤学苦练，他终于稳定地掌握了飞行技术。

1951 年春，学校飞行顾问巴甫连科对曾克林进行“放单飞”考核，曾克林顺利过关。在场的领导、苏联专家和教员干部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1951 年 6 月，曾克林转到离哈尔滨市约 12 公里的双榆树机场，开始学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这种机型为“乌特伯-2”。转换一个机型，又要学习一次理论，但因为有了基础，就不感到吃力了。3 个月之后，曾克林就在“乌特伯-2”机型上毕业了。接着，他又开始进行高级教练机“杜-2”的训练。5 个月之后，他便掌握了“杜-2”的飞行技术。

毕业考试来临了。担任“杜-2”考核的教官是校长顾问格鲁申科少将。这位将军以技术高超、对学员的飞行非常挑剔著称。但是，在他带曾克林上天飞了一圈后，出人意料地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哈拉索(好)。



曾克林近影

经过一年半学习，曾克林他们这期学员于 1952 年 3 月正式毕业，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和曾克林一同学习驾驶的 136 名学员当中，有 30 多人由于各种原因被淘汰，段苏权已于一年前离开航校另行分配工作。曾克林成为毕业学员中唯一的军职干部。

曾克林从航校毕业后，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到海军去参加组建海军航空兵。他被任命为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兼航空兵一师师长。他领导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一支战斗部队——海军航空兵水鱼雷轰炸机师。此后，他作为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又参加和指导了其他几个师的组建工作。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会飞行的将军。

(责任编辑：刘文)

李时雨 卧底敌营 18年

● 姜 国

—

50年前的春天——1949年4月29日，刚进北京城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刘少奇，紧紧握着一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青年人的手，感慨不已道：“我在中央北方局当书记和在新四军当政委时，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这位青年名叫李时雨，1908年出生在黑龙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雌凤岗屯一个大地主家庭。1926年3月，他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在这里，他遇见了地下党员林枫（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193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地下特工的传奇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市委组织部长林枫找到李时雨，商议派他到东北军充当内线。

李时雨为此找到了张学孟。张是李时雨的同乡好友，也是少年时的同学。他曾东渡扶桑，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营长，此时已调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张学孟慨然答应了老同学的要求。经他举荐，李时雨来到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由于张学孟担任张学良公馆内的警卫室主

任，李时雨无阻拦地常进出金家巷5号张公馆。他常利用和卫士们闲聊的工夫，向他们宣传我党提出的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日拂晓，李时雨受命和中校秘书张松筠一起负责接收《西京日报》，并改名为《解放日报》。

当时，地下组织对形势的发展尚无肯定的估计，李时雨的任务是进一步和东北军的官兵加强联系，必要时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

12月1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撤销，另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即将原第四处改为政治处，派东北军秘书长应德田为处长，我党组织负责人刘澜波为第一科科长，李时雨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1937年3月，东北军调往蚌埠。不久，又开往苏北，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此时，经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调往天津工作，公开的职务是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检察官。

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寄放在英租界达文里李时雨家中，由他的爱人孙静云妥为收藏。后上级指示将这批东西运交河北一个转运站，李时雨便向伪法院要汽车，假托进租界办事，将电台机械送到了指定地点。

李时雨任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兼天津地方

法院书记长时，组织上要李时雨营救我地下工作者冯骥。冯骥是在天津沦陷前，因共产党案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李时雨当时有权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第一步，他趁一个姓康的书记官外出之机，查看了案卷，抽出了冯骥的全部案卷，付之一炬。康书记官回来后发现丢了一份案卷，急得慌慌张张向他汇报。他故作认真地责备了几句，尔后又帮助康掩饰过失，示意其是在登记簿上留个案由：说案卷可能是法院被日机轰炸时给毁掉了。康书记官照他指点一说，果然庭长和推事就信以为真了。第二步，他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监狱看守所去，典狱长兼看守所所长陪他一起到各监房外走了一圈之后，他便要求单独找在押犯人问话。他见到冯骥后，悄悄地告诉道：“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是在登记簿上写有‘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第三步，李时雨视察监所时向典狱长交代说，要搞好监房的卫生，搞好伙食，对青年犯人要优待，像冯骥那样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应特别优待。他还向担任推事的两个同学邓肇金和高乾一打招呼：“我朋友的亲戚冯骥，是被诬陷入狱的，此案是分给吴璇主办，你们二人是陪审，请你们催一下。”两人按他的旨意给吴璇递过话之后，吴璇主动向他表示，一定抓紧进行。他顺水推舟地说：“这确是个冤案，年轻人火气大，容易得罪人而受到陷害。希望你帮忙早点给结案，恢复自由。”与此同时，他分别向与此案有关的办事人员打了招呼。如希望胡庭长能做无罪的判决，希望郑焯检察官能在起诉书上笔下留情，希望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张春孚为被告多作些强有力的辩护等等。

经过他的周密策划和一系列积极的活动，冯骥终于得到了无罪释放。

二

1939年8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策划建立伪政权。为了准备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朱晶华，来津后托孟幻飞帮忙拉几位代表。孟幻飞与李时雨商量，要他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

8月下旬，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组



1949年4月28日，李时雨在北平

成。

李时雨出席了8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其卖国投敌纲领。

回到天津后，李时雨把参加这次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报资料向党组织作了详细的汇报，受到党组织的嘉勉。

当年12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改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指定李时雨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年1月上旬，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公馆里亲自接见了北方一省两市党部的常委。

油头粉面的汪精卫与委员们一一握手后说：“中国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实现共存共荣。”他还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要点。

通过这次会见，李时雨对汪精卫一伙投敌卖国的罪恶活动，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了对我党来说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40年3月2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汉奸粉墨登



1943年2月26日,李时雨、孙静云在上海外白渡桥

场,宣誓就职。这一时期,李时雨的工作面临较大的转折。在汪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兼职委员。

对于去南京工作,党组织负责人何松亭鼓励他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很快作出决定,批准他打入汪伪政府。4月中旬,李时雨乘火车抵达南京。

汪伪中央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是汪的左右手。李时雨第一次与陈公博谈话,是在汪伪立法院院长办公室。陈公博听说李时雨是学法律的,当过法官,会上发言常有突出的见地,认为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李时雨深知陈公博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手,知多见广,老奸巨猾,便以青年老成、有礼不卑的姿态出现在陈公博的面前。当陈公博提出问题时,他就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应对。初次见面,效果是很好的。事后,陈的贴身女秘书、立法委员莫国康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功

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果然从此陈公博经常找他谈问题,李时雨逐渐得到陈的“信任”和“重用”。

莫国康是广东东莞人。她身材高挑姿色出众,却又故作本分。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精明干练,政治欲望很强。她想借陈的权势拉拢一部分人,在汪伪政府中形成一种势力。闲谈中,李时雨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她和他便拉上了同学关系。彼此表示今后要互相帮助,在陈先生的领导下干出一番事业。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和工作人员都不知李时雨的底细。见他能经常面见陈公博院长,并与他的女秘书那样熟识,误认为他是陈的亲信了。很多人主动跟他套近乎。于是,李时雨在立法院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上上下下通行无阻。仅三个多月,他就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及其罪恶活动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在南京几个月的活动中,李时雨在各方面都建立了关系。经与何松亭研究,认为有必要让他的妻子孙静云去南京与他一起工作了。李时雨经常请假回北方,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还是由孙静云担任机要和交通为好。

1940年,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8月,调李时雨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此时,上海已成为汪伪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情报工作者来说,是向全面纵深发展的极好机遇。

孙静云一次到北方向何松亭汇报工作,何认为孙静云应亲自去晋察冀根据地向许建国部长汇报。孙静云见到许建国后说:“我们已在敌营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可以步步深入敌人的心脏了。”许建国高兴地说:“好啊,汪精卫、陈公博身边也有我们的人了,这两个大汉奸作梦也不会想到,真是精明过分、蠢驴一对。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人!”

三

1942年5月间,陈公博因原军法处处长单钰积压案件、关押犯人久不处理等问题而将其撤职,随后调李时雨兼任军法处处长,并授予少将军衔。

1942年8月,汪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委员,李时雨出任办公厅第

四处处长。负责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的侦察审判，以及清乡区烟、毒、赌等犯罪的侦缉审判。鉴于江苏清乡官员敲诈勒索严重，他特设执法队，以纠察违法乱纪，并兼管禁烟、禁毒和禁赌，亲自兼任执法队队长。

南汇清乡区执法分队队长冯××，开始工作不久，就包庇南汇一个赌场，一天，他携带巨款来向李时雨行贿。李时雨问明了这笔款的来源后，即打电话叫军法官孙增原及执法队的一位督察来，将冯××带去关押审讯，判刑治罪。此事发生后，上海市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乡分会颇为震惊。陈公博得知李时雨办事认真，为他提倡的“廉洁政治”增光，非常高兴。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称赞李时雨“执法如山”。

自从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来，李时雨几乎每天都到伪市政府面见陈公博，给他送批重要公文，并请示解决一些问题。

1943年3月，中共北方局社会部派张友恒来上海，布置接收工作，并帮助他们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建立了一个转运点，供传递情报。还告诉他们：组织上委任时雨同志为上海特派员，静云同志管机要，并派杨宁同志来沪，由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时雨给杨宁起个化名叫杨德修，派他任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

8月，汪伪政府将接收的公共租界区改称第一区公署，陈公博兼任署长，调李时雨兼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时，李时雨肩扛金星，身兼秘书长、军法处长、司法处长，大权在握，威风八面，成为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不知有多少叛徒、特务、汉奸被他巧妙地处死。

上海租界地是个冒险家乐园，这里豺狼横行，无法无天。李时雨利用推行“廉洁政治”的机会，首先整顿了原租界的“包打听”（上海便衣警察），并强调禁烟、禁赌、禁毒、禁止敲诈勒索、禁止流氓扰乱社会秩序，对侵犯百姓利益者，绳之以法，从严处理。

四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李时雨夫妇刚躺下歇息，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时雨赶忙穿上睡衣，只听“叭！”的一声，大门被砸开了，闯进三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李时雨愤怒至极：“你们这是干什么？”翻译答道：“我们是北平日

本宪兵队的，你的卧室在哪里？领我们去检查一下。”他领着宪兵和翻译走进二楼卧室，孙静云正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翻译拉开抽屉，将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未发现什么破绽，便对宪兵咕嘟了几句。宪兵厉声说：“把你太太带走！”没等他张嘴，孙静云忙回答说：“好，我跟你们去。”

原来，北平日本宪兵队来上海是逮捕李时雨和孙静云两人的，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和伪上海市警察局日本副局长认为，李时雨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没有确凿的证据，又未向中国政府照会，是不好逮捕的。他们商议，先把他的太太抓去，问出口供，拿出证据后，再来上海逮捕他。

天已蒙蒙亮，李时雨急忙乘车来到陈公博公馆反映情况。陈公博听了李时雨的一番强硬的申诉之后，愤怒地说：“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我？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不必焦急，我叫林秘书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五岛茂来办理此事。”李时雨照常上班。两周之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孙静云接回上海。

孙静云当晚向李时雨详细叙述了被捕后的经历。

孙静云被押到北平，关在西交民巷日本宪兵队队部，连日受审。主要是问他们与何松亭是什么关系，现在何在何处。孙静云坦然地回答说：“我们与何松亭是同乡朋友关系，只知他是银行职员、大学教授，在天津见过面，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现在何处。”宪兵队向孙静云施行种种酷刑：灌辣椒水、跪砖头、皮鞭抽、棍子打——孙静云几度昏死，又几次被凉水浇醒，她强忍剧痛，始终未吐露一字真情。

李时雨夫妇虽然安全地闯过了这一关，但敌人并没有放松他们，仍暗中监视。一旦上海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日本宪兵司令部便找李时雨问来问去。

陈公博听后很生气，当即吩咐沪西区长卜立夫负责与日方交涉，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李时雨解脱困境。卜立夫是东北人，曾留日学航空，与李时雨私交甚厚。他会说日本话，与日本宪兵队混得很熟。他接受陈公博交给的任务后，很卖力气地与日方联络。他一方面向日本人吹嘘，说李时雨是陈公博的亲信，要他们看在陈市长的面子上，不要再找他的麻烦；另一方面，用

李时雨拿出的钱，以他的名义请日本人下馆子、逛游乐园。此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几个家伙不再来找李时雨的麻烦了。

不久，上海市警察局要组织赴日考察团，考察日本的警政。李时雨见这是个好机会，便向陈公博提出要求。陈公博说：“也好，出去走走，可以开开眼界。”

这个考察团由四人组成。他们于1944年5月中旬由上海乘飞机到日本福冈，然后到东京、神户、横滨、名古屋和大阪等地参观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监狱、看守所、警察机关，还参观了防空和消防设施。与此同时，他注意看到战争时期的日本，商店里货物很少，饭馆门前排着长队，鱼、肉和蔬菜亦很少见到，火车站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人。事实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已穷途末路，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归途中，他们顺便参观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几个大城市。所到之处，也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李时雨回沪后，将日敌危机四伏的窘境和沦陷区的敌情整理出一份材料，交杨宁密报中央。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后，陈公博赴南京任伪政府行政院院长、代理中央主席，成为汪伪中央一号人物。周佛海也升了官，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公博手下的官员，绝大多数都调离上海，上海市各机关差不多都换上了周佛海的人。陈公博内定调李时雨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李时雨要求将他调太湖地区任专员，目的是找个有条件的地方搞点武装，以打下一步的盘算。正在酝酿之中，周佛海向陈公博指名留下李时雨。陈公博对他说：“周佛海留你，我也不好意思马上就调。”周佛海任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李时雨继续任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兼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秘书处，直到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时止。

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派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的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张执一随即与李时雨接上了关系。

乱世之秋，李时雨从伪军火库中搞到200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和30000发子弹，交给张执一转新四军。在此期间，李时雨还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将军的

弟弟、共产国际第二情报组组长杨树田营救出狱。

五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统特务陆续回到上海，他们成为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的先遣部队。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大特务相继来到上海。这时，经党组织研究决定通过李时雨过去认识的熟人、军统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介绍，让李打进军统内部搞情报工作。

一天，余祥琴约李时雨去见他的老师——青帮头目、金融界大亨杜月笙。他们同杜谈不多时，戴笠来了。余即向戴介绍李时雨。戴笠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很有才干，打进南京伪组织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李时雨马上表示：“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戴笠一摆手，接着说：“你在陈公博身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那是托戴局长的福！”

李时雨打进军统之后，了解到不少有关军统的人事、组织、特务活动以及国民党接收上海市的各种情报。后来，军统上海区改组，余祥琴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祥琴推荐李时雨任第二组组长。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常择有价值的文件交给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看，从而使我党了解到军统特务的许多机密。

李时雨担任第二组组长后，他不常去上班，只是隔几天去看看文件。他感到这个了解社会动向的差事不好干，便对余祥琴说：“我在这方面既无线索又无经验，我拉过来的原伪警察局人员都是搞刑事案件的。”军统对李时雨这个不为他们卖力的少将，不能不产生怀疑。他们在侦察中，了解到他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爱人孙静云曾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过。大特务沈维翰便以此做文章，拍电报给去北平部署工作的戴笠，简陈案由，请求批准扣押李时雨。戴笠复电内容是：“仙舫、维翰两兄：函悉。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后来才知道，戴笠在北平接到电报后，顺便向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察长的李国章，打听他是怎样一个人。李国章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当然替他说了一番好话，加之戴笠见过他，印象很好，所以没有批准逮捕他。

1946年3月上旬，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特务内部倾轧更为加剧。张执一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准备逮捕李时雨，于是当即采取了果断措施：指示李时雨到东北找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由他分配工作。

为了安全撤走，李时雨先到南京，找到自己的老师，任职国民党中央政府税务总局局长的王抚洲。李时雨求他找工作、要护照。李时雨告诉他：“我急于回家乡东北工作。”提出：“最好是委我为营口分局局长，因为我的同乡、同学王家善师长在那个地方驻防，会得到他的照应。”王抚洲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说，正好中央税务总局东北局局长张维在此地。当即找到张维与他见面。张维说营口准备设分局，他叫李时雨去沈阳等候，委他任营口分局局长一职。王抚洲当即给李时雨开了护照、颁发委任状，嘱他回上海后即到东北赴任。

李时雨从南京回到上海，已买到9月18日的飞机票。不料9月17日上午，余祥琴忽然来电话，叫李时雨立即去他家。李时雨预感到情况有变，只得硬着头皮去了。推门一看，只见余祥琴家正在收拾东西。女秘书盛吉小姐直对李时雨使眼色，年轻的陈会计也向他示意要出事的样子。余祥琴有点不大自然地对他说：“刘方雄副市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他问：“有什么事啊？”余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你去一趟吧。”

李时雨坐自己的小汽车来到了上海市政府。下车后，他对司机阿根神情凝重地说：“这辆车送给你啦！一小时我若不出来，你就回我家，在我家门口等上两三天，凡是常来我家的客人，你都要告诉他们，就说我被捕了。”“李将军，您放心吧。”阿根颤抖着答应，含着眼泪与他告别。

李时雨走进上海市政府，见到了刘方雄。刘说：“你来啦，坐下吧！”还没等他坐稳，刘接着说：“对不起，请你到南市看守所去。”

李时雨被军统用吉普车押送到南市车站路军统看守所，被关押在看守所三天之后，才开始审讯。审讯时军统特务说他就是共产党，逼他承认。他们用严刑拷问了两夜，他矢口否认。他们写的记录，他既不看也不按手印。这一下可激怒了特务们，对他又是毒打，又是压杠子、灌凉水。李时雨一点儿也不嘴软，破口大骂：“我操你



1999年李时雨在北京寓所

们八辈祖宗！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捞大钱、玩小姐，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李时雨这小子怎么这么硬气呢？若共党、汉奸该心虚呀，他倒满身是理呢？”他们对他无可奈何，一时束手无策，只得另打主意。过了几天提审时，他们又问他是怎样打进汪伪组织当上少将的。他趁机把早已编造好的那一套履历陈述一遍。他们未抓到他任何把柄，只好把李时雨的案卷送到上海市高级法院。谁知这里的国民党法院的检察官都受军统的控制，本应宣判无罪的李时雨仍被判处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争民主的斗争风起云涌。1949年2月李时雨以合乎释放条件被取保释放。出狱后第二天，上海各报作为重要新闻刊登了他出狱的消息。党组织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找他，他很快就与张执一见了面。

1949年10月1日，英姿勃发的李时雨作为地下工作者的代表登上了雄伟瑰丽的天安门城楼。

此后，李时雨长期在中央军委情报署、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部工作。80年代初，以李时雨为原型拍摄、播放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

(责任编辑：刘文)

“叔苹奖学金”风雨六十年

● 刘作忠

沙漠绿洲

1940年2月初，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陆续刊出一条题为《叔苹高初中奖学金》的启事：“为纪念顾公叔苹生前乐善好施，提倡教育不遗余力之遗志，特设纪念奖学金，以造就本埠贫寒男女中学生或高小毕业生之无力担负学费以继续升学者，由本处给予奖学金以培植之。”启事中还说明了一套培育人才的方式、方法、方案：

一、凡高初中学生学期成绩总平均85分以上者；

二、身体健康；

三、品行优良；

四、有学校证明书，证明该生确系家庭清寒，学业优良者。

符合上列四项条件后，须再经过奖学金管理处考试。考试由各著名大中学校教师义务拟题及阅卷。合格者供给一学期之学杂费。如下一学期考试在85分以上，可继续得奖。

顾叔苹出身于浙江湖州南浔一个丝商世家，其祖父因独揽上海出口打包业务而成为巨富。顾叔苹虽腰缠万贯，但为人急公好义，曾任闸北义务小学校董、南市红十字会会董、南市慈善医院院董、南市孤儿学校校董，并获得许多慈

善奖章。

1926年，正当壮年的顾叔苹一病不起，临终之际，拉着儿子顾乾麟的手说：“一个人不可无钱，不过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好好利用钱，得之于社会，还须还之于社会。”

顾叔苹病逝时，所经营的“怡和源打包厂”已负债37000银两，17岁的乾麟只得“子继父职，弃学就商”。

顾乾麟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怡和源打包厂转亏为盈，终于在群雄角逐的上海滩争得一席之地。

事业顺利发展，资产不断增加，然而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影响的顾乾麟，却每为自己读书太少而感叹。当时抗战爆发，民不聊生，上海滩上失业者与日俱增，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童因家贫而失学。一次怡和源打包厂招收5名练习生，竟有200多人报名，且多为成绩优异、又无钱就读的青少年学生。

这些触动了顾乾麟的心灵，联想乃父“得之于社会，还须还之于社会”的遗训，他决定创办一个连续不断的奖学金，专门扶植那些学业优良的清寒子弟。其名称定为“纪念叔苹公高初中学生奖学金”，简称“叔苹奖学金”，并公开登报接受申请。

“叔莘奖学金”的启事在《申报》、《新闻报》刊出后，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清寒学童的心，一批饥寒交迫、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学生绝路逢生。

在上海法租界一间破旧的小屋里，顾秋心一家6口人靠父亲每月的薪金只能维持5天的最低生活。一天，顾秋心在街头看见叔莘奖学金的启事后，怀着一线希望，步行两小时到北苏州路912号怡和源打包厂报名。随后他的两个弟弟顾瑞金、顾小凤也报了名，结果3姐弟都考取。

贫苦学生汪家鼎父亲失业，一家人寄食于叔父家。汪家鼎勉强读完小学，考入上海中学后，无钱读书，是7年的“叔莘奖学金”帮他完成学业的，他还曾获得顾先生膳宿费的特殊奖励。后来他的大妹雪瑛、二妹蕙瑛、三妹云瑛也相继考取“奖学金”。兄妹四人依靠“奖学金”，勤奋苦学，都成为大学生。

贫苦学子们考取“奖学金”后，不仅有饭吃、有书读，还可受到德智体各方面的全面培养和训练，他们倍加珍惜，个个成绩优秀，使顾乾麟感到十分欣慰。

为了使“叔莘”学生全面成长，顾乾麟于1943年在上海大华路（现南汇路）静华新村21号设立了一座两层楼的“叔莘图书馆”，馆内备有数万册文艺、科技、教育、历史书籍，供学生阅读。还附设下列各项设施：

一、建立同学会——下设图书馆、学术、出版、体育、交谊、福利等股。还有叔莘通讯社、叔莘小足球队、乒乓球队等。以上均由“叔莘”同学自己组织、自己管理，以培养其社会服务能力。

二、理化实验室——由“叔莘”高年级同学指导低年级学生做化学实验。

三、打字及速记班——购置打字机数架，请教师每周教授两次，学生轮流学习，逐步掌握打字及速记技能；

四、缝纫班——有缝纫机数架，请缝纫学校教师教授“叔莘”女同学缝纫技能；

五、看护班——请高级护士教授“叔莘”女同学护理常识；



1988年顾乾麟获荣誉文学博士

六、国术班——每星期日上午请少林拳名家王子平、太极拳名家陈微明分别向“叔莘”同学传授少林拳和太极拳，借以增强其体魄；

七、理发室——每日下午5时至8时，聘请一名理发师专为“叔莘”同学免费理发，以整仪表，并减少其支出；

八、特约医生——聘请著名医生庞京周、曹晨涛、陈俊琦、方小溥为特约医生。凡持“叔莘”学生证者，可至特约诊所免费治病，并到特约西药房和中药店免费配药；

九、配赠眼镜——凡“叔莘”同学需要配备眼镜，可到特约眼镜公司免费验光及配用适合光度的眼镜，以防光度加深。

图书馆成立后，“叔莘”同学利用课余时间，自动聚集于馆内各尽所能：或整理图书，或指导低班同学学业，或张贴壁报、编写通讯，或做理化实验，或排演文艺节目，或参加体育锻炼，或学习打字、缝纫、护理。在这里，同学们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锻炼了体魄，培养了为群体服务的意识，暂时忘掉了日寇占领下孤岛上海的

种种痛苦。大家以能参加“叔苹”小乐园活动为乐趣和快慰。

顾麒麟也常抽暇偕妻儿到图书馆探望同学们。每年春秋假日，顾麒麟组织热心于图书馆、同学会公益活动的同学，到苏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旅游，以鼓励其勤劳。顾氏夫妇还常邀集“叔苹”同学到新闸路1765弄14号的顾宅联欢、聚餐，并赠送钢笔及纪念品。师生们自由谈论，无拘无束，欢声笑语不绝，有如一个亲密、和谐的“叔苹大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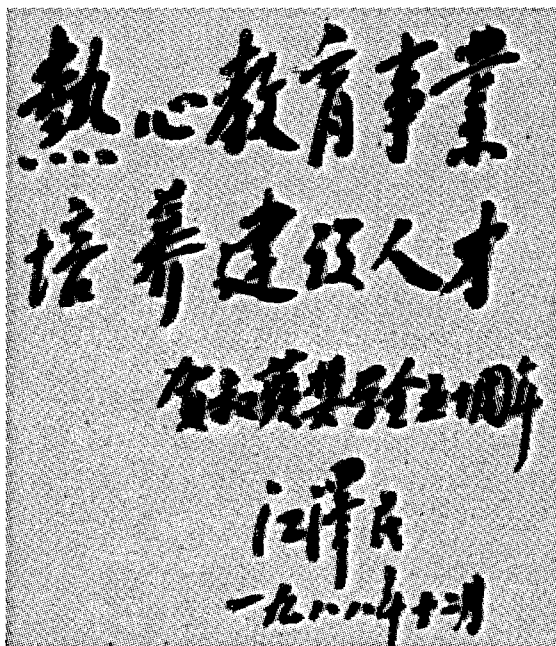
天真幼稚的学童们参加叔苹图书馆及其附设的各项活动，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爱国、爱人民、扶贫济弱的进步思想，以致后来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大家才知道，1100名“叔苹”同学中，竟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地下党员。

50年后，老学生们忆及当年的情景感触良深：

当时上海为日伪统治，校舍狭小，书籍奇缺，叔苹图书馆为同学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也为同学们提供了聚会活动的场所，无异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工作能力，顾先生创设叔苹图书馆，要同学自己筹备，自己管理。……从图书的采购，分类编目，贴签设卡，到登记帐册，都是由同学分工办理。图书馆建立以后，全部管理工作都由同学担任，图书馆馆长是同学会选举的。每日的值班管理员，由自愿参加工作的同学轮流担任……通过图书馆工作，同学们学到了图书分类编目、采购、记账等知识，学到了组织与管理的知识，也得到了为社会服务的实践。

“叔苹奖学金”创办几年后，不少同学由中学升入大学，顾先生必为之设宴饯行，如有旅费、学费、膳宿费困难者，他尽力资助。以至读大学期间购买书籍和仪器，都可以凭收据在叔苹奖学金管理处报销。有出国留学深造者，顾先生每人赠送一张飞机票和一套中山装，并资助他们在国外第一年的部分生活、学习费用。临别之日，顾先生亲自送行，反复叮嘱高足：学成后必



须返国，将学得的知识贡献国家和社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更多的工厂倒闭，怡和源打包厂也受到极大冲击，其资产被查封，经济陷入困境。顾夫人刘世明女士深明大义，毅然卖掉金银首饰，以维持“叔苹”的各项开支。

上海滩上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顾麒麟先生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多方压力，将“叔苹奖学金”一期一期的续办着。他犹如一棵参天大树，以自己的光和热，哺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学童们。

情系“叔苹”

1949年2月，顾麒麟先生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仍坚持为第19期叔苹奖学金招生150名。入夏以后，上海时局更加动荡，顾先生决定举家移居香港。离别之日，他专程到叔苹图书馆与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你们要安心读书，我已留出一部分钱作为你们继续攻读之用。我希望能早日返沪。如一时不能回来，盼与你们时常通讯。”言罢，热泪盈眶。

尽管仓促而行，但顾先生没有忘记“叔苹”同学的名单、照片、会徽、规章及出版的刊物等。

赴港不久，他本已定好返沪的船票，不料黄

埔江被国民党军队轰炸封锁，只得滞留香港。顾先生初到香港，所带资金不足，只得处处节省，以维持生计。尽管手头拮据，但顾先生仍时刻惦记着“叔苹”同学，他多方筹措了一笔钱，汇寄留在上海负责“叔苹”资金管理的朱慎之先生，作为第20期奖学金。他在附函中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汇款了，望大家好自为之，务必勤学，学成之后以服务社会为前提。”

尔后几十年，大陆政治运动不断，许多“叔苹”同学被隔离审查、遭逼供，有的还关人“牛棚”甚至有人认为：“‘叔苹奖学金’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设立的组织；‘急病助金社’是有政治背景的机构”。远在香港的顾先生获悉，心中痛苦不堪，他既不敢贸然同受冤屈的同学联系，又无法为之说清缘由。唯一能给他慰藉的是：不时翻阅随身携带的“叔苹”同学的照片、会讯及其它资料，以温旧情。

在香港，顾先生本着“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精神，一以贯之地坚持实行他“以孝事亲、以诚相待、以信为本、以忍处世”的人生原则，热心社会福利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内地改革开放的喜讯不断传到香港，顾先生在兴奋鼓舞之余，更加思念分别几十年的“叔苹”同学。

1982年10月，顾氏夫妇第一次访问北京。在京的部分“叔苹”同学闻讯，相互邀集前往恩师师母下榻的宾馆探望。顾先生后来回忆说：“与‘叔苹’同学首次会面，使我喜出望外，他们个个笑逐颜开地叫我们：‘顾先生，顾师母，我们又见面了！’我一个个摸着他们的头说：‘你们还是那副老样子，我多么想念你们！’这句讲了三十三年而未讲成的话，今天脱口而出了！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与叔苹同学两次会晤，又恍如隔世。三十三年前年轻有为的学生，如今都已两鬓霜白，以前都是那么天真活泼，洁白无暇，今日个个都似饱经沧桑，胸怀大志。但是我们中间深厚无比的感情和共同视为珍宝的叔苹精神却永胜不衰，此后同学们互相告知，会面的人数陆续增多。”

祖国大地政通人和，蒸蒸日上，顾先生的一腔爱国热血再次沸腾起来。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的支持下，第21期叔苹奖学金首先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和上海中学续办。不久，顾先生接受谢副市长的建议，将“奖学金”扩大到10所学校。接着，又在北京、湖州开办了“叔苹奖学金”。截止1997年底，3座城市有33所学校开发了“叔苹奖学金”，已发奖45期（含解放前20期），获奖学生总数近7000人（含解放前1100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面（学校）最广的奖学金。

续办的“叔苹奖学金”仍以“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为宗旨，以培养建设祖国的优秀人才为目的。由于时代不同，过去的奖学金限于奖励家境清寒而无力升学但品学兼优的学生，续办后的奖学金则不限家庭条件，奖励品学兼优、勤奋好学的拔尖学生。

续办的“叔苹奖学金”仍保持连续给奖的特点，鼓励学生不断上进。得奖学生如中学毕业参加高考统考达到重点大学分数线，或以优异成绩保送入大学的，只要他们在升入大学以至考取研究生后仍保持品学兼优的，可以连续得奖。此类得奖学金人数逐年增多，已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乃至海外。“叔苹”新同学已形成中学、师范、大专、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完整的层次系列。

桃李满天下

顾先生以60年心血培育的义务教育之树，如今桃李满天下。“叔苹”新老同学分布全国各条战线以及台港澳地区乃至欧美各国。

以1939-1949年10年间的1100名“叔苹”同学为例，就产生了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钱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淑铮、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戴玉华、前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赵长白等在内的一大批部长、司局长、校长、院长、院士、博士、教授、研究员、编审、高级工程



叔苹公奖学金之徽章

师、高级设计师、高级建筑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主任医师、律师、总经理等等。

前文提到的顾秋心，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她的大弟顾瑞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变态反应学专家，小弟顾小凤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因参加设计激光汉字编排系统而荣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汪家鼎四兄妹经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个个成才：汪家鼎为上海市纺织纤维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汪雪瑛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汪慧瑛为北京化工学院与化纤工学院教授；汪云瑛为北京石油学院教授。现任上海叔苹奖学金同学会副会长的汪家鼎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兄妹赖顾先生的资助，都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恩泽之深，全家铭之心骨。”

贫苦学生李瀚荪靠“叔苹奖学金”读完了初中、高中，最后考进上海交通大学，现在是中央电视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电学专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路分析》系列讲座，就是由他主讲的。他的姐姐李炯荪、姑母李瑞华、弟弟李沐荪也是靠奖学金读初中、进高中、考大学的。现在李炯荪是高级教师，李瑞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李沐荪是长春地质学院教授、国际知名自动控制专家、美国圣罗士学院特邀教授。李炯荪深有体会地说：“顾先生不仅关心我们的上学问

题，也关心我们的生活大事。旧社会订婚讲究排场，我在百乐门订婚的一切费用，都由顾先生开支，顾先生和顾师母亲自参加和主持了仪式。我弟弟瀚荪患结核和伤寒症，若不是顾先生相助，也活不到今天，更不用说成为知名教授了。”

靠玉米糊度过童年的郑明，继姐姐之后于1943年10岁之际跳级小学毕业，成为“叔苹”第8期学生，后来考取交通大学造船系，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

1986年开始续办的“叔苹奖学金”，获奖新同学已超过5000人。新一代欣逢盛世，又深受顾爷爷无私奉献精神的启迪和鞭策，他们争先恐后，勤奋学习，后浪推前浪。

他们当中有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金、银牌得主，有国内各类学科竞赛的优胜者。以上海为例：格致中学一位“叔苹”同学，连续获得1989、1990年两届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一等奖，他与另外两名“叔苹”同学参加第10届美国数学邀请赛，都获满分；复兴中学一位“叔苹”同学，获美国第13届数学邀请赛一等奖、第46届美国数学竞赛一等奖、1995年（“爱朋思”杯）上海市高中数学竞赛一等奖；格致中学一位同学，获1995年全国初中数学联赛一等奖；还有一位叫朱文情的“叔苹”同学，因成绩特别优秀，被送到英国剑桥TRINITY学院公费学习3年。等等。

“叔苹”续办10多年来，获奖学生从师范、大学毕业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逐年增多。还有许多人因为成绩优秀、贡献突出而被破格评为教授、研究员、编审、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等。

如今的“叔苹大家庭”，总人数已超过7000人。老同学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小同学还是十三四岁的活泼少年。白发童颜，相映成趣。老同学成就辉煌，小同学意气风发。

名垂青史

以盈利为职业的顾乾麟先生，却一掷千金，

为国育才,得到了世人的一致赞扬。

198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杨成武先后在北京会见了顾先生。吕正操称顾先生为“爱国老人”,并说:“在中国办教育的人,都是桃李满天下,他们都会名留青史的。”

1987年初,上海市政协委任顾先生为“特邀委员”。

1988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宴请出席“北京叔苹奖学金同学会成立大会及第25期叔苹奖学金(北京)授奖仪式”的顾先生。谷牧对顾先生说:“感谢您在教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

同月,顾先生出席上海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之际,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亲切会见了,并赞扬其爱国精神。

5月,顾氏夫妇及子孙赴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勒圣罗干学院受奖。原来该院院长来华讲学之际,“叔苹”同学李沐荪向其谈及李氏一家四人赖“叔苹奖学金”成材,并详述“叔苹”同学1100人个个成才的经过。院长十分感动,回国后向该院院董们推荐,32位院董一致赞同:授予顾乾麟先生“荣誉文学博士”。“该项荣誉专为表扬对教育及慈善事业有伟大贡献之人士。该学院过去曾以此荣誉颁给大使、纽约州长、纽约州教育厅长、PULJTZER文学奖获得者二人及世界著名的环境艺术家”。顾先生是获得该院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

授奖仪式极为庄重,能容纳四千多人的洛克菲勒会堂座无虚席。在庄严的中美两国国歌声中,顾先生上台领奖。他后来回忆说:“以一中学未毕业学生而得此学位,成为‘四级跳’,运动会上有三级跳,而我须毕业中学,毕业大学,再到硕士,然后博士,所以成为四级跳,一生又一个奇迹事。”

有感于顾先生的壮举,该院专门设立了“顾乾麟奖学金”(该院一院董个人出资2.5万美元,顾先生出资2.5万美元,院方出资5万美元,共10万美元),每年从“叔苹”新同学中选拔优秀学生前往该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2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为祝贺叔苹奖学金50周年,亲笔题词:“热心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

1989年2月,英国国际成功人士杂志函告顾先生:他已名列该杂志,有2000多字专门介绍。

1997年国庆之际,“叔苹”第6期同学、现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亲切会见了恩师顾乾麟先生及顾二公子家麒夫妇,还有部分“叔苹”老同学。钱其琛还当场题词:“敬祝顾乾麟老师健康长寿”。

为了弘扬顾先生的爱国精神,南浔镇人民政府和上海叔苹奖学金同学会,联合在南浔名胜——小莲庄桂花厅修建了“叔苹奖学金成就展览馆”。馆内以大量图表、照片、实物展出“叔苹”新老同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顾先生一生尽力于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

1995年10月,顾先生亲手把一张面值1000万元港币的支票面交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作为续办“叔苹奖学金”的基金。并签署了一份委托书,写明该款委托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之增值,每年以18%的年息,分两期划入上海叔苹同学会银行账户,由顾先生本人、或由他的次子顾家麒自行安排使用。他还立下遗嘱:“将我之一部分资产作为奖学金,请同学们帮我不断地办下去。所以凡得奖新同学,均可放心勤读,我必使你们读至大学毕业;如成绩特优者,我已订立章程,再供你们接受更高教育。”

1998年2月14日,顾乾麟先生在香港病逝。和父亲同样谦和的顾二公子、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美国外科学院院士顾家麒先生是叔苹奖学金的鼎力支持者,他与“叔苹”新老同学一起,正在规划如何实现慈父的遗愿,把叔苹奖学金永久办下去。

(笔者参观“叔苹奖学金成就展览馆”后感动不已,承蒙该馆刘廷铨先生提供资料,撰成此文,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 吴思)

关心群众疾苦的 司令员杨勇

● 舒云

朝鲜停战后，杨勇当上了志愿军司令员。他刚当司令员的那些时日，吃的粮食甚至咸菜仍然要从国内运来，伙食依然是海带、干菜、花生豆，非常有限的几样。杨勇经常到志愿军机关大食堂转转，看大家吃得没滋没味，就尝尝菜，说这菜怎么没油？下回我来炒。果然

他来炒菜了。一锅菜两勺油，三下五除二，炒得色香味俱全。大家都欢迎司令员下次还来炒菜。炊事员嘀咕起来，再来，油都没了。杨勇定个指标，全体志愿军官兵每人每年至少生产60斤蔬菜。

杨勇在山坡上开了一片荒，种上了辣椒、白菜、茄子和

西红柿等。他边挥动镐头边对大家说，朝鲜的镐头和陕北、东北的差不多，我们不用学就能干活。这一年，志愿军的蔬菜基本上做到了自给。

停战后的朝鲜，伤痕累累。杨勇提出重建平壤的口号，要求把没有爆炸的炸弹全部起出来引爆，所有的弹坑都要填平，炸坏的房屋要全部修复，还不准动用朝鲜的一草一木，连钉子砖头都要从遥远的国内运来。这是多么艰巨的工程啊！施工中，杨勇一点一滴地检查工程质量，他和一把水泥看，水泥要干成石头，不能干了以后成粉末。他拿着砖头对施工部队说，坏了的砖头要扔掉，一块也不能砌进墙里，我们干的是百年大计。至今，朝鲜国防部大楼那一片还是杨勇在时搞的。

朝鲜停战后，中国政府决定将战时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均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并在1954年至1957年的四年内，再拨八万亿人民币（旧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的费用。杨勇带头，



杨勇在朝鲜参加助民劳动

志愿军在供给标准内，节约700多万斤粮食和10多万件衣物，捐给了朝鲜人民。1956年杨勇又动员官兵自愿捐款，从祖国购买了500部双轮双铧犁赠送给朝鲜农业合作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大力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工作”当成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杨勇和政委王平号召志愿军全体官兵，以建设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每一个同志要把自己的名字和这座英雄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杨勇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为朝鲜人民修渠、筑坝、盖房、植树。

回国后，杨勇当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

1960年，农村大面积饥荒，部队战士的生活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杨勇派秘书王韶华下连队，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因为战士吃不饱，最好的冬训季节却不敢加大运动量，严重影响了军事训练和战备任务的完成。两月后王韶华回来汇报说，连队粮食困难，每天下锅的米要用秤称，不敢多下，小米饭上一层糠，还不敢去掉，要不吃到月底就断顿了。

为了更准确地摸清情况，杨勇到河北驻军进行生活管理调查，走访了10多个连队，专门找连队司务长、给养员。他问得很细，战士的定量是多少，每月有多少油，蔬菜怎么供应……连队干部说，现在训练强度大，战士普遍身体素质下降，时不时还有昏倒在训练



1958年金日成欢送杨勇回国

场上的。杨勇说，要想不发生浮肿，就必须搞“南泥湾大生产”。在军区党委会上，杨勇提出在不妨碍执行战斗任务的前提下，各部队应该抓紧农副业生产。争取当年自给蔬菜和一部分肉类、食油，并根据不同条件争取储存半个月至一个月的粮食。

在北京市大力支持下，部队得到了一些荒郊野地用于生产。那时北苑还是郊区，荒草一片，北京军区的部队开出了500多亩地，种上了玉米和各种蔬菜，还养了猪。朝阳区的洼里有一大片荒地，机关干部种上了稻子。从河北正定要了500多亩地，种上了花生。还在唐山搞了六七个小规模的生产基地，沧州等地搞了好几个鱼场，还造了两条远洋渔船，打了几万斤鱼。

杨勇一个星期总要去生产基地一两回，去了就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劳动。他种稻子有经验，插秧、收割都有一套。

黄寺北边华北大酒店的位置，那是明朝年间挖的、早已废弃的九大窑坑，里面全是脏水，经常淹死人。杨勇去看过，说可以扩大养鱼。他出面和北京市交换了一下意见，经北京市批准，订了20年的合同，他派来一个团挖了八个月。还在北郊的大草滩上又挖了一个大鱼池，水面70余亩，还开出一些地。

杨勇指示有关人员跑遍北京军区所属的京、津、冀、晋，到处寻找生产基地，当年就建成了柏各庄、大站、山岭子农场。部队开展了农业、盐业和手工业生产。军区最大也最有名的农场是唐山东南的柏各庄农场。

柏各庄是个大村，盐碱滩有13万亩，芦苇遍地，杨勇调了两个团开进了柏各庄。

杨勇拿当年南泥湾精神鼓励部队，力求在芦苇丛中建成年产几千万斤的大农场。他

专门抽出时间和战士一起泡在泥水里干。他说，今年能不能让全区指战员每人吃上一碗柏各庄的大米饭？农场的官兵们说，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保证。

官兵们栽种了7000多亩稻田，亩产480斤。第二年平均亩产826斤，1965年高产达到1200多斤。柏各庄农场被评为全军的先进典型，受到农垦部领导的赞扬，还在北京展览馆搞了个大型展览，轰动全国。十几个生产单位在北京、天津、唐山陆续建了起来。鸡场、猪场、鱼场以及粉坊、酒坊、豆腐坊也都建设起来。猪场存栏一两千头，又从天津请来养鱼专家指导，第一年就养殖了12万斤鱼。稻子麦子一年产了几百万斤。

农业需要大投入，光靠后勤拿钱不是办法，他们又搞起了化肥厂、汽车修理厂等以工养农。化肥厂生产的化肥基本外卖，一赚几十万，加上汽车修理厂等工厂的收入，补上了农业的投资，驻京的大单位那时都挺羡慕北京军区。

困难时期，人们都过着苦日子，主食瓜菜代，副食少油花子，吃饱了还觉着饿。眼睛老是盯着掌勺的，管米柜的。司令部管理局长罗铭为人正派，有人怀疑他吃“夜食”。1962年，司令部机关组织了40多人，检查了他整整一个月，司令部机关党委召开面对面大会，把司令部党委、军区常委都通知了来。检查组一边汇报“问题”，罗铭一边反驳。杨勇一直坐着没吭声，脸色却



杨勇在人民大会堂工地劳动

越来越黑。汇报到罗铭给贺龙、陈毅两位元帅拉去几百斤大米竟是问题时，杨勇火了，他拍案而起：“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师吃点大米，就成了问题？我们不吃也要给老首长吃。”在座的人从来没见过杨勇发过那么大的脾气。

杨勇还常说，对于我们，照顾不好没关系，对首长和下级，尤其是休息的老同志一定要管好，有什么困难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有一次杨勇去新六所看电影，看见朱德，他像新兵一样，叭一声立正，恭恭敬敬给朱老总敬了一个礼。然后关心地问，朱老总，您这么大岁数还穿皮鞋，别穿了吧？聂荣臻在北戴河疗养时，到军区北戴河医院要点墨水和纸，医院没给。杨勇听说后，把后勤部部长和政委叫去训了一顿，你不知道那是老师吗？部队都

归他管，怎么要点文具都不给？

有一天，杨勇发现战友文工团中，包括歌唱家马玉涛在内有61个人出现浮肿。文工团属于政治部直属队，杨勇没有推卸责任，当即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检讨，说文工团在我眼皮子底下，有61个浮肿我不知道，我官僚主义。他问管理局长罗铭能解决什么，能拿出多少东西。罗铭一一报出数字。杨勇当场落实，每月拿出多少斤黄豆，多少糖，多少鱼……文工团领导又反映，杂技团有的演员上台就得喝点酒，现在酒的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战友文工团没有京剧团，有杂技团和话剧团。杨勇说，好，海运仓招待所每月给他们两箱酒。从此，战友文工团有了特殊待遇。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焚书、八股愚天下

● 官伟勋

把焚书坑儒与八股取士放在一个题目里，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其实，两者形式不同，目的则一。一个残暴酷烈，一个温文尔雅。一把是硬刀子，一把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二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就其达到的目的看，后者比前者更彻底，危害也更深重！

焚书坑儒的政治目的

焚书坑儒之策，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当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就国体问题发生争论时，由李斯提出来的。周青臣在谈到当时的形势时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他对用郡县制代替艺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认为实行了这一制度，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可以传之万世。博士淳于越却批评周青臣“非忠臣”。淳于越对形势的估计正好相反，说：由于没有“封子弟功臣（像周朝封列国那样），自为枝辅（互相支持辅助）”，前景是很不妙的，“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不按照古人的办法，分封王室子弟和功臣为贵族世袭诸侯国，以互相支持，不仅不是什么形势大好，大秦国能不能保得住还是问题哩！

既然问题如此严重，秦始皇就下令展开大讨论。

丞相李斯发言了，他首先批判了淳于越的复古观点，说：五帝时，都没照搬前帝之法，三代时也没有照套前代的制度，都是根据当时情势

而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与制度，各帝各代都治理得很好。他认为，淳于越的言论正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的知识分子“不师今而学古”，动不动就用过去的东西来否定今天国家的方针政策，搞乱老百姓的思想，这种现象如不加以制止，发展下去，是非常有害的，于是他说了以下一段话：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立国）并作（各自为政），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私学，以非（反对）上（国君）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可是，民间私学却以自己的学说教化人们。老百姓一听到政府下达的命令，就根据自己所学的过去的那一套，妄加议论，指责政府的政策法令。那些持旧观点的人，上了朝，就在表面上装做拥护政府的样子。下了朝，就街谈巷议，对政府决策说三道四，妄加非难。有了机会，就在君主面前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以求名，到了下头就标新立异，以表示自己高明，造谣诽谤，影响一些老百姓跟着他们反对政府的政令法令。如此勿禁，君主就会丧失威信，失去权力，党派势力就会膨胀强大失去控制，因此，非严厉制止这种现象的发展蔓延不可！怎么办呢？李斯认为必须统一天下的思想，而统一思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焚书。于是建议：

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官所保存的历史书籍，非秦国记录的史籍统统烧掉）；

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三、“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四、“以古非今者族”；

五、“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六、“令下三十日不烧，黥（在脸上刺字涂墨）为城旦（白天守边防寇，夜里修长城，刑期四年）”；

七、“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八、“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诏书曰：“可”。全国就大烧起书来了。

秦国好像是一个有烧书传统、并尝到过烧书“甜头”的国家。秦始皇不是第一个下令烧书的国君，李斯也不是第一个提出焚书建议的人。《韩非子·和氏》篇就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之说。实际上韩非子自己也是一个主张焚书的人。他在《五蠹》篇中就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老百姓都高谈阔论议论如何治理国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为了富国强兵，韩非子认为非把藏于民间的商（鞅）管（仲）、孙、吴之书付之一炬不可。否则，老百姓都懂得了商管之法，学会孙、吴用兵之术，就会用学来的政法与兵法来对付国家，闹乱子，国家就乱套了。因此，决不能让老百姓拥有这些书，看这些书。

还有更早的。《孟子·万章句下》中有一段北宫琦与孟子的对话，北宫问：“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的等级制度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孟子回答说：“详细情况已经没法知道了。诸侯们因为厌恶那些历史典籍，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把那些东西都毁掉了！”可见，通过毁掉历史典籍以控制老百姓思想，加强统治，是早已有之的施政措施。

这当然是一种愚民政策，即通过使老百姓愚昧无知以达到便于统治的目的。这种为政思想，在当时好像很流行。法家有，儒家、兵家、道家都有。《论语》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兵家如《孙子·九地》则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道家最明确：“圣人之治，虚其心（简化老百姓的思想），实其腹（填饱他的肚子），弱其志（削弱其志气），强其骨（增强其体力好干活），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法家的就是上面说

的商鞅、韩非子、李斯等主张的那一套。在这方面最出名的自然要数秦始皇与李斯了，因为他们手握大权，不但可以主张，而且可以大刀阔斧地干，所以名气就大了。

先秦思想家似乎都主张愚民，这看来有点奇怪，其实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那时的思想家大都生长在奴隶制末期，或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统治阶级的意识就是统治的意识。在奴隶制时代，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牲畜。作战、种地、挖矿、制造武器和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都要奴隶来干。奴隶的地位与马牛骡驴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马牛骡驴值钱。试想，如果马牛骡驴会思想，会自作主张，岂不是太可怕了吗？奴隶也一样，越是没有思想就越会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时思想家的愚民主张，完全是沿袭很久以来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因此可举一反三，明白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仍然会有旧时代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占据统治地位。简而言之，就是把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容忍它，而是为了认识它，进而批判它消灭它，免得它成为发展新兴生产力的绊脚石。

孔子既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主张发展教育，正说明他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他开始明白发展教育开发民智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成了不少诗人批评和嘲讽的对象。丁尧臣《阿房》：“诗书焚后今犹在，到底阿房不耐烧。”陆次云《咏史》：“尚有儒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萧立之《咏秦》则云：“燔经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而最为脍炙人口的自然要数章碣的《焚书坑》了：“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对于现代人来说，仅仅对秦的烧书加以嘲笑是不够的，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李斯烧书的建议，既有反动的一面，也还有巩固新政权新制度的一面。就他反对和防止奴隶主贵族复辟世袭制、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来说，他是站在历史进步一边的；但

就他所采取的手段来说,就大成问题了。他的愚民政策虽可收效于一时,但从长远来看,他的办法绝对是塞民智遏求新,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办法,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

关于焚书坑儒的历史评说

首先,烧了多少书?烧了谁的书?据《考证》一书说:“李斯所焚止民间诗书,……而官府旧藏仍存。”《朱子语类》也说:“秦焚书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谁应对毁灭历史典籍负更大的罪责?刘大榭《焚书辩》中认为主要罪人不是秦始皇与李斯,而是项羽:“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刘师培《左庵集》也说:“民间所存之经亡于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于项羽之火”。也强调了项羽的责任。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光聪谐根据《乐书》中李斯曾向秦二世进谏说:“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惧也。”认定李斯对《诗》、《书》的价值还是给予应有重视的,并由此推论说:“斯能为此谏而又议烧《诗》、《书》者,烧天下私藏耳,盖犹有在官者。”显然是在说明:李斯要烧的只是民间的书,官府的书他还是要保存的。

诸子之书烧没烧?王充认为没烧。“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论衡·书解篇》)。赵岐《孟子题辞》亦云:“逮止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则指出,王充与赵岐的说法,与李斯所提议的:杂烧“《诗》、《书》、百家语”相矛盾,不符合《史记》提供的情况。同时指出,诸子篇籍之所以“得不泯绝”,是由于民间的《诗》、《书》未必能全烧光。“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并引《六国年表》以证:“《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屈、贾列传》所载,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正可以说明,民间没有烧掉的书还是有

的。正像陈恭尹《读‘秦记’》诗中说的:“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从今天的“扫黄打非”之屡打屡扫仍然难以杜绝可以想象,秦始皇一道命令,全国不可能立即烧得光光的,何况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慢,天高皇帝远,六国“余孽”反秦情绪强烈,其政令贯彻的彻底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坑儒”也有不同看法。坑的是儒生呢,还是弄神弄鬼搞什么长生不老的方士呢?有的学者认为坑的是儒生,有的学者认为坑的是方士。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说,他原来也以为坑的是方士,后来改变了这一看法。郭老改变看法的理由是,扶苏在谏坑杀诸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此话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若因此就笼统地说秦始皇“坑”的是“儒”,是屠杀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从而把“坑儒”与“焚书”联系起来,好像秦始皇既毁灭文化典籍,又毁灭掌握文化的人,把秦始皇说成是一个绝对敌视文化价值的暴君,就不那么公正、不那么实事求是了,理由很简单:《史记》中明明交代,坑杀的侯生、卢生之类的所谓“诸生”,确是一些烧丹求神的方术之士。他们用“真人”可以入水不湿、入火不热,会腾云驾雾,其寿命可与天地同长久来欺骗秦始皇捞取富贵。后来见混不下去了,怕秦法严厉,“不验,辄死”——不能兑现就要处死,便凑到一起,不说自己是骗子,骗钱骗物骗地位,却说了秦始皇许多坏话。然后,为首的几个就匆匆忙忙携款潜逃了。秦始皇当然十分愤怒,他说得很清楚:“欲以兴太平(这句话有点为自己求长生不老药找遮羞布的味道),方士欲炼以求奇药”,“费以数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这些歹徒相互之间,天天都有互揭诈骗行为的秘报)。卢生等吾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下令将尚留在咸阳的这类“诸生”(仅限于在咸阳的)全部收审,经御史审问,一个个确系诈骗,根本无法兑现长生不老之类,就统统活埋了。

如此看来,笼统地说“坑儒”是不确切的:一、很难把卢生等人说成“儒生”,儒家的学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二、

全国儒生不止四百六十个，如果要坑杀儒生，不会只杀在咸阳的儒生，不杀外地的儒生；三、这四百六十多人中，可能有几个自称儒家的，但十有八九也是冒牌货，个把屈死鬼也可能有，“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嘛！但总的看来，坑的还是方士。

最后还应看到，不能仅仅因为扶苏的一句话就断定坑的是儒，事实上，同样在《史记》中，相反的论据更多更具体。秦始皇说的那一大段话就是证明。

这是不是为秦始皇、李斯开脱呢？不能这么说。方士有方士的责任，秦始皇有秦始皇的责任。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为什么要想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腾云雾之类的胡说八道呢？这是秦始皇晚年的一大政治丑闻，这丑闻的罪责首先当然应由秦始皇自己来负。

顾炎武廖燕指出 焚书、八股同愚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中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在《明太祖论》中亦指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朱元璋做的巧妙）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心一也”。实在是深刻中肯之论！

大凡得了天下，都不想再丢掉它。因此总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它。但“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这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下工夫。秦的办法就是李斯的“李八条”；汉的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以来是用“科举制度”来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李世民非常明确地对群臣说过：“我只喜欢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宋明时期大兴理学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朱元璋觉得只靠一般提倡理学还不够，便“创造发明”了控制思想最严密最彻底的“八股文”。

明代学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为国子学，亦称国子监；地方的即府、县学。入学的称监生、生员或秀才。秀才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合

格，就成了举人。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及格者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或叫“殿试”，中选者即为进士。进士又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考试办法一律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论述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即所谓“代圣人立言”。论文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全篇文章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股组成。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农业还是农业，有点商业、手工业、采矿业，很少很少，而且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社会地位低贱，为人所瞧不起。因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做官就成了人们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八股取士”的办法一出，全国所有读书人就一股脑奔上这座独木桥，把所有精力全投到死记硬背《四书》《五经》里去了。投考士子遍天下，录取名额却有限。三年一大考，考了一次又一次，一直考到头发斑白、老眼昏花，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上者，比比皆是。

这套办法实在是最阴险最厉害的。说它最阴险最厉害，就在于它不是用焚书，不是用坑杀的办法，不是用容易引起人们抗争的办法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而是用提倡某种学问的办法，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去学、去接受某一思想某一学问的束缚，以达到使人们没学问，没思想——也就是使“民愚”的目的。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告诉我们，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里说过：“秦焚《诗》、《书》，坑学士，欲愚其民，自谓其术善矣。盖后世又有善者焉。其于《诗》、《书》则自为一说，以授学者，观其向背而宠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气焰，因其党与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颡而拙、智者固而愚矣”。朱元璋的八股取士的办法，就是晁说之所说的办法。将《诗》、《书》“自为一说”，并把这“一说”，说成唯一正确的解释，令全国都来学这“一说”，不准学别的“说”。谁照着这“一说”去学去思考，就奖励提拔谁；反之就惩罚你不用你，甚至整死你。结果自然就弄得天下的才智之士，“颡”了，但也“拙”了；“固”（封建意识巩固）了，但也愚蠢了，成了一些除了能《四书》、《五经》的教条以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干不了的书呆子。

不过,这样一来,这些“皓首穷经”的莘莘学子,也的确既“规矩”又“老实”,便于控制了。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曾十分热情地赞颂过中国封建时代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对这种赞颂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比起西方中世纪一些国家,靠血统、出身门第世袭,或其他种种任人唯亲的办法任命官员来说,我们的经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确是一种进步。但就“八股取士”的整个内涵来讲,不能不看到,这是一种最“文雅”也是一种最残酷的控制扼杀思想的手段。读书人为了猎取功名,就得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朱程理学的框框之中。钱钟书所说的“明即暝”、“见即蔽”,就是指这种僵硬的不通世变的“学问”说的。这种学问,你越是觉得学明白了,其实你就是越不明白了。正如宋濂说的,与这种人,一谈到实际问题,他说“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壶坡集》)。颜习斋则沉痛尖锐地指出:八股取士这一套,“千余年来,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者”。颜老先生还将读这类书比做吞砒霜,说:“仆亦吞砒人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疯的故事,就是对“八股取士”非常生动的控诉。

在儒家的著作中,无论在为政、教育、学习、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精彩论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终究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产物,其中有着大量适应奴隶主和封建主统治需要的东西。美国的费正清在他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说:“如果把儒家的这种人生观放到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重老而不重幼,重古而不重今,重既有权威而不重革新,这就在事实上为社会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大答案。它曾是一切保守思想中最成功的一个。”我们所有曾经亲身经历过旧时代礼教影响和束缚过的人,都不会不对费正清这位旁观者的见解,抱有深切的同感;不能不承认他所概括的“三重、三不重”保守思想。朱元璋的八股取士这一保守思想的生命力与能量,得到了更切实的保障与发挥。

应该说,八股文扼杀的,不仅仅是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而是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活力和进取精神。顾炎武与廖燕说八股文之害远过于焚书坑儒,决不是过激之言,而是的确入木三分的中肯之论。

(责任编辑:程 度)

弘扬传统美德 教育今人后代 一部提高人们修养、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好书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即将出版

该书以道德修养为中心内容,经深入挖掘和精选中华传统美德文化之瑰宝,以富有教育意义的格言和故事的形式,分“修身篇”、“家庭篇”、“爱国篇”、“敬业篇”、“为政篇”五个方面,向人们介绍和宣传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且为世人所公认的传统美德。

该书在精选出的每一则格言故事都配有白话今译,并以现代文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广为流传的传统美德故事。

该书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无论对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尤其对我国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该书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许启贤主编,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并将于1999年9月见书。

该书为大32开本,定价23元,另加4.00元的挂号邮寄费。凡欲购者请将书款寄至北京东城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联系人:谷世章



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的 曲折与艰辛

● 熊先觉

清末民初，从日、德等国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与东方法律文化交融，中国开始步入世界的现代法律文化之林，从而兴起了中国现代法学教育。

自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打开国门之后，闭关锁国的国策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人认为西人之所长与中国之所需只在船坚炮利而已，以此侧重学习西方的军事技艺。继经中日甲午之役，深深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有识之士，认为“以东海大邦，见败于扶桑三岛”，乃明治维新之故，转而向日本学习，以法政为先，学技艺次之，学法政以效维新，改革政治，时人认为变法修律，改革官制，方能国强民富。

西方的现代法律、法律思想和法学著作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最早的是由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各国律例》，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泰西诸国律例”。1862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翻译西学，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从而促进了洋务运动，变法修律和法学教育的兴起。

1902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开明官员的奏请下，光绪皇帝才正式下诏派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为法律大臣修订法律。1904年成立修律馆，着手编订新律，同时派员出国考察，并聘请日、德法律专家来华协助起草法律文本。沈家本认为“法律为专门之学”，应培养“专门之人”，从“中枢长官”到“百里长吏”皆应知律。他激烈抨击科举取士不讲究“经世致用”，主张兴办法政学堂，以应急需。

1904年，中国历史上成立了第一所以法政为教学内容的直隶法政学堂。次年，御史乔树柟奏请在各省添设法政学堂，乃次第兴办。最初皆由“仕学馆”或“课吏馆”中的“仕学速成科”改变而成；并由官府一手操办，而其对象也是以吏为限，分设法律、政治等科，官员、绅士等班，短期与长期结合等。如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清廷上奏称：“以直隶设立法政学堂，州县入学者无多，请由吏、礼两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省举人中，年在40以下者，无论科别远近与已未注册，……

考验合格，俾入法政学堂肄业。”又如1908年，山西巡抚宝棻所奏：“晋省法政学堂，一年毕业，……所授功课，分门考试，合旁听生共毕业一百四十人。”同年11月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折称：“桂省本年秋间，遵照部章开办法政学堂，原为造就吏材之计……经臣三次考选，送入学堂者，先后一百六十员，佐杂居十之七八，州县以上仅十之二三，其中年齿已长，难期深造者，又居十之八九，大都由于强迫，勉就讲习科，以期速成，其热心向学肯人别科者，盖无一焉。”从上述可见当年举办法政学堂的艰难。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统计，至1909年全国共有专门学堂127所，其中法政学堂47所，占37%；学生总数23735名，其中法政学生12282名，占52%，比文、理、农、工、医、师范等专科的总数还多。法政学堂发展虽快，但质量不高。此时的法政学堂，在北京有：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在天津有：直隶法政学堂，直隶法律学堂；其他各省均有法政学堂，主要在山西、山东、江西、江苏、湖北、广东、云南、四川。严格说来，所有这些法政学堂或法律学

堂，并非现代法学教育意义上的教育设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府的急功近利之举，以速成方式培养了一些略知法律的官员。

自1908年清政府取消民间兴办法政学堂的禁令后，才开始改变官府独揽法政学堂的局面，推动法学教育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民国建立，国政更新，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创共和政体的新纪元，需要大量法律人才，掀起了兴办法学教育的热潮，公立与私立并举，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中国法学教育的兴起，除了清末的“立宪”修科，“废科举，兴学堂”（如1902年废“八股文”，公布《壬寅学制》，确立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体制），和辛亥革命等政治、文化背景外，还有经济发展的背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自然经济严重束缚了社会发展。鸦片战争使国门洞开，五口通商自由贸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势力日益冲击和渗透中国国内市场，促使原有的以家庭手工业与个体农业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瓦解，以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

派军用与民用企业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物质基础与必要前提。

中国现代法学教育兴起最早的是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于1918年将北洋大学并入北大，设法学院。民办的有1912年（民国元年）由汪有龄（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江庸（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毕业）、黄群（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等集资创办的以教学和研究法学为重心的北京朝阳大学，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系。继而是教会的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前者是1915年在上海开办的东吴大学法科，后者在北京开办综合性大学。

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根据1949年统计，设置法律系科的大学有54所，在校学生28,276人。从1928年到1947年的20年间，法科专业毕业生51,000余人。朝阳大学在其存在的近40年期间培养法律人才近万人。1949年初北平解放，该校由人民政府接管，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仿效苏联模式培养法律人才，是“政法”的滥觞。这里表明了

政治与法律二者关系的迥异。

所谓“法政”，是表明政治从属于法律，即权力服从法律、法大于权、法律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是崇尚“法治”、“法律至上”、“宪法至上”等意思。所谓“政法”，则相反，表明法律从属于政治，即法律服从权力，强调法律必须为政治服务，把法律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无疑是为“法律虚无主义”打开了绿灯。

解放后，法学教育每况愈下。1951年全国的法律院校有36所，1952年减至22所，1956年只有8所，到“文革”时期几乎全部停办。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迎来了法学教育的春天。不仅恢复了原有法律院校系，还新设置不少，并且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质量也提高了。特别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进而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使“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宪法的最高规范性，标志着民主法治的新里程碑。

（责任编辑：刘家驹）



汪有龄



汪庸



利玛窦

利玛窦

和他的墓地

● 肖佳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思想与外界大规模接触仅仅两次，一次是魏晋时期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欧洲人少得可怜，数来数去，只有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最被人们熟知。在他们之前，中国和欧洲很少直接交往，欧洲人自古知道东方丝国，但不清楚它是什么样子，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纪震动了欧洲，从此，欧洲人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土地广阔、民物繁庶的大国。但这之后，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中国又被遗忘。直到利玛窦，中国在西方人的口中开始形象生动地被叫做中国了。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与西方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他为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技知识，并且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介绍到西方。这位耶稣教传教士，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自1582年8月他到了澳门，开始了在中国差不多30年的传教生涯。

在世界文化中，中国文化是在没有外来文化干扰的情况下封闭发展起来的。天生一种排他倾向，这样，利玛窦的前驱沙勿略连中国的大门也没进来，利玛窦踏上中国土地的最初也像所有外国人一样，被视为俘虏，备受歧视。利玛窦总结了前人传教失败的经验，认识到中国有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他开始不急于传教，以入乡随俗的姿态穿中国衣，吃中国饭，诚心诚

意学习中国文化。他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的西方学者，曾把中国的孔子和四书介绍到欧洲。利玛窦还研究中国的法律和风俗，攻读过中国的经典文献。他赞美中国，赞美孔子，赞美中国的科技，认为中国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天文、中医以及很多数学分支上都有很大的成就。由于他对中国的热爱，使他争取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甚至皇帝的支持，当时内阁90%以上的官员都和利玛窦有交往。利玛窦在罗马受过很好的数学训练，曾把欧氏几何介绍到中国。除了精通数学，他对天文、地理、历史、文学都有研究，还会机械工艺，甚至给中国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把地图交出去时利玛窦还很担心，如果中国不是作为中心，而是仅仅占了一块不大的地方，那么他会不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没想到中国人一看地图就傻了，以前总以为中国就是天下，一看地图，才知道中国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才那么小一点。利玛窦画的地图在中国翻制过12次，万历皇帝爱不释手。利玛窦还带来了三棱镜和时钟，加上地图，成了他成功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利玛窦游历了中国最重要的一些省份，后进入宫廷，最终让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接受了他和他传的教。

在利玛窦去世前，他写完了《中国基督教史》，烧掉了全部信件，盼望着死亡的到来。利玛窦好几次说，亲爱的神父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好地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结论是对它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的到来。若干时期来，利玛窦一

直盼望能在京外的郊区购得一块教士墓地。按中国一向的规矩，外国传教士死后要运到澳门神学院安葬。外国传教士想在中国北京立墓地，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外国人怎么能葬在中国呢？

利玛窦的遗体被装入一个密封棺材里停放在教堂，等着奇迹的出现。

给利玛窦举行弥撒那天，大批教徒来了。其中一位知名人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程序，他和神父们一起商量，草拟了一个奏章，用和利玛窦一起到中国的庞迪我神父的名义，上奏皇帝，感谢皇帝赐给的皇家津贴和几年后又赐予居住的地方，说长途运送遗体，水手们都很害怕。考虑到我们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陛下的荫庇之下，是否也可以把我们也算作您的臣民……相信您能赐给利玛窦一块葬身之地。最后礼部签署了意见，皇上审阅后转给阁老，阁老同意，签了“可”，又送给皇上。中国皇帝赐给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一块墓地。

有了皇帝的圣旨，教会选中了几处，其中在北京二里沟有一处曾是乡间别墅的寺院，只有一个僧人管理。一问，没想到这是皇宫中地位很高的杨宦官买下的。此时杨宦官已犯罪判了死刑，正押在监狱等待执行。这位临死的宦官为了挽救这座别墅的产业，把这处寺院转给特别受太后宠爱的大太监，条件是他必须不惜一切手段把这处地方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来。神父们并不知道其中情节，如果知道，可能会另挑一处。等发现时，已经别无选择。

在监狱中的杨宦官通过一切手段，威吓神父。神父说除非有圣旨，否则不能放弃。杨宦官又求助太后，说一座价值数千金的寺院给了外国人，听由他们把偶像推倒，淹了烧了。幸亏太后认为不值得向皇帝提起这事。但神父们的麻烦还没完，别墅改为仁恩寺，归户部管理。涉及

皇帝的赐礼要转户部，而神父在户部官员中没有熟人，而与礼部官员熟悉。帮忙的大臣说，要设法把这件事从户部转到礼部。从法律上说，这件事可以由户部处理，也可以由礼部处理。礼部尚书答应大力协助，申请书和答复一月内交到了皇帝手里。皇帝批复后照例应由礼部通知户部，皇上业已将此项产业赏赐，宣布今后免税，并把它名字从税册上注销。户部主管人因此刁难，要求解释把这样一宗宏伟产业拨给神父的原因。庞神父上书户部尚书，要求他撤回文件，说明皇上不仅给的是墓地，也是一处住所，如果碰巧显得过于华丽，也不是与神父的尊严相称，而是与皇上慷慨赏赐相称。庞神父又去拜访另一位户部官员，叫他劝户部尚书不要成为唯一反对那么多大臣意见的人。谢天谢地，第二天，户部尚书送来一封很客气的信，答应一切照神父愿望办理。

千曲万折，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墓地在整个传教团监督下落成，花园的一端用砖修建了一座六角形带拱顶的小教堂，教堂每一边伸延着半圆形的墙，围出有柏树的一块地方作为教会成员的墓地。

一年后利玛窦的遗体移到这里。陆续地，很多外国传教士的墓碑一座一座竖立起来。

(责任编辑：仲文)



利玛窦墓



清官严重

● 王光远

严重，字立三，号劬园，湖北麻城南正街人，生于1892年，父亲曾在安徽任知县，他随父在任所长大。父亲去世后，家无余财，生活极为清苦。16岁时，抱着从军救国的志愿，考入武昌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他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参加了保卫汉阳的战斗。民国初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与邓演达、叶挺、季方等人同学，彼此志趣相投，互相砥砺。

不久，应邓演达之邀，严重在粤军邓铿部下任职，后参加黄埔军校任一、二、三届学生总队长，还兼任训练部主任。他起早睡晚，事事以身作则，同学私下亲昵地称他“严婆婆”。

学校租有一栋花园洋楼作为教官宿舍，严重不去住，住在一个只有一桌一椅一榻勤杂人员住过的阴暗小屋里。严重对有困难的学生，总是慷慨相助。有一位湖北籍姓萧的学生家在农村，是年大旱，一家数口借贷无门，萧某接到家信，痛哭不已。严重得知后，给他家中寄去20块大洋，萧某深受感动。

北伐开始后，严重出任二十一师师长兼党代表，参加东线作战，陈诚、黄维、宋希濂等都是该师中下级军官。该师纪律严明，严禁赌博，不准拉夫，不准扰民，一路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在桐庐消灭了孙传芳主力孟昭月部，在苏州消灭了白云山部，严重成了北伐名将。

严重带兵，实行“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用人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各级都设有士兵参加的经委会，定期公布收支情况。严重还把师长特别经费交给政治部作宣传之用。各军都来学习他们的经济制度。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和武汉已公开对立，当时严重率二十一师驻防南京，蒋极不放心，怕他和武汉的邓演达联合，于是伪造了一封“严邓合流倒蒋”的密电，故意拿给严重看，严重心中明白，立即提出辞职，推荐陈诚为师长。据时任该师经理处长袁守谦回忆：移交有现金银洋46000元，中央大洋券36000元，三省通用券40000元，国库券57600元，丝毫不差。

严重只身去了杭州天竺寺，穿起僧衣，谢绝会客。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严重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11月，严重以父丧为名，辞职携眷回湖北麻城奔丧。

1928年4月，严重出任湖北民政厅长，他本想“守住一片净土，作为推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地”，结果湖北在桂系军阀统治下，实行清党反共，滥捕乱杀，把湖北变成血雨腥风之乡。严重十分气愤，挂冠而去，在庐山，开始了他的十年隐退生活。黄埔同学问他为何这样做？他说：“宁汉分裂，令人痛心疾首。南京大开杀戒，伤我民族元气；武汉大张挞伐，又何尝不是激波扬浪？我怎能和他们同流合污？”

严重住在庐山的太乙村，因无积蓄，便自己种菜，自己打柴，用竹管导山泉入厨房，坚持自食其力，有时间就读书写作，著有《大学辨宗》一书。陈诚得知他生活困难，把他任军政厅长时的薪水汇给他，严重回信说：“我没有做工作，不能受俸禄”，将款汇回。蒋介石也几次派人送钱来，皆被回绝。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时，曾两次来访，严重也避而不见，蒋从前门进，他从后门出。

1934年6月，宋瑞珂到太乙村拜谒老师，中饭是邻居送的粽子，一人只吃几个算是一餐。9月，宋瑞珂再来，严重亲自煎面饼待客，无菜无汤，以茶水咽饼。宋见他生活如此，托人送来50元，严重却以宋瑞珂的名义存入了银行。一次，韩浚带了几瓶酒两只火腿来，严重才算改善了一次生活。

严重的高风亮节，外界时有披露，《大公报》发表评论说：严重乃“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见报后大为震怒，想把严重赶出庐山，被陈诚和陈布雷劝止。

1935年后，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严重对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极为愤慨，专程北上到陕西晋谒黄帝陵，沿途投宿荒郊野店，访问民间疾苦，徒步往返，历时三月。在此期间，他还由施方白陪同，赴保安访问，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他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十分赞赏。“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和周恩来商议，改组国民政府，提议由严重替代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因蒋介石的反对，未能实现。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公论，又深恐严重投向延安，于是再命陈诚去太乙村相请，严重抱着“赴国难，求死所”的宗旨，答应下山。10月，严重来到南京，要求带兵上前线，蒋介石说：日军深入，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抗战期间，武汉地位特别重要，希望他出任湖北省主席。严重推之再三，答应仍任民政厅长，由陈诚兼主席，陈事忙，委任严重为代理主席。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北历届最得人心、最精干的省政府。

严重就职后，提出：“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着手调训专、县军政人员，对全省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开展全民抗战。1938年10月，日寇向武汉大举进攻，严重最后撤离武汉，将省府迁往宜昌三游洞。后又迁往恩施。

严重大力整饬吏治，严惩贪污，大刀阔斧地撤换了一批庸碌无为的县长。他还多次告诫部下：“为政要敢于得罪大户”。有人揭发，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敲诈土膏行现洋2000元，严重派人查证属实，立即下令第四区专员金巨堂将其逮捕解省，金与朱是沔阳同乡，拒不执行，严重派省保警队将其捕来，金巨堂又请江防司令郭忏出面斡旋，严重不为所动，终将朱枪毙。严重

还得知恩施县政府会计公开吸食鸦片，也毫不留情地将其枪毙。咸丰县长秦绍恬，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百姓叫他“秦少刮”。严重微服来到咸丰，查明了该县长的行径。一天早晨他来到县府，秦绍恬还没起床，叫他在会客室等候，他写了一张字条：“严立三有事要会县太爷”，交勤务兵递进。秦绍恬一见急忙出迎。严重问他：“县府几点钟办公？”他说：“八点。”严说：“为什么八点半还没有工作人员上班。”命人将秦带回省府听候处理。

严重生活简朴。穿青布中山装，冬天只加件棉大衣，在机关与工作人员同桌吃饭，外出就在居民家中用餐，举行宴会也只是四菜一汤。一次，严重和陈诚一起坐车去重庆，陈诚见他带了一瓶高级酒，问他：“是否准备在路上喝？”严重摇摇头说：“这酒太贵，想卖掉。可是恩施没有寄售商店，顺便带到重庆去卖。”陈诚听罢哈哈大笑，说：“如果有人发现湖北省主席到重庆卖酒，那多么不好意思！还是自己喝了吧。”

严重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用私人。他的族弟严方乐，想在省保安处谋职，他严词拒绝。他妹夫王峻安是咸丰县首富，一次，给他送来米南官的字画和古玩瓷器、虎皮等珍稀礼物，有事相求。他竟将礼物抛掷户外，不等王峻安开口，就对王说：“你把东西拿走，仍以兄弟相称；否则，以后不准进门。”

1940年，严重辞去省主席职务，移居恩施成立了“晒坪垦殖处”，把晒坪方圆60里的荒丘改造成良田，实行以农养兵。严重任省主席近三年，特别办公费一文未领，陈诚把钱寄来，他将此款存入银行，立了个“惠廉有道”的名目，作为奖励本省贫寒学生之用。

1944年，严重生病，为了支付医药费，他将惜如珍宝的、在保定军校得奖的金挂表，及陈诚等人送的白兰地等高级酒数瓶，托人去重庆变卖，以付药资。4月30日，严重在恩施病逝。湖北人民无不哀痛。张难先送挽联曰：

哭公只有泪 提笔竟无言

董必武送挽联曰：

贻我一本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责任编辑：刘家驹）

在霍元甲故里

● 冬 枫

霍元甲的“家”，在距天津市 15 公里的外环线西的小南河村。这儿三面傍河，一面临洼，有 12000 多亩土地。霍元甲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最后也葬在这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全国播出之后，默默无闻的小南河村，一下子名声大振，新近又被开辟为风景旅游区，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人络绎不绝。

离很气派的村委会大楼不远，穿过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就是正在建设的“元甲公园”。高台上，一幢普普通通的北方农舍大门上，高悬着“霍元甲故居”的匾额。这里，只是三间土坯垒筑的小平房。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七（公元 1869 年 1 月 19 日），霍元甲就诞生于此，度过了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二十多个春秋。

故居正室，墙上挂的霍元甲遗像，端庄凝重，神采飞扬。遗像两侧，是次子东阁得知父亲遇害后敬献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

东屋是霍元甲卧室，土炕和百页窗依然如故，陈设只有一对枣木箱，一条长凳，两个瓷笔筒，一个大砚台，一只铜墨盒……在所有文物中，最珍贵、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墙上高悬的孙中山先生为精武体育会亲笔题词：尚武精神。

元甲的父亲霍恩第，是众人瞩目的“秘宗拳”的六世传人，常常为“跑关东”的豪商巨富保镖护路，是位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暮归故里，向后代传习武道拳术。在这样一个武术世家，霍元甲从小就对枪棒有着特殊感情。

他的习武每日一身汗水一身泥，披星戴月，风雨不误。1890 年（光绪十六年），22 岁的霍元甲，在一次极为偶然的的机会里，大败强手，锋芒初露，使父亲极为惊喜。

不寻常的胜利，使初出茅庐的霍元甲在各地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在这段时间，他一面苦

心深钻家传武技，一面虚心吸取各派所长。天天刻苦磨练，终于达到了“体软如绵、骨坚似铁”的超人境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霍大力士”。

一个夜晚，“源顺镖局”老板，为了试试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大力士”到底怎样，专程从北京赶来，雇人将两个青石碌碡斜倚在药栈井口上，假若力不支，稍一倾歪，立刻就会掉进井中。心胸豁达的霍元甲，从容地走上井台，选好角度，站好位置，不慌不忙猫下腰去，顷刻间，随着“呼”的一声响，伸开双臂，将这对“石山”推出好远。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宣统元年冬，霍元甲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个“中华之魂”的杰出代表，为“雪病夫之耻”，在各大报纸、用汉英两国文字，刊登巨幅广告：“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愿与天下健者从事！”还突出强调：“专收外国大力士，虽有钢筋铁骨，无所惧焉！”

当时，英国大力士奥皮林，虽然早就在上海摆出擂台，但一听到霍元甲应战，他吓得连招呼都没打，吓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

霍元甲的这一壮举，顷刻轰动了上海滩，震惊了武林，使亿万民众精神为之一振……

从此霍元甲那种“强种强国”的信念大大增强。在他看来，“欲使国强，非人人尚武不可”。因此，就在此后不久，他在上海闸北王家宅，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民间体育组织——“中华精武体操会”（后改为“精武体育会”），订有会旗、会服，以“德、体、智”三育为会旨，一致推举霍元甲出任“技击主任”。霍随即打破千百年来武术界互守秘招的陋习，主动把世代家传的“秘宗艺”公之于众，而且，还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设立了分会，将方兴未艾的中华武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孙中山先生对此举非常重视，亲

笔题与“尚武精神”相赠。还为会刊专号《精武本纪》撰写了序言。

我国精武事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上海“日本柔道会技击馆”的不安。他们看到霍元甲异军突起,当即从日本国内精选十高手专程来华,一心想把霍元甲打下台。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一个个全都败在霍元甲的脚下。气急败坏的日本武士们,当即撕下伪装的嘴脸,不顾一切地蜂拥而上,妄图施以恶毒手段,立刻被公证人按章拦阻才未得逞。于是,这帮家伙一反常态,变兵为“礼”,假惺惺设酒款待,并主动请来“名医”秋野为其治病。一向坦直和善的霍元甲,受之无疑,服下了烂肺之毒药,溶于血液,病情突然恶化,

四肢抽搐,不久于1910年9月14日,这位年仅42岁的一代武林大师,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间。翌年,由弟子刘振声等,扶柩故里……

霍元甲的陵园墓地,是由三层阶梯构成,一千七百多平方米的墓基,全部用汉白玉大理石砌铺,居高俯视,第一层形如盾牌,那是“精武会”会徽。二层环以三颗翠绿五星,那是会旨所倡导的“德、体、智”“三育”的象征。第三层便是直径达4米的墓穴。汉白玉栏杆圈围,中间矗立着米黄色花岗石碑。伫立墓前,缅怀追思,衷心告慰这位武林豪杰英灵,今日九州大地,万物峥嵘,面对强权,无所畏惧,愿霍翁永远笑眠九泉……

(责任编辑:仲文)

韬奋先生拒贿

● 小艺兵

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生活》周刊主编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腐化,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结婚典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婚礼的豪华气派。

韬奋先生已知晓王伯群花数十万元公款,在上海愚园路建了藏娇金屋的事实,他又派人明察暗访,证明读者来信属实,便对来信作了略微润色,加了编者按语,准备在“读者信箱”栏发表。

正当稿件还在排印时,接到密报的王伯群慌了,连忙派了商务印书馆一位“交际博士”和一位韬奋先生的老相识,准备以十万光洋为筹码前来与韬奋先生“谈判”。韬奋先生知道来者不善。

交际博士一进门便开口,说:“邹先生,王部长最近拨了一笔公

款,对上海各家报刊进行补助,贵刊是王部长特别爱好的,也补了一点。”韬奋先生问:“多少?”交际博士说:“不多,只十万大洋!”

韬奋先生严肃地站了起来,说“王部长的好意我们领了,但我们的刊物是个私人刊物,从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钱,我们不能收!”

交际博士赶忙说:“邹先生,您别误会,这不是津贴,是补贴。连补贴您也不收,就算王部长入股的资金吧!连股金您也不收,我们回去就只好交代了。”

“我们刊物的股东早就满了,你们还是转告王部长,如果他钱多得没地方花,我看就把它捐给仁济堂吧,全国还有几百万受灾的农民兄弟嗷嗷待哺呢!”

这时,跟随交际博士一起来的那个老相识,把他拉到门外,悄悄对他说:“邹先生,这笔钱您无论如何

也要收下,不然我回去就没脸见王部长了。”韬奋先生摇摇头,那个熟人又说:“您不收的话,不但我今后的日子不好过,恐怕您今后也不好做人呀。”

邹先生不再多言,送走了这两位客人,义愤填膺地回到办公室,拍着桌子。心想,这些腐败分子,他们以为金钱是万能的,连我也可以收买,去它妈的!

不久,邹先生就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警告他:“你太不自重,你要小心!”邹先生回答道:“是好汉,就请报出真实姓名,我是不怕威胁和恐吓的报人!”

揭露王伯群的文章刊出以后,在上海反响很大,《生活》周刊在广大读者中威信更高了。

(责任编辑:仲文)

我在动乱中的阿尔及利亚 当记者

● 王敬诚

80年代末以来，原教旨主义一直在北非大国阿尔及利亚策动宗教恐怖活动，数万人死于暗杀和爆炸，140多名外国人遭到宗教恐怖分子的暗杀，数千所学校被纵火和爆炸毁坏，社会财产损失超过了20亿美元。为了恢复国家稳定和维护政权，以参加抗法武装斗争的一代军人为核心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权与原教旨主义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于1993年4月7日被派到新华社阿尔及尔分社任首席记者，如实记录了那里发生的一起起震惊世界的恐怖案件。

1994年8月15日上午9时刚过，一位阿尔及利亚报界朋友给分社打来电话，说有两个中国人清晨在首都郊区被恐怖分子暗杀。我立刻开车前往大使馆。还没到使馆大门就远远看到经济商务参赞田锡进的汽车在荷枪实弹的警车护卫下疾驶远去。使馆传达值班员告诉我，田参赞就是为处理上述案件去案发现场的。

回到分社，大使馆邓绍勤临时代办打来电话说，今晨，中国水利对外工程公司驻阿尔及利亚代表处的两名专家在驻地附近遭到恐怖分子暗杀，已送医院抢救。

下午3时30分，阿官方确认这一不幸消息后，我们将有关报道发回北京新华社总社。

这是1993年9月21日两名法国人被暗杀

后，宗教恐怖分子暗杀中国人的第一起惨案，也是5个月前的3月15日中国承建旅馆工程组的两名专家外出公务失踪后，发生的针对中国人的又一起严重案件。

至此，宗教恐怖分子在过去的11个月里已野蛮杀害了在阿的16个国家的51名外交官、合作人员或侨民。

西方国家已经撤走了绝大部分技术合作人员和侨民，关闭了所有领事馆，文化中心和学校等机构，瑞士、荷兰等国还暂时关闭了使馆。没有闭馆的国家一面将其使馆人员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一面为其使馆派来了大批武装人员，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到1993年底，西方国家不但不派记者到阿尔及利亚采访，而且将其在阿的常驻记者全部调离了。西方通讯社那时发的阿尔及利亚消息全是它们的当地雇员发出的。当时，没有撤离的外国记者只剩下了新华社、越新社和6个阿拉伯国家的10多名记者。

中国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在1993年底就已将使馆的全部女同志撤回国内。1994年初馆员又压缩了三分之二。到了年中，我在阿承建的工程项目全部停工，我技术合作人员除少量留守外，已分批撤回了国内。中国医疗队也决定尽快撤回国内。

分社怎么办？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也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政局越紧张越特殊，新华社记者越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职责。为了安全，我们分社的两个人暂时搬进了大使馆。

使馆有阿武装警察 24 小时保卫，环境比较安全。

第二天，我和田锡进参赞、中水公司祝以总代表前往阿军总医院。我将以新华社记者的身分担当这一惨案的见证人，与阿方法医一起对 2 位被害专家的尸体进行鉴定和拍照，并将结论记录在案。

阿外交部、内务部官员和院方医务人员都对我国专家被害表示震惊和遗憾，对烈士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诚挚的慰问。法医在协助我为死者穿衣时，动情地说：“他们是我们请来的朋友啊！中国 1958 年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起，就不断地援助阿尔及利亚，为我们做了数不清的好事！我们对不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呀！”

在阿方人员的帮助下，将两位烈士装棺护送到阿尔及尔国际机场。在机场贵宾大厅，阿外交部为两位烈士遗体起运回国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送别仪式。

此后，根据国内指示，中国驻阿使馆完全进入了留守状态，包括我们夫妇在内的全体人员一律严禁外出。但是为了完成记者的任务，我有时还不得不单独开车去参加外交部或其他部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还要应邀采访有关会议等。只是每次外出必须事先请示，事后销假，而且还要在衬衣里面穿上沉重的防弹背心。

1994 年 12 月 24 日，一架飞往巴黎的法航客机被劫持，机上一名越南商务参赞、一名法国驻阿使馆工作人员和一名阿尔及利亚警官，被恐怖分子当作与阿当局和法国政府谈判的筹码分别杀害了。

这起劫机案震动了法国，成了当时的世界头号新闻。两天后，法国警方在马赛机场干净利落落地击毙了 4 名劫机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案件。但是，阿尔及利亚从此成了世界上“最不安全的”“高风险国家”。

1995 年初，我们中国大使馆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大使必须外出时，由阿方雇员开车，保镖陪伴；有关人员必须外出时，要 2 人同行，由阿方司机开车；其他人无故严禁迈出使馆大门；同时还决定暂时放弃使馆院外的宿舍楼，将馆员全部集中到使馆办公楼内生活，以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

我们此时暗暗写好了给总社和国内孩子的可以随时发出的信件，表达了我们坚守岗位到最后的决心。那时，我照样开车去参加阿各部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示新华社记者的存在。那一段时间，我常常是参加记者招待会的唯一外国记者，因此成了经常上电视的“记者明星”，引起一些朋友和同行的担忧。他们提醒我少公开露面，以免引起恐怖分子的注意。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对我说：“新华社记者是始终与我们在一起的忠实朋友，这显示了阿中两国久经考验的友好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泽鲁阿勒总统于 1996 年 10 月访华前夕，外交部新闻司打破了从不安排总统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惯例，特别安排总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书面采访，引起阿本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惊讶和羡慕。

使馆内房子紧张，我们只能在使馆宿舍楼内坚持工作。白天我们照常接待朋友来访，扩大消息来源，深夜发完稿再通过特设通道到使馆原来厨师居住的一间孤立的小平房睡觉。为此，使馆护院的 3 条警犬与我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天天都在漆黑的夜幕中等待我们并亲热地护送我们回屋。使馆同志戏称我们是“人仗狗势”的记者。

就在此时，总社特别给我们来信说，“最近在阿反政府势力向驻阿外国人发出最后离阿限期的情况下，你们仍和使馆同志一道留下继续工作，这种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受到了郭超人社长、总社党组和有关部门的称赞。”这是总社对我们坚守岗位和勤奋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鼓励。

（责任编辑：田 人）

访悉尼华人市长 曾筱龙

● 杜明明

在澳洲沸沸扬扬的白澳种族主义闹剧中，一个出身于大陆就读于香港，一个唯一澳洲华人市长——曾筱龙面临的是什麼，他有没有受到冲击，他又如何对待这些变迁，记者专程采访了他。

自上次去悉尼访问他后，已经两年多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充满了自信和智慧的华人。在目前这种反移民的压力下，我想，他的面容不知会是怎样？但愿他能保持那份开朗与轻松，那份英俊和潇洒。当我步入庄严雄伟的悉尼市府大厅时，当我再次看到曾筱龙先生的名字在历届市长的大圆铜牌上熠熠闪光时，我默默地祈盼。

这是一面巨大的圆球形铜牌，像一面古老的盾牌，镶嵌着英国式的傲慢与神气，上面刻着悉尼每一任市长的名字，在这几十个名字中，只有曾筱龙是一个华人。

又一次走进他这间宽敞的大办公室，一切都没有变，就像他在这儿一坐就是数年一样，巨大的橡木窗口边上，那个大办公桌和以前一样放满了文件，井井有条，我不知为什么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一边喝咖啡一边和一个秘书聊天，黄头发的小伙子不懂中文，但是笑容满面，对曾筱龙很佩服，告诉我他向曾市长学到了许多东西。听到外国人对华人的称赞，我总是无端地兴奋不已。因为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华人能坐在外

国政府的高椅上。

从他办公室橡木窗口望出去，街上的行人西装革履，来来往往，有的面孔是白的，有的是黄的，黄脸上似乎有着隐紫的忧郁。

不一会，曾筱龙市长迈着大步走进来。国字脸上有棱有角的嘴微微翘着，显示着一份豁达和冷静，一份坚忍和执著。紧紧握手之后，他说，“真高兴再次见到您。”

“听说您收到一颗恐吓子弹，有这回事吗？”问完了，我就后悔，真不该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却点点头笑了，“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雕虫‘小计’而已，无碍大局。”

面对白澳主义

曾筱龙说，白澳主义之所以在澳洲泛滥，当然有一定的历史根源。

其实，华人在澳洲的开发中曾经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19世纪50年代在澳洲的淘金热中，华人已经多达十万，仅仅排在当地土人和白人之后，他们种菜挖矿，开厂办钱庄，建立过多种团体，后来，随着淘金业的逐渐衰落，澳洲经济不景气，加上澳洲当局推行白澳主义政策，把华人全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华人急剧减少，也像在其他国家的华人一样，他们受尽了凌辱和剥削，老一代的华侨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后来，随着澳洲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的起飞，随

着亚洲移民的增加和亚洲移民文化层次的提高,加之亚洲移民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移民对澳洲的贡献愈来愈大,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澳洲华人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全澳有三十多万华人,其中不少是专业人士,在澳洲超级富豪榜上,有八位是华人。但是,华人的参政意识实在太薄弱了,在政府中根本听不到华人的声音。“如果当局没人知道华人的想法和希望,你又怎么能奢望他们来帮助你呢?”——曾筱龙说。

他在从香港到澳洲读预科的时候,就经历过众多种族歧视的白眼,他亲眼看到过许多白人欺侮黄种人的事,往事历历在目。这二十年来,澳洲人在工党的执政和支持下,在向各民族团结和平共处的方面跨出了一大步,尤其是工党提出的多元文化受到了愈来愈多的澳洲人的支持后,他们在推动澳洲进入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世界上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白澳主义就此消失了,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正如当年德国的希特勒轻而易举就可以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犹太人的战争一样,当经济面临一些问题时,总是有人拿出移民问题做文章,怪罪到移民身上,这次发生在澳洲的汉森的一国党也不例外。

汉森之所以能出乎人们的意料夺得这么多的席位和支持,实在是历史的反动,这当然和政府处理得不好有关。——曾筱龙说。

“实际上,这和政府的反应迟钝也有相当的关系。过去几十年来,澳洲政府独具慧眼,一直倡导多元文化,这对各个国家的精英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而正是澳洲人与各个国家移民的共同努力,才把荒凉的澳洲建设成今天的这样发达的后起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平等的有多元文化的繁荣的社会。任何一个正直的澳洲人都不会也不该忘记这一点。同时,也给了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华人必须积极参政,必须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必须使白人真正懂得华人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否则,要想被认同,难于上青天”——这正是曾筱龙参政的动机。



曾筱龙

不能让历史倒退

曾筱龙记得,1991年9月23日,华人社会欢呼雀跃,为他,一个青年建筑家,一个从香港来的华人当选为澳洲第一大城悉尼的副市长兴高采烈。的确,这决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荣誉,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誉。他是第一个登上澳洲政坛高位的华人。

1995年,在联合国的首届全球文化多元化会议上,澳洲外长以文指出,澳洲成功地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澳洲人打破封闭思想,认识到亚太区是澳洲未来前景所在,而澳洲的多元文化则是国家强大的重要因素。会议期间,悉尼的四海一心多民族同乐日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省长卡尔剪彩,数以千计色彩斑斓的心形汽球冉冉升空,上万名身着不同民族节日服饰的市民和花车在大街上游行。在主会场,中国各民族服装表演获得了观众的青睐,省长卡尔表示,将支持曾筱龙竞选悉尼市长,并将出席曾筱龙的竞选晚



曾筱龙和他的父母

会。

自1991年起已经连任两届副市长的曾筱龙在全球多元文化会议上指出，一个在文化上多元的社会，是一个更丰盛、更公平及更令人振奋的社会，而文化多元的成功主要依赖一种分享的精神，当悉尼市赢得了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多元文化的悉尼展示给世人的是一个充满高度人文精神的城市，其中悉尼市过去几年装修市内建筑费用的60%是来自亚裔社区。

1993年，曾筱龙被委任为澳洲联邦移民及民族事务部之全国委员会委员，1994年，被委任为联邦总理多元文化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又被联邦外交委员会委任为澳中理事会委员。

二十多年来，曾筱龙为少数民族争取合理的利益做了许多的事，澳洲报纸评价他：敢怒敢言，据理力争，配上独到的人格魅力，使不少西人对华人刮目相看。针对澳洲的种族歧视、移民政策和人权问题，他发表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引起了澳洲主流社会的重视，以后，他与一位反亚裔议员在电视台公开辩论移民问题，曾在澳洲掀起了轩然大波。

同时他意识到，华人不应该总是处在被同情的弱者地位，尤其在澳洲的华人，经济上是有一定实力的，他在不同场合，再三再四地向华人呼吁，我们除了要积极争取平等权益之外，民族

自强，建立华人的美好的整体形象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体现了华人对澳洲的贡献，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曾筱龙的建议得到了华人社会的反响和支持，悉尼的市政建设的投资，就大部分来自华人社会。

他不仅努力为华人争取同等权益，使第二代华人律师能被委任为法官等等，而且还着重沟通华人与主流社会的联系，多

次请州长、移民部长等高级官员来访华人社区，积极鼓励支持华人的民间组织及华人出任政府和民间的职务。

在澳洲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曾筱龙认为，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是振兴澳洲经济的唯一出路。他为连接澳洲与亚洲的友谊之桥，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香港，并出访东南亚，他还协助中国各种代表团访问悉尼……

筱龙式的公共建筑

朋友带我走进唐人街，迎面扑来的极其中国化的牌坊气势夺人。这座红砖金瓦、雕梁画栋的巨大牌坊在唐人街的入口，我一看就呆呆地站住了。在美国生活了七八年的我，游过世界不少国家的我，从没想到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唐人街，街面整整齐齐，清清爽爽，树木成荫，供人歇息的凉亭小巧美丽，古色古香的街灯仿佛倾诉着五千年历史，我真的好感动。

原来，这条称作德信街的唐人街在70年代中期，还是一条破旧的街道，为此曾筱龙等一群悉尼华人立志改造唐人街，成立了美化唐人街的委员会，他们大力说服政府同意拨款建设，又挨家挨户劝说街上的每一个店铺同意封住街

口，停止所有的车辆来往，其后，刚刚开了建筑行的建筑师曾筱龙终于开始了他一生最大也是最奉献的建筑设计，他担任义务设计师，夜以继日地干，草图都不只上百张。他广泛征求意见，务必要给华人争口气，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弘扬我们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给妄自尊大的白人一个教育。当最后成稿获得通过后，他一头倒下，整整睡了一天。

80年代初，筱龙又为悉尼建造一座中国式的花园奋斗。他担任这个花园的工程总顾问。在他的努力下一座融中国南北民族特色的中国园林就出现在悉尼达文港，每天，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

悉尼西区的大型天后宫，卡市的牌楼，澳华疗养院的扩建工程，他都是义务建筑师。

朋友告诉我，在悉尼，任何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公共建筑，都撒下了曾筱龙的心血和汗水，而他也因此被每一个华裔记住，渐渐地为澳洲人所了解。

1991年，他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OAM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对少数民族社区所作的杰出贡献。

重要的在于参与

随着澳洲经济的不断发展，90年代初期，澳洲华人已经增至二三十万，成为澳洲第三大少数民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华人中享有盛誉的曾筱龙就脱颖而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1991年3月，已经加入澳洲工党的曾筱龙成为工党九月参加悉尼市议会选举的第一候选人，引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反响。澳洲主流社会也预计，他很可能当选为市长，尽管选举的结果，仅一票之差，悉尼市长的位置仍为西人占领，但曾筱龙任副市长，毕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首位华人登上了市长这过去华人想都不敢想的宝座，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它的社会和历史意义，都是令人鼓舞的。

引导华人社会进入澳洲社会主流，这是曾筱龙上任后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他认为，华人不仅要向澳洲社会显示实力，

还应当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在政治生活中起作用。“有自己的声音”，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衷。

他是悉尼市计划委员会主席，分管城市建设工作，他花大力把悉尼建设成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城市，我相信，如果没有他，悉尼的多元文化决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1993年，澳亚粤剧团成立，主要音乐家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各交响乐团及歌舞剧团的成员……

贫穷练就刚正不阿

我乘的士来到悉尼西郊，在一个中产阶级的住宅区里，我叩响了曾筱龙先生的家——我改不了一个“战地”记者实地调查的毛病，注意考察了他的家庭成员及其周围的人物。

开门的是一位鹤发童颜、满脸笑呵呵的长者——曾筱龙的父亲曾伯，听说我从香港来，他脸上展出更多的笑容，忙把我引进了门。

这是一座宽敞的有花园的三层楼住宅。不大的花园，却有山有水，有湖有坪，水中游鱼从从容容，池畔修竹颤颤悠悠，构成了一幅令人神怡的动感国画。

曾伯对我说，这湖、这山、这树，都是我们亲手建出来的。

“当然了，是集体韬略，筱龙设计的。”他说着，眉宇间为儿子充满了骄傲。

客厅很大，中西合璧，浅色的地毯，一尘不染。环顾四周，山水花鸟的国画点缀着空间，丰富而整洁，不愧是个建筑师的家。

“筱龙自小就十分要强，他出生在一只小木船上。我在前线打日本人，就盼他成条龙，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国内动乱，我们很穷很穷，到香港时，住的是荃湾的贫民窟，二十多家合用一个厨房。每天放学后，筱龙只能搬张小凳子到家门外的人行道上做功课。天热时，他和弟弟妹妹们在街边放一块床板露宿。就是这艰苦的青少年时代，反练就了他的坚忍顽强，为理想去奋斗的决心和毅力。筱龙上的是华仁中学，学校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成绩优秀的他通过学校申请到澳洲读书，澳洲接纳他了，他却因家庭



悉尼市长曾筱龙和
澳大利亚总理在一起

经济拮据，根本无法起程，我们都很难过。第二年，他再次申请，终于获得免学费的待遇，我们东借西凑，才凑足了盘缠。1961年，筱龙到澳洲后，半工半读，一放学就去加油站打工，赚一个汉堡包和6先令。假期，他就到工厂做工，一直到大学毕业。接着，他考上了新南威尔大学建筑系，也是半工半读到毕业。后来又深造，获悉尼大学建筑学高级文凭。今天，他已经是澳洲皇家建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建筑学院院士。”——曾老伯很欣慰地介绍说。

曾伯母引我去见曾筱龙的奶奶。九十多岁的曾老太身体健康，也自己住一个套间，老人谈起长孙曾筱龙，笑不拢嘴。她说，五个孙子，筱龙最孝顺……

老俩口住在同一层的套间，有厅有房，还有厨房，浴室。伯母让我坐在沙发上，搬出一大摞照片簿来，指着儿子的结婚照，显出对媳妇很满意的样子。“她叫包江婉，是台湾的望族，音乐系的学生，两个人一见钟情，来往了几个星期就定了终身大事，也是奇缘了。他们现在有两个儿子，都念中学了。”

老俩口又带我去看孙子。正在读高中的大孙子满头大汗给全家准备晚饭，烤牛排，香味一屋子。老二告诉我：“爸爸很少在9点以前回家的，经常是深夜，我们大半时间在早上见他。”

曾伯说：“筱龙对他们要求很严的，要他们

从小自立，不要依赖他人。”告别这一家，我很感慨，万万没想到会在悉尼看到一个四世同堂而又相处融融的华人大家庭。悉尼人民找到这样优秀的人当市长，实在是三生有幸了，希望悉尼人珍惜自己的机会吧。

亚裔的路还长着呢

回香港不久，我紧张地注视着澳洲的大选。当我看到汉森的一国党在澳洲大选中全军覆没时，真为曾筱龙市长松了一口气。澳洲总理霍华德在大选获胜后表示，新政府今后的施政目标是与土著修好。同时，他也赞扬了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对澳洲的贡献。可见，澳洲华人在联邦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明白，汉森，一个卖炸鱼的，一个有四个孩子的离了婚的母亲，之所以能在一夜间成为一个议员，一个政治领袖，并可以在澳洲掀起一股反亚裔的风暴，决不是简单的一个事件，她这次落选，也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这是澳洲人对多元文化的肯定和认同的一次考验与较量。但这并不标志澳洲的白澳主义寿终正寝，亚裔要在异国他乡争得完全的平等和权利，路，还长着哪！

（责任编辑：程 度）

炎黄春秋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从朝鲜归来，彭真（左）、郭沫若（右）等到北京站欢迎。



1978年春，赵健民（右三）离滇赴京，万名群众自发为他送行。

- 访悉尼华人市长曾筱龙 ■
- 焚书、八股愚天下 ■
- 武怀让命丧苏联 ■
- 飞行将军曾克林 ■
- 朱德怀念第二故乡 ■
- 清官严重 ■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